中国西部考古记
吐火罗语考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法]谢阁兰 伯希和 等 著
冯承钧 译

4

世界汉学论丛

中国西部考古记

〔法〕谢阁兰 著　冯承钧 译

吐火罗语考

〔法〕伯希和、列维 著　冯承钧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考古记/(法)谢阁兰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法)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4083-7

Ⅰ.①中… ②吐 Ⅱ.①谢… ②冯… ③伯… ④冯… Ⅲ.①考古-中国②吐火罗语族-研究 Ⅳ.①K872.4 ②H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020 号

责任编辑:王守青

世界汉学论丛
中国西部考古记
〔法〕谢阁兰 著
冯承钧 译
吐火罗语考
〔法〕伯希和、列维 著
冯承钧 译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5 3/4 印张·126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定价:15.00 元

ISBN 7-101-04083-7/Z·495

出 版 说 明

中华书局曾经在20世纪的30—50年代出版过一批外国汉学家名著的中文译本,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这些书印行的年代较早,于今已不易觅得。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世界汉学研究亦呈逐渐兴盛之势,读者对这些译著的索求更为迫切。经认真研究,我们决定将这些书列入“世界汉学论丛”,修订后重版,以飨读者。

我们考虑到既要保留原译著的行文风格与译文的连贯性,又要适应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符合现行的译名规范,此次重版,编辑部对原书作了必要的修订:一、改定版式。原书大多为繁体竖排,字迹繁密,字号也较小,读来颇为吃力;现一律改为简体横排,新式标点。二、有些原书如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只有旧式断句,没有标点;此次逐句重新加以标点。三、书中的外国人名、地名,凡后附原文的,一律以新华社编定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及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定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为参考,或改换,或出注,视具体情形酌定。四、书中的一些翻译,依照审慎的原则,据今天的习惯作了稍许更定。如《罗摩延书》改为《罗摩衍那》,歹族改为傣族,兰沧江改为澜沧江,等等。五、有的旧版书后曾附有专家所做勘误表,这次则逐一对照,改正于正文中,以利读者。六、原书出现的印刷错误,凡经发现,即予改正。

由于原书有些译者已去世多年,这些书的外文原著又很难找

到，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此次修订重版肯定还会有不少疏误之处，恳切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批评，以俟今后再行订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年6月21日

中国西部考古记目录

序 …… 3
第一章　中国古代之石刻…… 5
第二章　崖墓…… 15
第三章　四川古代之佛教艺术…… 24
第四章　渭水诸陵…… 35

吐火罗语考目录

序…… 47
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 53
吐火罗语…… 81
吐火罗语与库车语…… 99
说吐火罗语…… 158

中国西部考古记

序

此次考古队原定之计划，系先考察四川一省古物，缘川省之古物，世所鲜知，故此次考察之地，务求其广。次勘测扬子江上流，或金沙江自巴塘至丽江之水道；前者以沙畹(Chavannes)君在河南、山西、陕西调查之成绩为根据，后者则继续波利亚克(Charles de Polignac)考古队海军中校阿德马耳(Audemard)之研究，并借重巴戈(Jacques Bacot)旅行之成绩。

考古队于1914年2月1日自北京出发赴西安。复于3月1日自西安首途，沿渭水西行。法占(Gilbert de Voisins)与拉狄格(Jean Latirgue)二君取途左岸，谢阁兰(Victor Segalen)君遵行右岸，至宝鸡会齐。相偕度秦岭，向汉中府进发。3月20日至汉中。又分为二队。拉狄格君南向南江县及巴县进发。法占与谢阁兰二君乃遵旧官道而入四川。复在保宁府(阆中)会齐，从嘉陵江水路赴蓬安县，遵陆至渠县，是为4月20日。嗣后考古队径赴成都，于5月2日抵四川省城，所受法国领事馆之待遇，实有助于研究调查者不少。旋自成都出发，向东北行，赴绵州、梓潼。还成都后，又下岷江至嘉定府，复由嘉定府至雅州府。考古之任务遂于是告终焉。

7月4日抵打箭炉。甫欲径赴扬子江上流之巴塘勘测长江，即闻江卡、巴塘、河口等处藏人叛动，道途不靖。乃南下赴丽江，拟由丽江循江上溯赴巴塘。乃8月11日抵丽江，即接奉大动员令，遂取近道回法国。于1914年8月23日抵云南省城。

此次考古队系受教育部与考古学院之赞助而组织，领受考古学院所给伽尔烈(Garnier)基金之利息，并领有美术与考古图书馆重要之津贴，兼赖北京法国使馆之援助云。

此次考古成绩之全部，将分为四类发表，即：

一　大写真本，所有照片拓片图画皆属之。

二　探考所经路程之地理的测绘。

三　自北京赴云南之经行日记。

四　研究之文稿，兹所发表者，即其节略，其目有四(按原目有五，后著者将第五目之中国地理笺注临时删除)。

甲　中国古代之石刻。

乙　四川之崖墓。

丙　四川之古代佛教艺术。

丁　古代中国之封墓艺术。

第一章　中国古代之石刻

两汉(西汉始纪元前202年,终纪元后8年。东汉始纪元25年,至220年)在中国史中所占之位置,就时间言居其中心,就空间言亦甚重要。是时国势极端发展。今日"汉人"之名称,盖为当时留存之旧称,其势力可以想见;而其留存之古迹,当然为人所宝贵,亦不待言矣。今日所见最古之石刻建物(译者按:石刻云者,盖指广义的艺术建筑物而言,不仅指狭义的有字石刻也),即为汉代建物。汉以前秦、周、商所留存者,铜器、陶器、籍文、骨甲文,暨数种石铭而已。商以前寂无闻焉。

当考古队出发之时,汉代此项艺术建物可数者如左。

双阙五,河南有其三,山东有其一,四川有其一,纪元118年至209年时物也。

墓室二所,皆在山东,纪元二世纪中叶物也。

石兽(译者按:原文作飞狮)两对,在山东、四川,为纪元143年及209年物。

碑石数座,刻石(dalles)若干。

山东、河南之石阙、墓室、碑石、刻石等之雕画刻文,为沙畹君研究考证之主要材料,业已发表于其所著之《中国北部考古队》(Mission archéologique de la Chine septrionale,1909)与《汉代雕刻》(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 1913)二作之中。吾人之寻究,即以此为主要之根据。

但四川之建物,惟高颐之阙,阿隆(d'Ollone)君经过雅州时一见之。欧洲惟见其略图与残缺不完之拓片而已。石兽惟在张神甫所撰之《梁代坟墓》一书中偶见之。此外诸物,虽有照片,然不足以供鉴评也。

右所举之建物及年代,皆属东汉时物。最远之物,为118年之登封县大宝阙。乃创作雕刻造像之西汉古物,反不一见焉。

自此次考古队发见纪元前117年墓道造像之后,东亚造像之研究,遂又远溯至200年以外,像为霍去病墓前足踏匈奴之石马。

霍去病为汉武时建功中亚之名将,事迹具见《汉书》。殁于纪元前117年,年二十四岁。武帝为之建冢于渭水流域,冢南数步,石马在焉。冢前有乾隆时所立之碑,碑文如左:

汉骠骑将军大司马
冠军侯霍公去病墓

石马以整石刻之,质为灰色花岗石。自地至马顶,高一公尺四十分。其下台石虽已埋没,马身虽小,其姿势之雄健,尚可彷彿得之。

马无鞍辔,身重蹄短,尾长垂地,腹抵一人于下。其人以膝抵马腹,趾接马尾,左手持弓,右手以短矛刺于马胁之中,其头甚巨而后仰,眼大而圆,额低耳巨,其乱须蓬接马胸,一见而知非中国人而为夷狄。此马与人猛勇镇定之状,除完全型范之外,殆难仿造。

此像尚保存而未失其原有轮廓。其人筋络容貌之姿势,与马头耳之原形消耗者相比较,迥乎不同。然亦不难想见其原有之刻势也。

马头东向，与今已不存之西向石马相对立。考其遗迹，墓之北面装饰，似亦相同。此墓之原来形状，俟于研究中国古代封墓艺术中述之。

兹欲言者，此墓真相之证明耳。此事与此像之体范（后亦作体）（style）在别见诸品中，并无相类者，其证一也。乾隆时所立之碑，与史籍文地方志所载霍去病葬地，皆符，其证二也。今日已知之诸古墓，惟霍墓有一特点，即其墓腹墓足皆有块石，盖当时武帝欲使其冢象祁连山以旌其功，故布置如此，其证三也。

霍去病之墓及陕西诸墓，皆无石阙。四川则不然，据其数比较之多，其重要，其建筑之复杂诸点而言，得谓为铭刻建物之最有价值者，亦不为过。

四川之石阙，乃沙畹君检阅省志及《金石苑》始知有之。在今之前，惟雅州（高颐阙）一地已实地调查。此外诸阙，即中国人知之亦未久。顾地理之不明确，此次之调查，实无异乎一种全部的探考（exploration）。

载籍之碑阙，吾人仅觅得三分之二。其余或已湮没地下，或已移徙破碎，皆未可知已。发见者，中有数种，惟存其文，现已为新设建物所框围，仅有其铭文价值而已。其美术吾人无从知之。

吾人又见数阙，上无铭文，故为书籍所未载。

前人所知之此类建物，为数有十。兹经吾人调查之后，其数增为十八。其间九石刻尚保存其建筑的及雕刻的价值，为建物中之甚美者。二石刻较劣。五石刻已倒塌损坏。二石刻现已残砌于新建筑之中。

此种建物在四川省中，据其分配之地而言，可分为三区。东为渠县区，中为梓潼与绵州区，西为夹江与雅州区。再就其体范，其

大小，其装置言，得自单简之标型，以至复杂之建筑，分其等次，兹先述次其两端之建物。

单简者可以“冯焕神道”例之。此碑为绝优美之建物，装饰极简。其各部之设置：下为方座；座上为碑身(fût)整石刻成，上端销锐；其上为碑盖(encorbellement)；又上为介石(frise)；又上为椽(entablement)；椽上为顶(译者按：建筑学之专门名词，中文无相对通行名词，兹暂定名如上，附以原文)；碑有字二行，文如左：

故尚书侍郎河南京尹

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冯焕碑虽未损缺，然古建物尚未完全留存至今也。据沙畹君所得之材料，河南、山东之建物，皆有扶壁(contrefort)相连，壁上有时有顶，且有与主碑相合而为一者。吾人在渠县所见七阙，无一处见有扶壁残遗之物。但有二证证明前实有之。阙身(fût)之一面，常有一处形方而面不平，较阙身稍低，上有榫眼，显为连接一种副建物之处，其证一。同一方向之方座(socle)伸出，除承受一种副量之外，似无别用，其证二。

但中区及西区之复杂石阙，此扶壁常见保存，阙虽亡而扶壁尚在，其例不少也。

复杂云者，因其建造以石块层砌交置(其体较巨，故不能用独石建置)，且其上层较丰，故其雕饰甚富，为冯焕碑之类所不及。

兹举绵州之平阳阙以为复杂石阙之标型，是亦四川有扶壁双阙之独存者也。

其阙层次别为七部：下为座；上为阙身；又上阙盖二层；又上介石一方；再上为椽；椽上为顶。座以板石数面构成。阙身以大石交互层叠砌之，上刻有驾车及行走步卒之状(浮刻〔relief〕约数公毫

〔millimètres〕)。其事与其体范,颇与山东墓室之石刻相类。下层阙盖之四角,雕有神头之像。上层之介石,饰以平刻曲枝(rinceaux)。椽上雕刻甚多,四角雕二猛兽相斗,一人引较大一兽之尾,此外则雕两蛇交缠,又有一怪人手持飞马之韁(此外阙身雕有上尖弓形下方之小龛,但为后来之增饰,非原有之雕刻,故略而不述。后于研究佛教肖像中别述之。盖此种增饰,固为损毁原有建物之雕刻,然亦为研究佛教最古最可宝贵之材料也)。

至若扶壁,其式较小,而其体范形貌装饰,诸层皆同主阙。

处此两种石刻之间,有渠县之沈氏阙(译者按:《四川通志》:大川县北一里,有双石阙,上镌沈府君。疑即此也),渠县之无铭阙,夹江县之杨宗阙。沈氏阙,阙外别有一孤碑,阙之层次同冯焕碑,但椽之四围有浮雕显露之美丽雕刻,其间造像极有价值,余仅关系装饰而已。将来刊布写真本,别有详细照片可资参考,兹略。渠县之无铭阙,为数有三,皆在冯碑沈阙附近。阙身极似沈阙,然其椽则较甚重要。中有一阙,亦雕有两猛兽相斗,然其雕势较优,是为汉代雕像美品之一。

其余诸石刻,仅证明前述之资料而已,无他新资料可供研究。其间有多数之阙,皆不完整,如梓潼县杨公阙、贾公阙之类,其文字尚可辨识,书法亦佳。阙之构造诸部,亦可识为复杂之阙。然雕饰几已完全漫漶。贾公阙已不完,惟有一无铭扶壁尚整,今尚在梓潼西门之外。

新都县王稚子阙(按稚子名涣,见《后汉书·循吏传》),沙畹君已在其《汉代雕刻》中,引起旅行者之注意矣。其碑文《金石苑》颇重视之,为纪元105年时物。此类作品无有古于此者矣。

吾人在距新都之北四公里,得见其残碑,文字极明显,现嵌于

砖砌方龛之内，龛在大道旁一寻常家屋之中。此屋后院尚遗有残石数块。据乾隆时记述之文，此物似为复杂石刻之一种（译者按：《四川通志》卷五十八云，冢前有双石阙），殆平阳阙高颐阙之类也。墓距其地不远，今尚保存。

中国载籍之中，“阙”“碑”两字互用，故墓阙与碑有时相混。如二者形状大致未变，其界限不难分明。设为保存古物起见，加以新建框围，意固可嘉，而其界限遂难判矣。王稚子阙，决为阙无疑。但梓潼县李业之石刻，籍文虽名之曰阙，今尚模糊难定。其形上锐下丰，乃用近代之石附建而成，与阙身有异，盖为独石所制。至梓潼之阙，皆以诸石叠砌之，因其为纪元 25 至 30 年间物，故其问题有提出之必要。别有一汉碑，在绵州西山观，今仅存其文。设此次考古之行，不于雅州及芦山县见高颐及樊敏二氏之壮丽建物，吾人必将以为四川无一完全汉碑可觅也。

高颐碑曾为阿隆氏所认识。其形状与其雕画皆尚完整。高二公尺七十八分。碑上穿孔。有汉代体范最美之螭龙蟠绕其上。碑之方座，坚固简朴，有两长形动物环其两角。碑文因拓之数数，业已磨灭，但于载籍之中，可以见其全文。

樊敏碑之壮丽，不亚于前，而其保存亦较完好。其文尚全。其座则为赑屃。

今请再述浮刻之石兽。兽为飞狮，置于阙前墓道入口之处。高颐阙之石兽，现尚保存，可以例想此外残缺不完石兽之状，如芦山樊敏碑附近稻田中之石兽是也。其身躯凸起。腰部特别高耸，为汉代雕刻石兽之特具体范。其足已碎断。然其头颈身躯，尚保有其不可否认之美观。

吾人所发见之新标型中，有一坐兽造像。颈身下部尚完好。

其装饰与其姿势，为汉代造像中所未见者。兽在渠县诸无铭阙附近。别有一大石人，其头已断，其胸已经破蚀，应为阙与兽同时代之作品，特已损坏不能断其体范耳。

右述之造像碑阙，全属墓外之艺术作品。兹应知者，墓之中艺术如何耳。故吾人进入昭化县鲍氏女墓之中，此为在中国初次创见之事。

载籍所志，关于此妇人之事甚略，《省志》惟记其为蜀汉（221至265年）时人。其墓已为雨水所冲削，墓之一角陷落，此事籍文亦载之。（译者按：《四川通志》卷四十五云："鲍三娘墓在县北十五里，曲回坝南，白水西岸，巨墓嶷然。昔时土坼，见墓门石砌坚致如城阃之状，内室幽黑屈曲，人无敢入。今已封闭矣。"又引旧志云，"鲍氏者，关索之妻也。"）吾人即于是处发掘，见一窟室，穹顶，顶以画砖筑之。破壁而下，见一大室，长五公尺四十分，宽一公尺九十分。北壁砖壁已一部倒塌，吾人即由是处进入室中。室中空无所有，无棺柩之迹，掘地始得一额骨。此室应注意之处，即在壁画。壁与顶皆以画砖砌成。其砖之体范，应属汉代。就饰画别其种类有五，有具菱形（losanges）者，有具雕线（stries）者，有模汉武时（前140至187年）钱纹者，有模四足兽（似鹿）者，有模驾马者。前二类砖，穹顶有之，马与钱在壁上，四足兽在其南端。

此外经吾人探考诸墓，其布置皆同，显系同时代之建物。

汉代留存之石物，不仅此也。四川省中尚独有一种丧葬建物，因其说明之新，材料之富，须特别研究之，此即崖墓是也，第二章专述之。

四川汉代建物保存之程度不等，诸建物皆以砂石为之，惟产地与本质有别耳。渠县之阙，以蔷薇色细沙石为之，其细密部分，尚

保存完好。梓潼之建物，以褐黑色沙石为之，石质粗而易毁，故多为雨水剥蚀。又如植物之生长，亦妨害建物之保存。梓潼之杨公扶壁，初与其主阙分离，旋为大树所倒。绵州左方之阙，已因树根生长，石层侧面裂开。雅州高颐阙上有小树一株，正在助其崩解。

别又有一危险，即诸阙多环以稻田是已。阙座浸入水中，不久将为水所湮没。渠县有一无铭阙，业已倾斜，崩塌之期谅不久矣。即不崩塌，亦必因其障碍农作，占据有限耕地，为人改作磨石，中国古迹因此而毁者甚多。

今就所见诸建物全部研究之结果，提出一问题曰：汉时石刻如何发展耶？汉朝为强健战斗生气活泼之皇朝，其艺术之特性亦同，即在造墓艺术之中，从未稍露死丧之意。

其特征即在其“威力”，常用动物表现之。汉代大兽姑不论其种类如何，盖为长身之兽，胸大腰耸，筋力呈现，大致以牡类体状居多。此种特征，在阙上之浮刻中亦可见之。其间马卒、猎士、裸身之人、半裸之女、各种兽畜，互相追击，互相斗战，生动之状，虽在墓所亦然。

大型造像及阙上诸浮刻所表现之生意亦同。但在介石之上则不然，其平面浮雕，隐而不露，是为一种表面作法，完全注意于纹线，只顾其四围，但其轮廓极精练也。由是观之，建物之上有两种艺术，其原来，其模型，其目的，各有不同，并列于建物之上，将继续其进化各不相谋也。

说明建筑术上之图画，不能不联带叙及于中国之书法。盖书法在碑阙之上，地位颇重，碑阙前面常有铭文，笔画之优美，行列之整齐，极为融合。所以中国之考古家，重视文字，轻视无字之物，而载籍之中，或略记之，或竟故意缄默，不为记载。

自西汉迄蜀汉，四川之纯粹中国雕刻，已具述于前，如欲在四川寻求其后之纯粹中国雕刻作品，须迟之数百年后，始能再睹其迹。南朝之梁(501至556年)，尚传有此项作品。而四川自蜀汉以后，譬若离繁茂之区，进入荒原之内，无迹可寻也。陈、隋两代(557至620年)，此地无一纯粹中国艺术建物。纯粹中国艺术云者，与佛教艺术相对而言也。故前此所志，凡属佛教建物，皆未列入。佛教固于东汉时输入中国，但其造像术(iconographie)之输入，晚在二三百年之后。观前述诸作品不受其濡染之事，可以证之。绵州西山观洞中之佛陀，二尊者，二菩萨，五像，乃唐代(620至907年)之浮刻标型。惟在壁上所刻男女施主石像内，有二女像，其体范近类龙门造像，始见有汉代装饰师曲线之流传，其时已晚在八世纪也。第此种中国艺术，在此时代，见于笔绘者多，见于刀刻者少。

陕西乾州唐高宗陵前有一飞龙马，唐代极美造像之一也。当1908年沙畹君发见时，惟马头在外，身埋土中，而是时之中国政策，又不容发掘，故未能见其全身。吾人至是始蒙许可，将全身掘出。此石马应为纪元683年物，至明朝时因地震与台座分离。其台座距石马不远。石马所缺之下腿，即在其上。则此石马之全形，不难想见也。就雕刻作品言，吾人所得实多。盖吾人由此石马，始知汉代自由创造的古艺术，至是已为体态浮刻的完善知识所代。其凹线(cannelures)，马头之姿势，以翅接连前肢，涡纹饰(volutes)，诸艺之发展，皆为艺术完成之证明。

提供欧洲人研究之中国新见诸作品，已略为列举于前。吾人对于分析及比较，并未言及。其实此种尝试，亦不可缓，如说明地与地，省与省标型如何不同，如何相近，如何将造像、碑阙、坟墓，依据年代、体范、方位分为系组，如何各个建物自位于中国文化发展

之中，诸问题是也。

顾欲答复如是等问题，须先辨别其异点，不惟地与地之异，省与省之异，其大要者，外国之输入也。据吾人所见，伊兰(Iran，今译伊朗)一地之影响最大。虽然，吾人并不因此制限古代中国之天材，且将其无比的特别的纯粹的艺术发扬之云。

第二章　崖墓

吾人当预备出发之际，覆按诸旅行家及吾人前此旅行四川之记述，曾发生如下问题。

四川某川流岸崖之上，有人工所凿石窟甚众。窟内方广不一，位置亦高下不定。固有为足迹所易至者，亦有攀登极难者。其门近长方形，内有数室，空无所有，亦无古志铭可寻。似难考求其时代，其原始作用，其工人为何种种族，暨其原始居民之性质也。

省县志书、考古著述，亦无记载。惟据舟子挑夫之传说，此为“蛮洞”，为昔日“蛮子”之居室或坟墓。欧洲旅行家闻之，故过其下亦不加以寻求。

顾自脱兰司(Thomas Torrances)君近在岷江江岸崖中，发见诸遗物之后，沙畹君乃预测此处汉墓必多。顾1914年前，所知所已研究之四川汉代遗物甚多，只能设为一种假定而已。

吾人所已探考之窟，限于扬子江之二大支流，嘉陵江、岷江二处。窟之易见者，下临江岸。其余位于分流水道流域之中，大致常于沿岸见之。其方向不定，常依天然崖石之直线开凿窟门。兹将其主要者分列于下：

属于嘉陵江流域者：

1.保宁府；2.绵州。

属于岷江流域者：

3.江口；4.嘉定东；5.岷江下流；6.嘉定西。

1.保宁府诸窟　吾人行程所经，初见者为嘉陵江保宁府附近之窟。窟在保宁府城外盘龙山山腹之上，隧深二公尺，后为方窟，高二公尺五十分，上为穹形(按即弓形)。窟门之形，各处皆同。其特点即在门低，上狭而下宽。门楣门框皆有坎(feuillure)，盖用以嵌门或其他闭障之物者也。由此两点，可以证明其非天然洞穴，亦非已废石矿。此外保宁窟所具之特点，暂不记述，盖后此说明更较完备之窟，别有记述也。

2.绵州诸石窟　诸窟在绵州南十余公里，嘉陵江支流涪江右岸。此处砂石崖上，有一唐代大佛雕像，此类造像，四川甚多。距像不远，有二窟极可注意。其一窟，入门为隧道，入隧有一外室，室里又有二圹室并列，较外室低四级，其广适可容棺，圹顶穹形，高一公尺十分。别一窟有四圹，外隧旁一圹，内窟左右三圹，皆长一公尺八十分，宽八十分。观诸窟之形式整齐，制作巧妙，决非蛮人布置天然洞穴者可比，实具有一种高等文化之技术也。

岷江流域，将予吾人以尤为丰富之研究材料，并示吾人以四川省内汉代艺术之一重要部分，此尤为始愿所不及者也。

3.河口诸窟　成都南五十里，岷江流抵红沙石高原地方，凿有数窟，并无可注意之特点。至河口之北十里彭子浩地方诸窟则不然也。

江流经一绵亘南北之小山，山腹为红沙石质，山势倾斜，凿窟甚多。顾凿窟于斜坂之上，其技术当较特别，盖坂势虽斜，窟地须平，凿石深入山中也。窟口亦具有前述之特点(上狭下宽，有坎)，但其内部则较前述诸窟为复杂。

入口之隧道长二十五公尺，愈入愈宽，宽自一公尺二十分，至一公尺九十分。隧道左壁凿有小圹室二，室长二公尺，其一尚存一棺，及后述之画砖。内隧又有入口，口内隧道较外宽高，自此至里端，宽一公尺九十五分，深十四公尺五十分。合计此窟深约四十公尺。

内隧深五公尺。出内隧为一大室，中有石柱一，柱身八方形，柱之两端四方形。

内隧与大室之左有圹室三。一在隧左，室横列。二在室左，直列，宽同内隧，入口在里端，面向大室。别凿有长方之窗，窗上有格，壁上有置零星小物之所。圹室前角有灶，灶有三眼，皆凿石为之。

除右述内部之布置外，彭子浩窟中之内容，尤有堪注意者。其中有棺，有人骨，有画砖、土器、小像，且有一黏土烧成之瓦棺。虽破碎不完，然尚不难推想其原形也。其盖为凸形，与棺正相合。

画砖有菱形画，汉墓常见之画砖也。土器为无饰画之碗瓶、小像，与洛阳附近邙山出土之像相类。但观其形式之古，其时代应在邙山作品之前。除所集前述诸品之外，附近乡民又献其所得同样物品。其中有一汉制铜瓶，皆足以辅助鉴定也。吾人竟可于此处名之："曰汉代美术纪元。"兹尚须寻求者，汉代之壁刻耳。盖其刻线曲线，体范易于认识也。此种壁刻，于邻山荆棘中搜得之。有一圹门之上，载有一美丽横额(fronton)，其广阔及其体范，与前所见者同，盖一汉代之旧装饰画也。画为两长形雄健之动物对峙，其中间以古钱一枚，左方为一瘦龙，右方为一身躯锐长腰部凸起之翼兽，与渠县阙上之画相同。盖一汉时雕刻，具有其特点者也。

吾人在河口继续寻求，复又得一不意之发见。偕行之儿童，导

余等入一穴。穴道甚小,惟容一人。匍匐随之,行十五公尺,发现一室。又入第二室、第三室,皆空无一物,亦无装饰。但第四室中陈有大石棺二具,以沙石作之,雕有饰画,其棺已空。

其一具尚存棺盖三段之二。盖极厚重。棺形方,所雕之长纹线影,盖以极细锐之刻刀镌之。前雕之形像,观其态度体范事物,皆属汉代。其一方骑鹿弱女,曾于数石阙上见之。其一方系桩之马,拙钝之式与河南之少室阙雕画如出一手。其中间雕物,似为二女奕棋,抑掷骰,虽未能详,其为汉刻,亦无可疑。其两和头所刻之二亭,类鲍氏女墓之砖画。又有一鸟,亦类渠县阙上之浮刻。

室中除二棺之外,仅破碎陶片。此墓虽已为人所开,其正门尚保存如故,盖今日入墓之道,为别开之道也。吾人发掘数小时,始将正门寻出。此门即在一短隧之外,门有匡楣,以二大红沙石板阖之。

4.嘉定东诸窟　窟在岷江左岸,与嘉定相对。入窟甚易,现已变为杂沓之民居。居者偕其儿童猪豕共处其中。室甚大,门亦广。今其作用与陕西所见之土窑相同。各室分为人居、畜舍、庋室、槽枥、厕所。昔之明器,今为生者所用。牛唇之下用作槽者,实古棺也。

此种圹室之新异,即在其石额之建筑的发展。石质为紫色沙石,既为雨水淋剥,复为虎耳草所龟裂,然其装饰,尚可见也。此处留心装饰,似较嘉陵江流域为切。例如两窟口之间,刻有假门,而此三门又在一天然圆洞门之中是也。

现存石棺,多就窟石雕刻,并未将石分离,其中且有刻双棺相连者。

诸圹之重要者,在一山谷之腹,一佛寺之后。

其间有一窟,窟内为一大室,宽二十三公尺,深七公尺,高三公尺。里有六圹。窟门上额一部虽塌,余尚隐然可见。是处诸圹之特点甚多,难以备述也。

5.岷江下流诸窟 窟在犍为县上流右岸崖中。岔鱼寺之滩流,即经此崖之下。因下有滩险,故崖上凿路,经此窟下,舟子名诸窟曰"九洞"。

兹专就考古方面调查之。窟口亦有上额,刻有汉代人兽。其中亦无新异之物,内有一石棺,为人去其一面,此即昔日巴伯(Baber)氏所谓之"靠椅"也。此圹虽为昔之幽室,今亦不免为不恤古迹之居民所居。

6.嘉定西诸窟 距嘉定北门十五里,赴雅州大道之道左,有一带紫色红沙石极美之崖,其中凿有多窟,远望可见也。地名"白崖",观其墓窟之发展,非寻常圹室可比。

其正面皆甚广,约占五十方公尺,开有窟门二三不等。二门之间,隔以方柱。诸门之上,建有宽额。入口为门道。后壁为入诸圹之隧道。兹将其间自南至北之数窟,分记于下。

1.其一窟正面甚奇。其雕画,除纯粹中国旧刻外,尚杂有佛教雕画。后之雕画,必系数百年后增加者。入口有二窟,内广阔。壁上有题名,此乃前此所未见,题名尚保存,审其年号,识为宋刻。

2.其一正面方形。雕画虽多剥落,幸无增刻。入口二门甚广。门上横额,叠砌二层。上刻之鸟,尚可辨识。室甚大,宽深皆七公尺。题壁尤众。两门中间方柱上,镌"白崖洞"三字,崖洞二字,已半刓。门左有半浮刻碑,高二公尺,碑文为隶体,已多漫漶,第一字尚可辨为汉字。此碑为汉刻欤?但审其缘边刻画,未足信也。窟左壁有一大刻石,其年号为绍兴。

3.别有一窟,特点亦类前窟。两门间之方石柱,亦镌隶书,剥落殆尽。

4.又一窟,宽八公尺,深四公尺。正面虽塌,内饰尚完好,可想见其新建时之形状。其雕饰极单纯审慎之能事。外饰既佳,室内设计,亦极调合。汉代艺术遗迹中,间有之欠雅致,无气力,及幼稚之点,兹皆一洗而空之。其简洁及其尺度,可谓已臻完善矣。

据前所述,吾人得断言曰,四川之崖墓,为汉时之中国古墓。

有人以为此乃石器时代之遗迹,此说非也。四川不乏前史时代之遗物,如原始兵器、记念立石之属,然与此处之装饰与体范,时代明确之重要工程,不可同日语也。

至佛教亦与此无关。彼释氏固已在崖上凿龛雕像,为数甚众,固有时不仅于未经雕刻之石上为之,亦有时加刻于已有雕画之石上,如平阳阙之类。然其造像术之输入四川,据吾人之考究,最古时在纪元529年,而诸窟先此三百年已早有之。其间虽有佛教增刻之画,然为时晚矣。

至若以诸窟属于蛮人一说,在今以前,或可主张,盖一无铭志,二无记载也。吾人此次得便利调查,实受此说之赐,缘发掘中国古墓,为至难而亦至险之事。此次入鲍氏女墓,已烦唇舌。调查之第二日,村长率其全村之人来加阻止。所可幸者,掘窟之乡民,仍工作导引如故,且淡然言曰:“此为蛮洞。”

此蛮洞之说,亦不足论。四川自纪元前三世纪以来,即参加中国生活,与渭水流域之中国人无异。若言蛮人在居人稠密之处,用中国工师中国雕饰,造作墓室,此事之所未有,亦史书所未载也。

至若以诸窟为生人所凿,而非死人之墓一说,亦不足辩。窟中固有生人所用之物,殊未知中国人之事死如事生,窟中所藏,盖为

明器。

设诸窟未经考古家之探求，犹可说也。今既已证实为古墓，故吾人亦不再讨论之。或有谓犍为之额画，与中国画无关系者，此盖欧洲人仅知海港古董店所售古物者之言。其所知中国艺术，只此而已，吾人亦安用辩为。

此事固绝无可疑。但有一点不明，尚须讨论者，即此种宝贵古物，缘何中国之考古家，竟无一言耶？不但考究碑阙古迹极详之省县志书，未载上述之崖墓；即吾人所赖以辅助之《金石苑》，亦完全不知有其物。

是亦不难解说也。中国偏重铭文学，而忽视古建筑物及古造像。所研究者，有字之物。其无字之物，皆不注意。诸窟墓因无字，故不为所收。但阙上有字，崖墓似不能无字也。

吾人因寻求崖墓中文字，于《省志金石门》中，见有一文记述一事，可以引证也。

考《四川通志·金石门》，彭山县汉张氏《穿中记》，引《蜀碑记补》，“建初二年(77 年)”《字原》云：“在眉州碧鸡岩”，《隶释》云：“武阳城东，彭亡山之巅，耕夫劚地有声，寻罅入焉。石窟如屋大，中立两崖。崖柱左右各分二室。左方有破瓦棺，入泥中。右方三崖棺，泥秽充牣。执烛视之，得题识三所。一在门傍，为土所蚀，仅存其上十余字，穿中沙石不坚，数日间，观者揩摩，悉皆漫灭。其二在两柱前，稍高，故可拓，时绍兴丁丑年(1157 年)也。一柱二十五字，一柱四十九字。”《隶释》云：“本张公宾之妻之穴也，其子伟伯及伟伯妻，与其孙陵，皆祔葬右方曲内中，故志之。其一则伟伯之孙元孟，葬其父长仲，并弟叔元所志也。其字古而拙”(译者按：原文见《四川通志》卷六十)。

右引文所记之墓，其为吾人所常见崖墓之类无疑，必非鲍氏砖墓之类。盖记中所志石窟、左右二室、崖柱、瓦棺诸物，显为崖墓所有，由其汉代所记之字，可见崖墓亦有文字也。

吾人在江口时，曾据右记之文，寻求此墓于原地山腹之中，并询之乡民庙祝，皆无所得。意者开墓之时已拓其文之后，复又没于荆棘泥土之中欤？其墓之异，故《省志》不列入《陵墓门》，而列于《金石门》。若为一种长久的及系统的土质调查，将来或有发现之望，亦未可知。

吾人记述之次第，并非随意，亦非遵行程之所经，实依据其一定之渐进程度而言(此种渐进程度，将来别有说)。吾人之行程，自汉中至雅州，自东北至西南，经过四川全省，自鲍女方室，迄绵州之窟，次及江口之饰额，终于嘉定之壮严的窟门正面。研究之物，自单简入复杂，而结果之满意，实无有逾于此者矣。

此种渐进程度，并非作用之殊。无论其建物在地面或地中，其内容目的皆同。且就葬仪方面言，坟墓与崖墓皆相类，则此两种葬式，并非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不同的风俗也，惟有两种墓所建造方法之殊异而已。此种方法，因所择之地域及一定之时代(纪元前后)互相假借，并互相存在于同一地域。

坟墓与崖墓之间，有一连系之物，即石阙是也。河南、陕西、四川墓道前皆有之，而其饰刻，与承载窟额框柱上之饰刻，又极相类。

此种相近之点，又可以下之观察巩固之。大凡崖墓发展程度最高之区(嘉定附近)亦即阙体较大，饰刻最多之地。

设若变更行程之方向，转由西南赴东北，自川边至渭水，吾人又见崖窟与石阙共有之装饰渐少，亦渐单纯。

由是观之，有两种建筑势力，发源于两地。其一在东方(渭水

与山东),其一在西方(其源后述之),而相接于四川。前者聚土为坟之法,以土墓表示之,于入川通道中见之。后者凿崖为墓之法,一如埃及、西亚、波斯之利用地势之法,尚未表露其行程;如将吾人所得材料(籍文图画照片明器)综合研究之,必可断定其发源于极西,而不发源于中国,吾人今日敢自信也。

第三章 四川古代之佛教艺术

西方研究中国古佛教艺术者，近年来肆力于籍文与作品之成绩，颇见悬殊。

《释藏》卷帙虽富，大致已经整理分类，并与梵本巴利本相对勘，此方面犹之地已耕种，收获甚佳，此非本文所述者也。

至佛教作品则反是。其在广大中国之中，不为人所知，而与旅行家所见近代之建塔相混。即或有附带言及者，亦不过因造像之奇大，如龙门造像之类，偶一记之而已，迨沙畹君数次之旅行，完备之研究发表之后，佛教作品始加入《中国考古学》之中。

此种作品分配於远距六百公里之两地，一在山西大同之云冈，一在河南洛阳之龙门。顾由形态之研究，及历史之关联考之，距地虽远，而其关联实同也。

前者为纪元450年顷，元魏帝室勅令开凿，是为纯粹印度风建物之最古者。就其地理位置言，亦为佛教造像术输入通道中之一重要遗迹。

龙门诸窟，更较广大，其时亦较晚百年，是为元魏雕刻体之发展最古者。其作品不逾景明年（500至504年）前。元魏于纪元494年迁都洛阳（龙门在其南三十里）。据史籍所载，世宗皇帝欲仿代京灵岩寺窟，勅令于洛水之南，为高祖皇帝及文昭皇太后凿窟

造像祈福。

迨至唐代(618 至 907 年),虽定都长安,亦在斯处凿建石窟。龙门最美最大之窟(641 年之宾阳窟)即建于是时。新窟与元魏体异,此吾人所称为"唐代佛教体范"者是已。

此种石刻不仅限于云冈龙门有之,河南府附近尚复不少。如巩县石窟寺之石刻,陕州近代佛寺之浮雕,皆此类也。兹所欲言者,吾人所知之中国北方诸佛教作品,就其考古之关联考之,或隶于元魏,或隶于魏、唐之间诸朝,或多隶于唐,其时代为纪元 6、7、8 世纪;而其输入之经过路程,亦可依史籍推测得之。至其造像之远古的及不可否论的发源,可断其属于健陀罗(Gandhar)派。

四川一省,此项寻究,尚无人着手。若以龙门起点为根据调查之,其重要可预睹也。现有二要点应提出者:

一、四川有无唐以前之佛教作品?

二、原始佛教造像术输入之经过路程为何?

吾人寻究之结果,对于前一问题,可以明白答复;对于后一问题,亦可用坚固之假定解说之。盖吾人已在四川品题多数之唐代佛教作品。唐代以前,吾人已发见隋体、北周体、梁体之三种体范。就梁体考之其最古之年代,为纪元 529 年。

此种作品常以何种造形表见?中国考古学及志书中之名称为何耶?

兹所欲言者,非多属近代之塔,亦非四川较中国北方为少之碑,亦非钟炉等物。中国佛教作品,无论在东北抑在川边,皆可以"佛龛"概之。佛龛累列,为数甚多,故亦名之曰"千佛岩"。叙述一种"佛龛"及一种"千佛岩",即可见一切作品之根本形状。

佛龛者,凿岩为龛,以一像或数像置其中是也。龛之式可大可

小，小者有如手掌，其像甚微，致无定形。大者则如龙门巨像，像身之大小，视佛教之传播以为准。就其传播之历史言，纪元七世纪为佛教极盛之时，亦即龙门巨像或亦嘉定巨像始造之时，龛中诸像，主要者为一佛陀或一菩萨，常就岩石合刻之。龛有三像，则为一佛陀、二尊者。五像则为一佛陀、二尊者、二菩萨。唐以前龛中常置三像。唐人凿龛则五像居多，并于龛口凿二天王或四天王像。三像或五像龛中，有时增刻二狮。龛或洞之两壁或四围，有时亦刻信男信女之像。

此种为佛教造像术单位之佛龛，鲜有孤立者。岩上所刻，常以十计，以百计，且以千计；或并刻于其侧，或叠刻于其上，或增刻于其中，兼刻信男信女于其傍，由是遂成“千佛岩”。大凡中国各地有岩可刻，佛教所布之区，皆不乏此种千佛岩也。

志书之记述佛教作品，常以千佛岩见，其所志亦详略不等。如龙门为中国之最大作品，《河南通志》仅志数行。乃《四川通志》于其最单简之砂石刻画，皆视为神奇作品，列举甚详，可用以为寻求之指南也。故吾人逾秦岭以南，即据《四川通志》而知广元及巴州有千佛岩。

广元县之千佛岩，在县北十五里，嘉陵江左岸竖岩之上。岩与江之间，凿石为道，即古之“石牛开道也”。其岩向为西北西，至东南东(岩高于道十五至二十公尺，道高于水六至八公尺)。在宽约一公里之间，凿有佛龛六百至八百所。随处凿之，层积累聚，既乏全部建筑之计画，复增添诸种颜色于上。初瞻之，极不合美观。但细审之，亦不失为次于龙门之唐代佛教造像重要累聚之一。盖据籍文及石刻，并证以多数造像之雕刻体范，可以断定最初凿岩之时在纪元722年也。

佛龛大小不一(高四十公分至一公尺五十分不等),布满全岩,秩序凌乱。大约人迹可以攀登之处,即凿有佛龛。现有多处,因岩石变化,已为人迹所不能至。诸龛皆依一原型开凿。唐代龛型,乃长方形。视龛像之坐卧,此长方形或直立或横卧。但其线道常粗,无龙门元魏时造像之美丽的曲线也。至龛中之布置及像数,亦可代表唐代之标型。中为佛陀坐像,傍为二尊者,又次为二菩萨,有时外有二天王。此种五像或七像之团体,为中国北部佛教之系统的组合,亦为四川唐代佛龛之特有的征象。

中有数刻,异于此型,有一龛刻佛涅槃状,刻势尚佳。别有一龛,像背面雕有背像,惜其时代不明,要必距唐代不远。此处无一龛刻有信男信女像者。

龙门最末之雕像为纪元759年物。但广元之千佛岩,似自当时至今,尚保有其声名及信徒。据宋、元、明、清诸代之刻铭及造像可以知之。后代新凿之龛,一遵旧式,绝无创作。观今日粉饰油漆之新,可知信心之尚在。而古刻美线之仅存者,因新龛之累增,今愈显其丑恶矣。

江流下十五里,广元县城对面,江之右岸,又有佛教中心一所,倚岩建寺,层楼高耸,此皇泽寺也。

寺已累缮,因有唐武后真容殿。昔武士彠为利州(今广元)都督,生后于此,据武后碑文,此寺诸佛龛之开凿,在七世纪末。不幸山岩崩塌,原有工作已毁,而又无铭题可以证明现存诸龛(有二龛极重要)是否古物也。

寺后岩上有一洞,吾人暂名之曰"方柱洞"。洞宽深各二公尺五十分。三壁皆有一佛二尊者像,结构干枯柔弱,显属宋代体范。洞中有方柱,柱分数层,上刻有记,审其年号,识为宋神宗时(1068

至1085年)石刻。此柱雕饰甚多,其体范与云冈之柱极相近。此洞之中,惟此物可注意而已。

再上岩之右方,"大洞"在焉。此洞为籍文所不录,亦无铭刻可寻。洞高六公尺,其像有七,唐体也。中之佛陀,高五公尺,旁立二尊者,又次二菩萨,外为二天王,天王像半已剥蚀。洞之右壁,菩萨与天王之间,有一带兜雕像,其头甚奇,雕刻亦颇饶兴趣。洞里左角雕一信男跪侍小像,像为凸刻,此与习见信男像雕法有异者也。

此洞之宽广,应为岩上之主要洞窟。不具铭刻。初见之,即疑为则天时作物,盖其大(除嘉定大佛之外)为四川诸造像之冠,而与则天时龙门大佛像雕刻又同时也。顾其制作,除带兜之头而外,实不堪命为唐代雕刻家作品也。抑或四川雕刻家派别不同。惟就其线道大体言,此种造像,似为唐宋过渡间作品。

巴州南龛山(译者按:原译音作 Nan k'an chan,不知南龛是否其原名也)又有一第三唐代千佛岩,其数之多,其体之类,重要与广元千佛岩相等。据最古石刻之文,多数佛龛凿于唐代,皆长方形,与广元同。中有一龛,观其像改造修缮之痕迹,可以代表一切。此像为一重修重装之菩萨,其旧有之头,在其足下,其新有之头,为练土所新塑。

巴州之千佛岩,位置在进入四川大道之东。至绵州之西山观,则在大道之内也。是为赴成都要站之一。城西五里,有第四千佛岩焉。其积数固不及前此诸岩,然其内容,则较贵重。吾人初见唐以前佛教作品,即在此处。

西山观在城西小山,半山之中。山为红沙石质。寺已倾颓。佛龛在寺后及寺左,凿龛甚低,高约一公尺。昔日虽已重再装饰粉涂,今剥落已久。其原状较广元之千佛岩为易识。

初见之，即确识为唐代作品。兹就龛下路之所经，自东至西述之。

甲、此处诸石，为山顶崩颓之石，即于其中凿龛造像，容像七尊，唐代特有之数也。

乙、大石一块，上有一近代所建之亭，石上雕有信男信女诸像，上有咸通(871年)年号。

丙、又西，别有一大石，凿如洞形，宽二公尺五十分，深一公尺八十分。中为佛坐像。旁为尊者菩萨诸像。背面亦有雕像。其两壁所雕之信男信女像，为四川佛龛中造像之美品，左右各三行，平面浮刻二三公毫。其绘画及其轮廓，与龙门之信男信女雕壁，盖属同一体范。其所保存之美丽庄严，惟旧时之毛笔绘画可以拟之。

此亦为唐时作品，缘其信男之冠，与"乙"石所刻相类也。

丁、更西十至十二公尺，有一大石，上有大业六年(610年)年号，是为吾人在四川初见之唐代以前佛教刻品。

此年号在一小龛之右，龛高二十公分，中刻莲台，佛陀趺坐其上，两方有二小狮。

同一石上之石刻文，有大业十年(614年)至德二年(757年)两年号。此石上诸小龛，有为模唐代体范作品，有为宋代体范作品。但大多数作品之体范奇异，为四川佛教造像中所未见者。此种佛龛即在刻有大业年号石刻之周围。此种造像，得视为未留作品之造像派之一遗迹，即"隋代作品"是已。

诸龛高不逾四十公分，正面无雕饰，龛外顶如人字形，颇类龙门元魏式佛龛，而与长方形唐代佛龛又有异也。龛中之像，常为三数，一佛陀二尊者。有时只一佛陀。但无有逾三数以上者。佛陀趺坐台上，此台常为莲台。有数龛中以二菩萨代二尊者。

莲台亦有易而为曲枝高台者，中为大兽，两旁为曲枝。此台所占之地位，宽如洞等，高有及洞之半者。雕刻极精。台下有二小狮，状亦美绝。

审其雕刻，与唐代作品不同，而与中国北方之元魏作品反相近也。

洞之形状，龛顶人字形，龛中像数，皆与元魏体范相类。此处作品，虽不及魏体之鲜明，然诸像尚保存完好，其调刻之精，亦非唐人所可及。故今欲求隋代之遗迹体范，应于西山观中此隋代石刻中求之。此短期皇朝之作品，此为其仅存者也。

成都与及附近，无古代佛教遗迹可寻。循岷江而下，江口及嘉定二处，有大佛像。像虽巨，然已剥落不堪，不足与言考古，更不足与言审美也。

嘉定之南，道士滩下流数里，岷江左岸，马王洞地方诸窟，颇有可供研究之价值，是亦千佛岩之类也。其地距江面八公尺之上，有一大洞。洞右有一长方佛龛，中有凸刻坐像。洞上有小龛甚多。

洞中诸像，中一坐像高三公尺，左右为二尊者二菩萨像，亦一唐代式之布置也。

不幸诸像未能保存。尊者像已不可辨。右侧菩萨像已为荆棘所侵蚀。惟左侧菩萨像略可辨其头冠、念珠、法衣。中坐之像，应系佛陀，然其头已遍布长方榫眼，盖用以按合假面者也。现假面又毁，惟榫眼存，故舟子讹名其地为麻王洞。

洞之右壁有小龛六，壁有门可通右侧之大龛。此龛之像，为诸像中之极可注意者。质言之，四川全省无虑万千佛像中最精美自由之造像也。

龛为长方形，宽二公尺七十分，高二公尺七十五分。壁工粗

劣，但盛像极美。像体柔和，雕工精细，趺坐壁边，俯视江面。两臂（已缺）之按合点，亦甚巧合，面貌已毁。然尚留有二美髻也。

壁无刻文，籍无记载，但此像为菩萨像无疑。其雕刻盖本于“希腊式与佛教式”之混合体，亦不待讨论而自明。盖为一印度型体，服希腊外衣之造像，此为吾人所未逆料者也。至造像之时代，虽无文可引，但有下之二事可以推之。

一、大洞内诸像朴素雄健，龛中坐像则柔和特别，而其头上圆光及诸饰品，亦见殊异。可见其艺术与唐代艺术不同，其艺术不仅为唐以前，且为隋以前之艺术也。

二、距其地二百公尺，有一北周时碑。第一字虽已磨灭，周字尚隐然可辨。

由是推之，此佛教美品，应为四川北周时之造像独存者也。

夹江县亦有千佛岩，建凿之时虽较晚，然亦属唐时作品也。佛龛甚众，造像亦夥，其特异之点，则在其像头肢之多，新异造像之出现。此种造像似不出于“唐派”。

此外在岷江流域所见诸像，其有助于唐代佛教造像术之说明者甚微。唐以前之作品绝无，惟有时见有宋代之作品，如中岩寺诸造像是也。

前所列举诸佛寺，《省志》皆已志之，惟不乏错误之点。下述之刻品，为籍文所未载，而发见亦出于偶然。此物实为四川最古最可宝贵之佛教遗迹，盖纪元529年梁时遗物也。

吾人发见此物并不在一种千佛岩上，而在汉代双阙之中，即前文所述之“平阳阙”是也。此阙在绵州之东八里，距西山观隋代遗迹十四五里。

此二阙为纪元2世纪时汉代遗物（译者按：《四川通志》卷六

十，绵州有汉平阳府君神道，题云“汉平阳府君叔神道”，凡八字，刻于石阙椽首），保存尚完好，惟其阙身为梁时人增刻佛像。

此种三四百年后之增刻，已将原有汉刻损毁多处，其事固可惋惜，第此增刻所留存之教训亦不少也。

增刻题有大通三年，“大”字仅存下半。别有一处刻有“梁主”二字，其为529年之刻迹，绝无可疑。阙身之上，凿有佛龛，其式小，而其形极异。唐龛为长方形，元魏龛顶为人字形，而此处龛顶则独为穹顶形（ogive）。此种曲线，在中国佛教作品之上极难见之，而在印度造像术输入之前，四川某汉代圹石之中，始有具此形者。

龛中雕像，亦与他处佛像有异。龛中仅有一像，服飘扬之衣，像首已亡，不能详为何像，疑为“菩萨”之像。要之其衣服之体范，无一与“希腊与佛教混合式”造像相同者。而其龛形之为穹顶形，与其衣服之宽博，而垂角，左右相称，显为纯粹中国雕画，与汉代体范显有关联。即在同阙上之汉刻中，已可寻见其式样矣。

由是观之，此为四川之梁代佛教刻体之独存至今者也。

据前所述四川现存之造像，种类各别，有梁体、北周体、唐体、宋体诸体。而每代各供献其中国佛教史之材料。

宋代为时虽晚，其模仿前人刻石之法，显而易见。其雕刻之留存，可使吾人知龙门之信教热忱久已销灭，而四川之佛教，宋时尚盛。宋代作品留存之多，种类之杂，特别研究之，成绩必可观也。

唐代作品最多，散布最广，形态亦最庄严，无论散在何地，一见即知为唐人作品。唐人凿建佛龛，尤易认识。其长方形，其额彩，其护法天王，其信男信女，皆唐代特点也。惟夹江县一部，较为不同，吾人得名之曰“盛唐体”。除此之外，所有唐代雕刻，皆以龙门诸窟之唐体为惟一体范也。虽然，龙门造像具有美术及技艺的优

长，为别处匠师所不可及。

隋体雕刻（绵州西山观）之特点，即在其不可否认之古体，其像数之有限，台座之饰刻，佛龛之形，皆与唐体远，与魏体近。夫唐刻既为师法龙门之唐人造像，而西山观之隋体，与龙门云冈魏刻之关系，亦不问而自明矣。

至马王洞之北周遗迹，平阳阙之梁代穹龛，求其原始标型，较为困难。前者似直接受印度之影响，后者乃遵汉代“世俗造像”之结构。

顾其作品留传之少，只据其相类之点而言，结论未免过早，或近于主观，兹再就四川佛教输入之通道言之。

中国北方通四川之大道，当然不外西安、汉中、广元、保宁、绵州、成都一途，亦即史所称之“金牛开道”也。吾人即于此道沿途之处，发见唐代诸作品，如广元皇泽寺及千佛岩、绵州西山观等迹是也。惟巴州之千佛岩处地稍偏，故遗迹有异。

再就诸唐刻完全相类一点而言，其最早之广元千佛岩，不逾纪元722年时，距龙门造像之盛，已有百年。吾人得谓四川之唐代佛教石刻，为龙门唐派之流传品也。

至绵州汉阙梁刻之年，为纪元529年。其时固晚于云冈、龙门，顾其刻绘为中国古体，其输入者，似由别途，亦意中必有之事也。当时适为梁武帝崇奉佛教之时，梁朝定都南京，当时输入者，或从水路入四川，而输入之事，只为意匠，而非影像，本地之人乃仿汉代石阙旧刻，造作佛像，理或有之也。

此特为假定之辞，入四川之通道，经历史及考古学所证明者，惟自东北至西南一途而已。魏之影响及于四川之隋，龙门之唐影响及于四川之唐，乃由此路也。

至若诸刻“发源之艺术”，亦颇难言，不仅中国佛教艺术为然也。唐时外省之雕刻师，粗仿龙门唐代列朝刻品，至龙门刻品亦非创作，亦师法元魏之云冈、龙门诸作，元魏可谓为全东亚佛教造像术之传授者也。顾元魏亦受影像于中亚，而此处之希腊与佛教混合艺术，即以健陀罗为中心也。

顾自近人分析此种混合艺术之后，业经说明灿烂于12世纪时之健陀罗艺术，适当希腊造形艺术衰微之际，其艺术已落下乘。

然则四川与中国北部之佛教艺术，其原始艺术既已不堪师承，其雕刻应极恶劣，只有小像，应无大像，只有佛龛，应无建物。总之，其遗迹只能供宗教之证明，而其造像不足以供审美者之赏鉴也。

孰知其事实有不然者，有某处之佛教遗迹，其美丽已达于不可否认之程度；其美丽，并不本于原始艺术之传授，亦显而易见。考其源来，盖出于地方艺术或世俗艺术，与佛教无关系也。

如遒劲的、谨严的、卓绝的元魏菩萨造像，又如都美的西山观隋代佛台，嘉定之北周造像，得谓为特有之创意，特有之巧作，此或为民族所固有者亦未可知。

但无论如何，龙门宾阳窟之信男信女诸浮刻之卓越的调合，暨绵州西山观之小样仿刻，除中国画师之外，实无他师可以师承也。即如其模仿外来模型之作品，制作虽劣，一旦表现其纯粹的中国艺术于其线道之中，即一美掩尽诸丑，一如其汉时纯粹中国作品之压倒多数佛教作品也。

至此两种相违的潮流，于二千年之中国造像术中，如何流传，如何有时混合，将来有暇，再说明之。

第四章　渭水诸陵

本章为报告之末章，原拟说明中国封墓艺术，现只说明西安一带帝王陵寝。至封墓艺术之研究，俟诸异日。原拟之中国地理笺注，亦未便归纳于本文之中，亦改期刊布。

陕西一省土丘无数，小仅杯土，大如高阜。或于古城四围，星罗棋布；或在平野之中，孤丘高竦；即山冈之上，亦不乏土作建物。

诸丘形线多殊，为数颇众。据吾人所知，在今之前，从未有人用科学方法从事探考。吾人今亦只能叙述其外表而已。吾人惟知其地面土质与附近之土质，皆为黄土，丛生同类之草，供鹅羊之食而已。至其地中为混合土欤？抑为硬石欤？为材木欤？抑为方石欤？吾人不知。其用处及其现在之内容，惟中国书本之传说，或有限之假定，可依据耳。

此种土丘，大致以坟墓为多。设有一固形体之土丘，左右相称，下基方而上身形类截头圆锥者，无论其大小皆属坟墓，可无疑也。

此外则为古之宫殿坛台之遗址。若欲知为何种建物，惟用锄掘始获知之。故吾人现在之研究，不在此种土丘，而在渭水流域所存之高丘，其位置形式经籍文传说碑志所证明者也。

西安平原为古代建都之所，其附近帝王陵寝甚众。兹就调查

所及，分述于下。

西周诸陵

中国帝后之墓，皆名曰陵。陵者，大阜也。志书虽亦记有商代及上古之墓，吾人之调查，则暂以周代为起点。盖周以前诸墓，不能必其为真也。

周代诸陵之真实，固不能与汉代诸陵相提并论。然吾人以为除别有保留之说外，暂宜列入考古之范围。

周代诸陵在渭水左岸，黄土高原之上，今咸阳县之北。咸阳古都，在今县东数里。

文王陵　此陵为诸陵中之保存最善者。周围有大方垣。内有祠。祠前有碑三十二。陵下方而上锐。陵基广百公尺。陵顶平凹如火山口。

武王陵　陵形如前。吾人因为时所限，测量而已。

周公旦陵　墓形及其大小如文王陵。其顶为方形平台，每方各三十步。墓南百五十公尺有二堆并列，似为阙址。墓所有碑无祠。

成王陵　形与诸陵无大异。破垣围之。内有祠已毁。垣内有碑。

康王陵　形如成王陵。文、成、康三陵位置于等边三角之三角。

文王殁于纪元前1135年。武王殁于前1116年。周公殁于前1105年。成王殁于前1079年。康王殁于前1053年。周陵在咸阳之北者，只此而已。昭王南征不复，故无陵寝。穆王之陵在西安西南十五里。以上诸陵，确为周初陵寝欤？此点尚未敢断言也。周代诸陵，有某点与汉陵相类，较汉陵小，似模汉陵而未善者也。原

有之陵，或较今为高。古若有方垣，或不在今垣所建之处。

至诸陵之位置，吾人以为确在此处。惟《四川通志》引《皇览》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而多数载籍，皆以冢在咸阳北之毕原，现有诸碑可以证也。

秦陵

成康以下七王之陵，吾人未详其所在，而籍文亦未载之。（译者按：《临潼县志》云："幽王陵，在县东北二十里，戏水原上。"）至秦代诸陵，可执《史记》考之。

秦文公（殁于前716年）、宁公，葬秦州之西山。前621年穆公卒，葬雍（今凤翔），吾人曾游其处也。

秦穆公墓　墓在凤翔府城内，东南隅。荒地之中，有一小丘，修葺未久。前有乾隆时立"秦穆公冢"碑。城南有三圆丘，亦有碑记，为殉葬三良之墓。

《史记·秦本纪》所载，其余诸公之墓，今皆不详其所在。秦惠文王殁于前311年，葬于毕陌，即今咸阳之东北。今渭水之北，颇有无名大冢，吾人不知何冢属之。秦武王之冢，亦在其处。

假定之秦武王墓　墓在咸阳县东北二十里。按《陕西通志》，秦武王（殁于前307年）之墓为咸阳东二十一里毕陌之一大冢。就地理方位言，应作咸阳东北，不应作咸阳东。不然，墓应在渭水之南，地属长安，而不属咸阳也。既在咸阳，应为此地。

此墓为平原中最美坟墓之一。其墓址每方在一百七十五公尺以上。

秦昭襄王殁于前251年。庄襄王殁于前247年。据《史记》，皆葬茝阳。其地皆在临潼、灞水之间。吾人未见其墓，且为时间所限，未能详细寻求。

秦始皇陵　吾人行至新丰，有一老人指示其处。此陵为所见诸陵中之最古者，似未更动，故其壮丽亦逾诸陵，陵在临潼县东三公里有半，郦山之麓。陵基方三百五十公尺。自基至顶高四十八公尺。自外层地平至顶高六十公尺。其容积土量有五十万立方公尺之多。若合地下工作掘动之土量计之，其数当更多也。兹引《史记》之文，用见其工程之大。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秦始皇墓内之设备，固如右文所述，然吾人今日亦无从辨其虚实。据其穿治郦山之说，其下必有隧道，其宫观必大于今日陵土之所封，但无山东汉墓石室隧道与圹室相连之布置。度其设备，必有异于汉墓也。

陵东南土台之外，有高五六公尺之土堆，似非偶然有之，盖周陵周围亦见有之，汉陵周围亦有之。其神道之中皆有建阙之基之迹。始皇陵之神道，是否在南方如通行之例，抑在通咸阳之西方，或北方，皆未能详。但其陵之四方定向，与方向正合也。

据籍文所记，始皇陵前已为项羽所发。其发掘之程度如何，吾人不知。今观其形，似未完全破坏。如完全破坏，应有倾陷之迹，唐末黄巢之乱，闻亦在墓中运出珍宝云。

西汉诸陵

兹依年代之先后，将吾人所见诸陵，次第述之。西汉诸陵多在渭水左岸，其行列之方向，由西南至东北。至周代诸陵，则参插在此行列之间，即吾人后文所称之“北列”是也。

高帝长陵　高帝殁于前195年，陵在北列之内。据《省志》及后立之二十余碑，已证其陵在此。所立诸碑，自革命以来，已多倒仆，其文尚多可读。

陵为六方形，东西向宽，南北向形如三角，皆扁平，惟陵顶圆。

惠帝安陵　惠帝殁于前188年，吾人未至其陵。长陵东南之一陵，似即安陵，其形较小。

吕后陵　吕后殁于前180年。其陵虽无碑志，惟据载籍：“高后崩，合葬长陵。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等语，应为此陵无疑。陵长一百五十公尺，如截头圆锥，形势卓绝。

薄太后南陵　陵在西安东南，灞水、浐水之间，白鹿原上。陵为六方形，似长陵。其方向则异，其正面不向南而向东南东之间。其下长一百七十公尺，宽一百三十五公尺。土工寻常，然形胜极佳，西安临潼两地，均可远望见之。

文帝霸陵　帝为薄太后子，殁于前157年。其陵即在南陵之傍。文帝遗诏：“不治坟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与吕后陵之改易水道者有间也。其陵故不显露。当时治陵仅发卒三万一千人，较之用七十万人之秦始皇陵，颇悬殊也。其陵墓址长一百六十公尺，形类南陵，正面南向。

景帝阳陵　吾人未至其陵，似已远望见之。陵在北列之极东，高陵县西南三十里，亦即咸阳县东三十里。前152年时，曾建桥于

渭水之上，以达阳陵，其桥应在灞水汇流处之上流。

武帝茂陵　帝殁于前87年。陵在北列之极西，兴平县之东北。陵形方而大，其顶不齐。陵前有乾隆时所立碑。霍去病墓即在其附近。就封墓方面言，此陵无甚可注意之点。惟陵山有大石被覆，今尚见其碎块。观其陵前神道，列有石像，与梁明两代相同，可以证古陵之四周方垣中，各开一门，各门神道之口，建有石阙。

昭帝平陵　陵在咸阳东北，北列之内。前有乾隆时立碑。此陵之顶，较诸陵为复杂，在半山之间，稍凹，略类秦始皇陵。此陵长宽各二百公尺，为吾人所见汉陵之最大者。

平陵与吕后陵之间，有数高冢，尚未详其为何人之墓。中有一冢较为特别，冢顶方而具齿形，中凹如火山口。诸冢之大者，疑为秦之诸王（如秦惠文王）或汉之诸后之陵。较小者，疑为太子诸王大官之墓。

宣帝杜陵　帝殁于前49年。陵在西安东南，与薄太后陵对距浐水流域，远处固可见之。惟陵墓不依天然山势，陵形亦类截头圆锥，长百六十公尺，宽百五十公尺。有乾隆时立碑。

杜陵之北，墓冢甚多。其西有一明代冢，观其神道前石兽之雕刻体范，可以知之，此种晚世建墓，似已受邻近汉代大模型之影响矣。

元帝渭陵　帝殁于前32年。陵形亦类截头圆锥，中有凹陷，如昭帝平陵，大小几相类。陵在北列之中，周代诸陵附近。

成帝延陵　帝殁于前6年。陵在北列之内，亦作截头圆锥形。下基长一百七十五公尺。外垣今尚可见。各垣之外，皆有双堆。陵前有碑。

由此陵西行有一冢，不知为何人墓，复西则为义陵。

哀帝义陵　帝殁于前1年。又西为康陵。

平帝康陵　帝殁于纪元后5年。兹二陵与前述诸陵，无若何特殊之点。

西汉诸陵，于纪元1世纪曾为赤眉所发。吕后陵受害尤甚。然据史载，渭南之霸陵、南陵未发也。

唐代诸陵

唐代都城在今西安之南附近，有陵寝数处。

临潼西南约二十里有数陵，据碑文为唐懿宗、韦后福陵、王后安陵、王后寿陵。

新丰西门附近有一大陵，为唐奉天皇帝齐陵。别有二陵较小，为文敬太子与惠昭太子墓。

吾人所见渭北诸陵可注意者，惟咸阳号为顺陵之魏王武士彠墓，与乾州之唐高宗乾陵而已。此二陵尚存有唐代雕刻之美像。沙畹教授研究已详，吾人亦无从赘一辞矣。

以欧洲人所知中国之历史记载，与现在之古代遗物比较之，极不均平。吾人如追溯其四千年以上之历史，不特在上古，即在纪元前后，所供研究之材料，实不及埃及最古时代之多。此非中国与古代诸文化策源地，考古材料多少之悬殊，特欧洲人之寻研所用者，为“中国方法”，纯从事书本之考究耳。史籍甚多，其在此中摸索，自较探考于广土众民中为易。而于地上或地下之实地调查，今甫开始未久也。

吾人之考古队，即在调查过去之客观的证据。

吾人因事实之不可能，虽未从事于发掘，顾就经验言，作表面之调查，亦能获有结果也。兹在西安平原所见之古冢大致如下。

一、前1122至前1053年间之周代陵寝。

二、封建时秦国诸公诸王，及统一中国之秦始皇陵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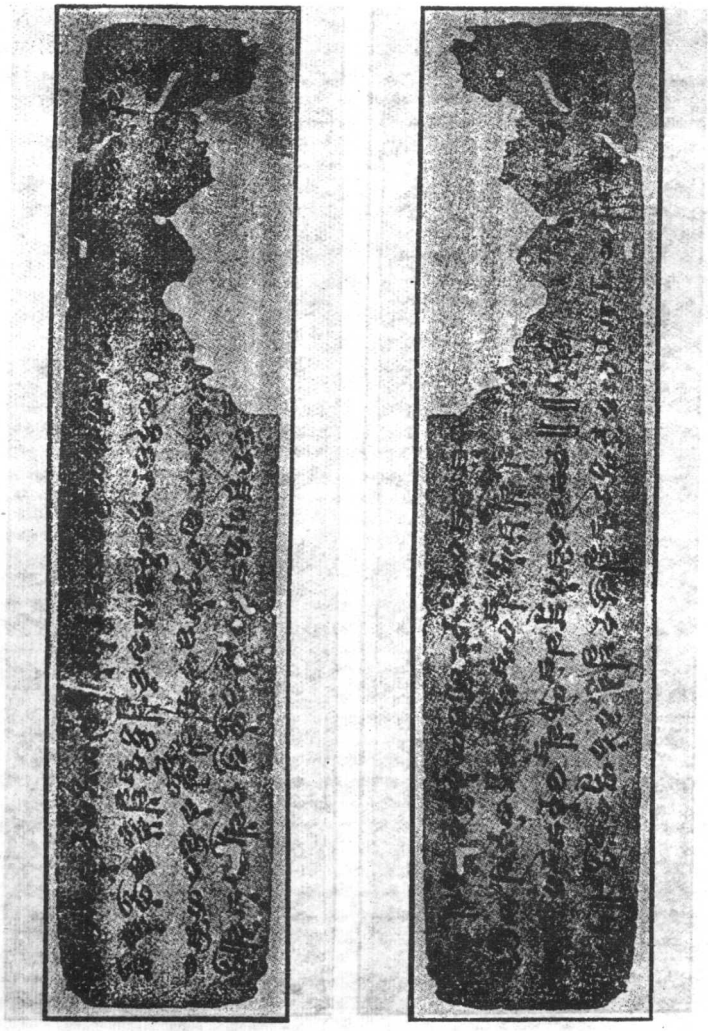
三、西汉十三陵(内有二陵未到)。

后二项陵寝，自周之亡至王莽篡位，其时为前247年至纪元9年。

调查周代诸陵之外观，固未敢断言其虚实。第秦汉诸陵，所供是时风俗丧仪诸知识之价值，可得言也。昔之遗冢，今尚存在，即史家所记之壮丽城台宫阙，今亦不难寻其遗址。秦宫阿房，渭水石桥，古实有之，非饰笔也。

吐火罗语考

甲种吐火罗文字



乙种吐火罗文字

序

冯承钧先生过去曾经翻译了法国伯希和与列维两人关于“所谓吐火罗语”的论文四篇。这些论著对于研究我国新疆维族自治区在库车和焉耆一带的古代民族(部族)的历史和语言均有贡献,因之对于编写“中国通史”和东西交通史的文化及经济交流部分亦有参考价值。现在冯先生译文遗稿即将出版,我们表示欢迎。

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部族,首先应该明确他的共同语言,和共同语言的使用情况。在汉、唐时期,当时所谓“西域”东部的龟兹国(库车一带)和焉耆国(焉耆一带)的人民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还曾为汉、唐所吸收,并且在古代东西交通上也有过一定的贡献;但他们是什么样的部族呢?文化是什么样?若只根据有限的汉文文献,零星的记载,还得不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前1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库车和焉耆附近不断发现汉文和其他文字的文献以及文化遗迹等。此时中国被帝国主义国家压迫,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帝国主义国家文化侵略者就在这些地方大事劫夺。前后计有德、英、法、日以及沙俄等国,其中德、英、法抢掠最多。所有宝贵的文献和遗迹几乎大部为他们盗劫和损坏。在这些宝贵的文献和遗迹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古部族住民的共同语,看到这个部族的人民所创造的高度的文化艺术。只是这些文献还幽禁在异国,尚未回来幸受社会主义文化高潮的薰沐,发挥研究上的潜力,极可痛心。“所谓吐火罗语”问题的争论亦正是这些文献研究上所引起

的。

关于吐火罗语问题的讨论，约在40年前就开始了。重要论著不下三四十种。内容可分两类。第一类为纯语言学上的问题。经过二三十年的研究已经肯定为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的一支已死亡的独立语言。第二类为关于这一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定名问题，亦即在龟兹、焉耆一带使用“所谓吐火罗语”的情况，以及把当时这一带使用的语言称为“吐火罗语”是否恰当。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是一个头绪纷繁，假说最多，而又矛盾丛生的问题。所以参加论辩的专家虽然很多，但终究还留下一些缺点，不能完满地解决。当然这是资本主义学者治学方法上像繁琐的考据学之类的缺点和局限性，而尤其重要的应是那些文化侵略者，盗窃我国文物加以损害支解，和霸占掠夺的惨痛结果。

在已经形成的繁琐辩难中，列维论证了“所谓吐火罗语”的乙种方言是库车古代龟兹人民使用的语言。这便是译文的《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以后又论断甲种方言，即译文的《吐火罗语》。这个问题在1930年前后引起争辩热潮，伯希和总述了这些问题，引用丰富材料，提出新假定，便是译文中的《吐火罗语与库车语》。随后他又写出了《说吐火罗语》以作补充。二人的论文均以深沉细微、史料丰富见长，我们从中吸取有益的知识，对于研究工作是有很大裨益的，尤其是关于古代民族史方面更有帮助。但是不应再受这样的局限性。同时四篇论文供给了问题的基本知识，亦是他的优点。以后发展仍然可观，应加补充。

在伯希和写了《说吐火罗语》以后，欧洲一些学者又作了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辩难，如

谢喀的《论吐火罗语的真实性》(Und dennoch “Tocharisch”

SBAW.〔1937〕p. 130 sq.）曾择要发表在（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13〔1937〕p.329 sq.）我曾将其择要译为汉文。

痕宁的《阿尔凡》和《吐火罗》（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SOS.9.〔1938〕,9.545 sq.）

同上:《吐火罗语之命名》（The Name of the "Tokharian Language", Asia Major 1,〔1949〕p.158 sq.）

温德肯的《"阿尔西"的语源考》（A. J. Van Windekens: Note sur l'étymologie de ārçi,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18〔1939〕,p.955 sq.）

同上:《白匈奴和"阿尔西"》（《试论吐火罗语称谓》）（Huns blancs et ārçi〔Essai sur les appellation du "tokharien"〕, Le Muséon 54,〔1941〕p.161,sq.）

同上:《再论吐火罗语称谓阿尔西》（Encore l'appellation tokharienne Arçi, Le Muséon 57〔1944〕,p.177 sq.）

同上:《吐火罗语的比较形态学》（引论部分）（Morphologie comparée du tokharien,〔Louvain〕〔1944〕, Introd. p. IX.）

同上:《吐火罗语方言的语源集》（引论部分）（Lexique étymologique des dialectes,〔Louvain〕1941, Introd. p. XV. sq.）

柯诺的《于阗语和吐火罗语》（Sten Konow: Khotanese and "Tokharian"），见《于阗语杂考》内（Notes Concerning Khotanese）Norsk. Tidskrift for Sprogvidenskap. 13〔1942〕p.209 sq.

同上:《白匈奴人和吐火罗人》（The White Huns and Tokharians）Festskrift til Profesor Olaf Broch.（1947）

费约沙的《龟兹语医与巫的文件残卷》（引论部分）（J. Filliozat: 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éens de médecine et de magie）Paris, 1948,

Introd. p. 11 sq.

贝烈的:《吐火罗语研究之近况》(H. W. Bailey: Recent Work in "Tokharian") TPHS. (1947) p. 138 sq.

温涅考夫的《吐火罗问题在那里》(J. Umniakov: Où en est le problème des Tokhars) Vest. Drev. Ist. 1940

哈伦的《论月氏问题》(G. Haloun: Zur Üe-tsë-Frage) Z. DMG. 9L. (1937) p. 243 sq.

陶玛斯的《楼兰鄯善的早期住民》(F. W. Thomas: The Early Population of Lou - lan - shan - shan) J. Greater India Soc. (1944)

闵辰黑芬的《月氏问题的重新考查》(O. Maenchen - Helfen: The Yüeh - chih Problem Re - examined) J. AOS. 65. (1945) P. 71 sq.

这十几篇都是从1936年以后发表的比较重要的论文,多为冯先生所不及见,特为补出,供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一个问题的参考查阅之用。

在这四十年"所谓吐火罗语"问题的争辩中,有些问题已经有了结果。如在语言使用情况和命名方面已成结论的有:

一、"吐火罗语"的甲种方言即为古代焉耆国中人民的通用语言。

二、"吐火罗语"的乙种方言即为古代龟兹国中人民的通用语言。

三、这两个方言亦仅为一个语言的方言差别,应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可以称"焉耆龟兹语",不应再称为"吐火罗语",因为那时吐火罗地方并没有流行这种语言,不论是甲乙任何一种方言。但学者已经用惯了这个所谓"吐火罗语"的名称,一时还扭转不过来。

其次,关于回鹘文《弥勒下生经》题识中的"吐何哩",前时拟读

为“吐火罗”(toxrï)是错误的。应读为“吐何哩”(twɣry)。大约是粟特文中“四吐何哩”的同字。而这“四吐何哩”是包括别失巴里(Bišbalïq)、高昌、焉耆等。

还有在甲种方言中“阿尔西”(ārçi)一名,有认为是自称其族语之词,有认为是“亚利安”(ārya)一词之变音。但突厥碑文有“九阿尔西”,其地即指焉耆(我曾论证“九阿尔西”,即“九城焉耆”,“焉耆”又译“焉夷”即“阿尔西”)。所以认为“亚利安”不妥,当仍是自称。

至于说白匈奴(哌哒)与吐火罗的关系问题,已遭到反驳,即不再论。

重要结果大体如此。其他问题仍有争论,但基本上已可解决。回忆冯先生以病弱体质,处于恶劣环境之中,译此烦难问题的论著,艰苦情况,犹历历在目。今虽久已去世,而辛勤劳作之精神,感人至深。兹值冯先生译文印行之际,简述对此问题争论的意见,并补述译文后的新结果,便利阅者,更藉以纪念先生之劳绩,永怀不忘。

1956年6月20日

王静如序于北京

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

见亚洲报一九一三年九十月刊

列维撰

近二十余年,德、英、法、俄诸国探考家,在新疆发见无数古书写本;携归之后,分由各语言专家整理。其中有数种语言,为从来未研究之古语,经欧洲学者据一突厥文写本,而暂统名之曰吐火罗语(tokharien)者也。其中有数字,如三之为 trai,八之为 okdh,父为 pacar,母为 macar,与印度欧罗巴系之语言又颇相类,遂断定其为属印度欧罗巴系之语言。此种语言不止一种,德人由吐鲁番携归之文件甚多;经谢额(Sieg)谢额凌(Siegling)二氏之考订,又别此吐火罗语为 A,B 二种。兹译为甲乙二种吐火罗语;甲种语言流行较古,柏林(Berlin)所藏文件多属之;伯希和(Pelliot)自库车之 Douldour - Aqour 地方及敦煌二处所携归者,皆属乙种语言。斯坦因(Stein)第一次自和阗携归之文件中,亦有一属乙种语言之残片。据其发见之地带,考其语言分配之区域,甲种吐火罗语流行于天山之北,乙种吐火罗语流行于新疆中部及南部。后法国列维(Sylvain Lévi)教授又改名甲种吐火罗语为焉耆语,乙种吐火罗语为龟兹语。此文即其研究龟兹语残片所得之结果也。

1927 年 11 月　冯承钧识

自库车赴拜城及赛里木(Saïram)高原之途中,西北距库车约十

六公里，即为山峡；层峰夹峙，一线中通，峡口有一卡伦（qaraoul），今名夏德郎（Saldirang）者是也。在此卡伦小岩之上，有一古垒，伯希和君于1907年初，即于是处雪中发见多数婆罗密（Brāhmi）字木简，泰半已经损缺不完，仅有数简尚保存未毁。其简为长方形，宽在八至十六公分之间，高在四至十公分之间。简之四面中间，刻有V形缺口，盖为以绳编连之处也。

兹将此未损之简文译出，最完之简，宽十三公分，高七公分，除右方缺损二字及墨迹褪色之处外，大致可以辨识。其文如下：

> ywarttas 书于……在盐关。汝自适用此符，现自……来，偕行者共十人，马共五匹，牛一头，放行勿诘；汝亦不得有所留存。ksum 二十年七月十四，Yo。（署名）

此简 ywarttas 一字未详其义，大约非人名即职守。其他诸简常有 sletas pinkan 二字；sletas 与 ywarttas 应为相等之名。盐关之原名，为 Salyinsai yonyai，应为伯希和君发见木简古垒吐火罗语之名称，盖各简中缴简之地皆有此关名也。至收简之人，此简已漫灭不可辨，他简大致为 Sknatatte，亦有名 Putatatte 者。此二名显为梵文 Sanghadatta，Buddhadatta 二名之变音，盖吐火罗语无响音（sonores）也。简末之 Yo，必为 ywarttas 之花押。证以 Douldour-Aqour 地方所得之簿记，如 Wiryamitre 即梵文之 Viryamitra，省署作 Wi；又如 Waryasene 即梵文之 Viryasene，省署作 Wrya；又如 Ynanasene 省署作 Na；又如 Moksacandre 省署作 Ma。其中 O 与 W 互用之例亦多；如 onolme 等若 wnolme，华言人也，orocce 等若 wrocce，华言大也。则 Ywarttas 省署为 Yo，亦属当然也。

观此简之文，其性质不难明了，盖为一种队商出入关津之通行证。诸简中人畜之数，常列举之，可以见当时中亚道途之生涯，及

交易之活动。队商由此垒赴彼垒,须领此证。到垒即缴,另领新证,赴下站之垒。此垒存简之多,亦不足异矣。此种木简官称为 or - sacakaré、or,华言木也。sacakare 即梵文 satyakara,巴利文 saccakaro 之转,华言证也。此字系借用印度官厅之用语,抑为佛教之语流行于龟兹官厅者,此时尚未能断言。总之,此字在佛教中为一种誓愿用语,其效甚著也。

由此种文件所见之要点,在语言方面,缪莱君(Müller)暂名此种语言为乙种吐火罗语(tokharien B)。吾人就其来源而定其名曰龟兹语,盖此语文件几尽出于库车一带。此种语言不惟 Douldour - Aqour 之寺观(疑即丁谷山之千佛洞)用之,官厅通行证中亦用之。故吾人定名为龟兹语。

其中有一不明之点,即龟兹语流行之时代是也。读伯希和之木简,可以解决此问题。前译之简,年月为二十 ksum 七月十四,其他诸简为一、五、六、十九、二十、二十一、ksum 诸年。此 ksum 一字,别于《法句经》Dharmapadas 残片中见之。

Douldour - Aqour 寺中之簿记,亦有一、四、五、六、诸 ksum 年之记载。簿记中有二残卷,长四公尺十公分,内载关系寺中之事。其记年为二十二、二十三 ksum,后为三 ksum。此 ksum 一字似非年名。盖十二月之年名,别有单数之 pikul,复数之 pikwala 字也。

余以为此 ksum 或为当时中国式之年号。上记之 ksum,年号为二十三年。中国纪元初千年中,年号为二十三年者,惟唐太宗之贞观。此种文件,疑为七世纪物也。

上之假说,不难变为事实。诸简中有一简,其背面左方有 skanatatti 一字,右方有 klasle 一字;左一字为守垒长官之名,右一字义即缴还也。正面可辨之文如下:

一行○四、牛四、放行勿诘

二行○二十一、ksum 十一月

三行○二十八、swarnata、(pi - ksu)、木上证明

四行○宣示

第三行 swarnata 后一字不明。兹于别一残简补足其义。此简有字二行,译义如下:

一行○三、Swarnate 大王写

二行○……木上证明

由是观之,第三简不明之字为 pinkam"写",Swarnate 盖为写简大王之名。此外数残简亦有 Swarnate 大王之名,如知此王为何时代之人,即不难考诸简为何时代之物。

考《唐书·西域列传·龟兹传》,龟兹有王名苏伐叠,唐太宗同时之人也。即位于纪元 618 至 630 年间,殁于 644 至 647 年间,为前王苏伐勃駃之子,后王诃黎布失毕之兄。考苏伐二字之原音为 su - var,其为 suvarna 之译音无疑。其义华言金也。中国译音常省略原名之音,故译 Suvarnate 为苏伐叠。设纪元 630 年龟兹王为 Suvarnate,玄奘经过屈支(龟兹)时,应已识之。但玄奘未举其名,《西域记》中惟言其王"智谋寡昧,迫于强臣"。读玄奘《法师传》,即不难明了玄奘评断此王过于严苛之理由。缘玄奘至屈支时,"王与群臣等来迎。明日王请过宫,备陈供养,而食有三净,法师不受",盖为教戒问题,有嫌于王,故不举其名也。但于前王,则颇为称扬。《西域记》又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夫"苏伐"既得为"金"之译音,则金花原文应为 Suvarnapuspa。《唐书》中之苏伐勃駃,应即此王。駃字应为驶字之讹。此王之二子,即分名其父之名;长名 Suvarnate,即《唐书》之苏伐叠,次名 Haripuspa,即

《唐书》之诃黎布失毕也。

人名考订既明，兹再就其年代考之。ksum 之年号，吾人初假定其合于中国年号，而 Suvarnate 之二十二 ksum，即为贞观二十一年，亦即纪元 647 年也。但苏伐叠应殁于贞观二十年之前，盖《唐书》云："苏伐叠死，弟诃黎布失毕立，二十一年两遣使朝贡。"又据《太宗本纪》，亦志有龟兹使臣于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来朝之事。顾 Suvarnate 之木简为三月五月十一月之物。前之假说，似难成立。此 ksum 应为 Suvarnate 之在位年号；其在位期间，至少应有二十三年也。按《唐书》云："高祖受禅，王苏伐勃駃遣使入朝。会死，子苏伐叠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630)献马。"会死者，不久即死也。苏伐叠立时，应在纪元 618 至 627 年之间。自是至贞观二十年(646)，其数为十九至二十八年。ksum 之年号，应位置于此诸年之间。

兹更欲详者，此龟兹语为此国固有之语欤，抑为外来侵略种族之语，如泥婆罗(Népal)之 parbatya 语与土人之 névari 并行之例欤。此节玄奘《西域记》曾明言"其王屈支种也"。则为土著之语无疑。且据中国史书所载，龟兹王自纪元一世纪以来，皆白氏一姓相承，尤足以证明其事。则古有亚利安(Aryenne)种族一支，移民于新疆，自立一国之事，是不可不考究其历史也。兹将中国史书所记龟兹之事，及余参考他书所得之文，汇译于下，以资参考。

中国国势之发展，始于汉武帝时(纪元前 140 至 87 年)。当时龟兹已与中国相接触。据《前汉书·西域传·龟兹传》云："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

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一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

又据《前汉书·西域传·渠犁传》云:“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时在纪元前102年),过杅弥(Kériya),杅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Bougour);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征。宣帝时(纪元前73至49年),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迺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前65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前32至1年),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当时汉与西域交易往来,颇有利于龟兹。汉时至西域有两道:自玉门经车师(Tourfan)龟兹至疏勒(Kachgar)葱岭(Pamir)为北道;

纪元前2年时又于北道之北，新辟一道，沿天山南麓行，至龟兹与旧北道合。（见《魏略·西戎传》）

前汉既亡，后汉继兴。初因内乱，国势不能远及西域。西域诸小国又互相攻伐，遂为匈奴所并。考《后汉书·西域传·莎车传》(Yarkand)略云："建武十七年（纪元41年）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莎车王）贤汉大将军印绶，贤由是怨恨。二十二年（纪元46年）冬，贤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贤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Bougour)，徙驷鞬为乌垒王。数岁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驷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

嗣后汉之名将班超经略西域，中国国威遂又及于中亚。据《后汉书·班超传》略云："时（73年）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74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遣吏田虑劫缚兜题，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十八年（75年）帝崩，焉耆(Karachar)以中国大丧，遂攻没都护陈睦。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Aksou)数发兵攻疏勒。肃宗（76至88年）初即位，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还至于阗(Khotan)。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建初三年（78年），超率疏勒、康居(Sogdiane)、于阗、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Aksou)，石城(Ouch-Tourfan)破之。乃上疏请兵曰：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今西域诸国莫不向化，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

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葱岭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且姑墨(Aksou)温宿(Ouch-Tourfan)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执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书奏,帝给之兵。五年(80年)超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遣使招慰,帝纳之。八年(83年)龟兹攻疏勒,超恐惧不敢前,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康居王。纪元87年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以计破之(88年)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88年)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90年),月氏遣其副王谢(Sahi),将兵七万攻超。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明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进诣京师。超居龟兹它乾城。

班超于纪元102年还洛阳后,其事业几尽瓦解。据《后汉书·梁慬传》云:"延平元年(106年)西域诸国反叛,攻都护任尚于疏勒。会得解,征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时为西域副校尉)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吏人固谏,白霸不听。慬既入,遣将急迎禧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吏人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兵反,共围城。慬等出战大破之。连兵数月,胡众

败走，龟兹乃定。”

平和以上述之方法取得，故惟以兵力方能持久。班超之少子勇，欲继父业，乃赴西域。据《后汉书·班勇传》云：“延光二年（123年），复以勇为西域长史。明年（124年）正月，勇至楼兰”，盖欲以“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彊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也。“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因发其兵击走匈奴，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自是以后，百年之间，龟兹之名不见于中国史书之记载；惟波宁（Bonin）在新疆拜城，见一永寿四年（158年）立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残碑（按原译文作 Lieou P'ing-kouo, général de gauche 亦可译为左都尉刘平国也。未见此碑文，容再考之）而已。尤可异者，《后汉书》不为龟兹立传，其事仅附见于上引诸传而已。

三国魏时（220至265年），龟兹之名始又见于史书。据《三国志·魏文帝本纪》曰：“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来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又据《三国志》引《魏略·西戎传》：是时“姑墨国（Aksou）、温宿国（Ouch-Tourfan）、尉头国（Safyr Bay）皆属龟兹也”。

西晋（265至316年）统一中国，据《晋书·武帝本纪》，泰康六年（285年）十月，“龟兹、焉耆国遣子入侍”。又据《晋书·四夷传·龟兹传》曰：惠（290至306年）怀（306至312年）末，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据《晋书·焉耆国传》，盖欲结连张凉，共御焉耆也。传曰：“其（焉耆）王龙安病笃，谓世子会曰：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遣子熙归本国为王。会有胆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率

服。然恃勇轻率,尝出宿于外,为龟兹国人罗云所杀。"又据《晋书·龟兹传》所记龟兹国之国情有云:"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

嗣后西晋南迁,长安为前秦(350至394年)所据。秦王苻坚"遣其将吕光(后光亦建北凉国,397年立国,至439年亡)。率众七万伐之(龟兹)。其王白纯距境不降,光进军讨平之"。其事已见《晋书·龟兹传》也。又据《晋书》载记所记此役之详情云:"吕光进兵(据《高僧传》,时鄯善王车师王亦从军行)至于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龟兹王帛(载记作帛,《龟兹传》作白)纯距光。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纯驱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时有预兆示光必胜,中有"夜梦金象飞越城外"之兆。"光曰:此谓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纯乃倾国财货,请救狁胡,狁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光惟有"兵七万,铁骑五千","战于城西,大败之。帛纯收其珍宝而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光入其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乃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据《出三藏记集》云:"时建元十九年也。"秦建元十九年,为纪元383年。

读《鸠摩罗什(Kumarajiva)传》,既可以知4世纪时龟兹之一僧人学识之宏博,又可以见中亚学者如何修养磨炼至于成立也。鸠摩罗什事迹,各书记载者不少;最古者为纪元519年刊之《高僧传》,520年刊之《出三藏记集》。两书所记,大致相同。鸠摩罗什之生亡年代,据伯希和之考订,生于纪元344年,殁于413年。据

二书本传略云:鸠摩罗什,天竺人也。家世国相,祖父达多,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炎(本传原文作炎应作罗),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rajaguru)。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诸国娉之,并不肯行;及见摩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怀什。什在胎时,其母慧解倍常,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既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语(按郦道元《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亦云:"龟兹北四十里有雀离大寺",此雀离大寺,显系模仿白沙威〔Péchavar〕迦腻色迦〔Kaniṣka〕王所建著名之莺雀寺)。什生之后,什母乐欲出家,夫未之许,遂更产一男,名弗沙提婆(按鸠摩罗什之命名,乃从父之姓鸠摩罗〔Kumara〕,又连以母之姓耆婆〔Jiva〕,兼取以为名焉)。后定求离俗,夫乃许焉。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sutras)。日诵千偈(gatha),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又诵毗昙(按即 Abhidharma 之省称)。什年九岁,随母渡辛头河(Sindhu),至罽宾(Kasmir),遇名德法师盘头达多(Bandhudatta)。什从受杂藏中长二含(Madhyama Agama,Dirgha Agama)。达多每称什神俊,遂声彻于王,入宫论挫外道。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什母将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罗汉(Arhat),见而异之,谓其母曰: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毱多(Upagupta)无异。什进到沙勒国(Kachgar),顶载佛钵(patra)。停沙勒一年,其冬诵《阿毗昙》(Abhidharma)。沙勒国有三藏沙门(sramana)喜见,劝王尊之。什以说法之暇,寻访外道经书,博览《四韦陀(Védas)典》,及《五明诸论》;阳阴星算,莫不毕尽。时有莎车(Yarkand)王子兄弟二人,委国请从,而为沙门。兄字须利耶跋陀(Surya - bhadra),弟字须利耶苏摩(Suryasoma),苏摩专以《大乘》

(Mahayana)为化,什亦宗而奉之。苏摩后为什说《阿耨达经》(Anavatapta sutra),什遂专务方等,因广求义要,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Madhyamaka sastra……satasastra)等。顷之随母进到温宿国(Ouch-Tourfan),即龟兹之北界。时温宿有一道士,神辩英秀,什论胜之,于是声满葱左。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时王女为尼,字阿竭耶末帝,闻法喜踊,乃更设大集,请开方等经(Mahasamnipata, Vaipulya-sutras)奥。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Vimalâksa)学《十颂律》(说一切有部〔Sarvâstivâdin〕之律〔Vinaya〕,按卑摩罗叉,罽宾人,后亦至中国)。有顷,什母辞往天竺。后什于新寺得《放光经》(Pancavimsatika Prajnaparamitra)。吕光破龟兹,见什年齿尚少,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旋随光还凉州。弘始三年(401年),后秦王姚兴迎什入关。其年十二月,至于长安。三十年中,译经论九十八部,凡四百二十一卷(一作四百二十五卷)。

据《开元释教录》,天宝九载(750年),鸠译经论尚存者五十二部,凡三百〇二卷。

纪元520年刊之《出三藏记集》,载有鸠摩罗什时代龟兹佛教信行之事。所载国名为"拘夷"。按以所记之事,及所述之人,皆属龟兹,则当时之龟兹亦名拘夷也。纪元860年刊《酉阳杂俎》,亦志有拘夷国名。国之北山有驼便水,服之发落,此事与《魏书》所载龟兹国故事,又略相合,故知拘夷为龟兹也。此北山疑即《新唐书·龟兹传》之白山。山在王居伊逻卢城之北。由此拘夷国名,吾人又忆及纪元四百年时法显所经之佉彝。考《佛国记》,法显等从鄯善"西北行十五日到佉彝国,又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国"。考其行程,佉彝决为今之库车,昔之龟兹。(《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以佉彝为焉夷,则为今之焉耆矣。但

由焉耆不能“直进西南行”，到今之和阗，古之于阗也。)法显又述乌舞之情况云：“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住二月余日，于是还与宝云等共，为乌舞国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设乌舞确为龟兹，当吕光远征十七年后，亦无怪其不礼遇秦土沙门也。

约二十年后，罽宾国天竺沙门昙摩蜜多(Dharmamitra)东赴中国，路经龟兹，所受之待遇，则又非法显等所能跂及者也。考《高僧传》、《昙摩蜜多传》云：周历诸国，遂适龟兹。未至一日，王梦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当入国，汝应供养。明旦即勅外司，若有异人入境，必驰奏闻。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请入宫，遂从禀戒，尽四事之礼。居数载，蜜有去心，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进到燉煌。元嘉元年(424年)，至于京师。

今之库车，中国史书固名龟兹，但佛经中亦有作丘慈或归兹者。《梵汉字汇》中有一书，名“《梵语杂名》”，于纪元850年为一日本沙门携归日本，今尚存在。此书即为归兹翻经大德礼言所撰，其归兹之对音即为Kucina。可见当时龟兹人已任传流佛经之责也。又考宋《高僧传》卷三，论引彦琮法师之言曰：“如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国者，因而译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语。如此胡、梵俱有者是。”由是观之，龟兹就宗教言，为语言之甄脱。龟兹以西，人读梵文，龟兹以东，人习汉语，多藉龟兹之从中介绍，其间不少专门名词，用龟兹语转贩而东。关于此节，吾人后此别有说明也。

五世纪时，北魏(386至534年)入据中国，崇重佛教，与中亚自亦不乏关系。考《魏书·太武帝本纪》曰：“太延三年(437年)三月，龟兹国遣使朝贡。”又“太延五年(439年)四月，龟兹国遣使朝贡”。

此种臣服，系属外表，非军力不能使成实际也。故《太武帝本纪》又曰："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十二月，诏成周公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魏书·龟兹传》记述此役云："其东关城戍，寇窃非一，太武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距战，度归击走之，斩二百余级，大获驼马而还。"次年十一月，龟兹又遣使朝贡。此外《魏书本纪》载有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年)四月，太和元年(477年)十月，太和二年(478年)七月(献名驼龙马珍宝甚众)，太和三年(479年)九月，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十月，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七月，正元元年(522年)七月，龟兹贡使来朝之事。

《魏书·龟兹传》记述其国之事云："其王姓白，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又出细毡、饶铜、铁、铅、麝皮、氍毹、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犛牛等。东有轮台，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式水，即黄河也。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百里。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孳乳如鸡鹜。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饴餬，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

据《释氏西域记》，亦志有屈茨(龟兹)北二百里有一山，夜有火，日有烟，产煤铁。

6世纪之初，梁朝(502至556年)虽建国于金陵，与龟兹亦不

乏关系。据《梁书》所记,梁武帝天监十年(511 年),龟兹遣使朝贡。普通二年(521 年),龟兹王名尼瑞摩珠郝胜。

北周(557 至 581 年)武帝初立,宝定元年(561 年)四月,龟兹遣使朝贡。天和三年(568 年),有龟兹乐人曰苏祇婆,随突厥皇后阿史那氏至中国。

《隋书》(581 至 617 年)所载龟兹贡使,惟炀帝大业十一年(615 年)一次来朝。《隋书·龟兹传》所志,大致与前史同,惟增"其王姓白字苏尼咥(北史作哑)"一条耳。

隋朝初年达摩笈多(Dharmagupta)行经龟兹之时(584 年),此国已信奉《大乘》,据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曰:"又至龟兹国,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破论如实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间行至乌耆国(Karachar)。"

中国与龟兹,除外交及宗教关系外,更有音乐之关系。读姑郎(Courant)之《中国旧乐史试编》(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可以见其进步矣。中国有龟兹乐,起自吕光灭龟兹(383 年),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婆罗门人曹姓世习其乐,北齐曹妙达,尤为著名。周武帝聘突厥可汗女,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隋时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乐三部。开皇中(581 至 605 年)其器大盛于闾闬。曹妙达等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间。隋高祖病之,然竟不能救焉。炀帝时(605 至 618 年)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曾语明达云:齐氏偏隅,曹妙达犹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贵汝,宜自修谨。白明达所制诸曲名,见《隋书·音乐志》。时有《五狮舞》或《太平乐》者,即由龟兹乐人输入。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

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桑、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晚至宋时(977年),宫中宴饮,尚有用龟兹乐者也。

考郑樵《通志》,龟兹乐曲二十,其名为万岁、藏钩、七夕相逢、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投壶、舞席、同心髻、泛龙舟、斗鸡子,斗百草、善善还旧宫、长乐花、十二时、摩尼解、婆伽儿舞、小天舞、圣明乐、疏勒盐等乐。

《旧唐书·音乐志》,述龟兹乐工之服饰乐器云:"龟兹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布裤、乌皮靴、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箫一、筚篥一、毛员鼓一、都昙鼓一、答腊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拔一、贝一,毛员鼓今亡。"

又据《隋书·音乐志》云:"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柱国沛公郑译云:考寻乐府钟石律品,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560至578年)有龟兹人苏祇婆(Sujiva)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箑,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

细考上述诸声之名,不难知三声之为 sadja,六声之为 panca-

ma,七声之为 vrsa,四声之为 sahagrama,皆梵文乐律专名,足证龟兹之已取法于印度矣。

唐代建国,高祖时(618 至 627 年),龟兹王苏伐勃驶即遣使入朝。会死,子苏伐叠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630 年)献马,太宗赐玺书,抚慰加等(见《新唐书》二二一上)。同年春季,玄奘行经龟兹;今读其所撰之《西域记》,参以近代之发见,愈足以证明此著名法师记述之真确也。按《西域记》卷一云:"屈支国(旧曰龟兹)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稉稻,出葡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物善诸国;服饰锦氎,断发巾帽;货用金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捭头,欲其匾匾也。"

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Sarvâstivâdin)。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竟。

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龙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城中无井,取汲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饶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城今荒芜,人烟断绝。

玄奘所述之神话,流行中国之后,《酉阳杂俎》所集故事神话,关于此事,又有所增益矣。据云:"古龟兹国王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龙。时有贾人买市人金银宝货,夜半钱并化为灰,境

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龙居山北,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出至龙所,见龙卧,将欲斩之。因曰,吾斩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断尔头。龙惧王神力,乃作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为王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后常乘龙而行。"

吾未详《酉阳杂俎》所述龟兹王阿主儿(Atchour)之名何所本,似非出于臆造,或为与突厥语"莫贺""俟利发"相类之官号,亦未可知。自五世纪中叶以后,龟兹常附丽其强邻突厥。隋初虽稍阻制突厥之强梁,然隋炀唐高之世,中国数受其制。当时西突厥可汗,即建庭于龟兹北之三弥山,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

又据《西域记》云:"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河,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釐。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东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八寸。每遇有斋日,照烛光明。"

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

诸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之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

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

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

闻诸先志曰：昔此国先王，崇敬三宝；将欲游方，观礼圣迹，乃命母弟，摄知留事。其弟受命，窃自割势，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谓也？对曰，回驾之日，乃可开发。即付执事，随军掌护。王之还也，果有构祸者曰，王令监国，淫乱中宫。王闻震怒，欲置严刑。弟曰，不敢逃责，愿开金函。王遂发而视之，乃断势也。曰，斯何异物，欲何发明。对曰，王昔游方，命知留事，惧有谗祸，割势自明。今果有征，愿垂照览。王深敬异，情爱弥隆，出入后庭，无所禁碍。王弟于后行遇一夫，榷五百牛，欲事刑腐，见而惟念，引类增怀，我今形亏，岂非宿业，即以财宝，赎此群牛，以慈善力，男形渐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宫。王怪而问之，乃陈其始末，王以为奇特也。遂建伽蓝，式旌美迹，传芳后叶。

按上述之故事，与《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Abhidharma Maha-Vibhasa sastra)所志之一故事相类。此论相传为迦腻色迦王召集五百罗汉之结集，曾经玄奘于纪元656至659年间译成唐言者也。上述之故事，与此不无关系。兹据《法苑珠林》卷五十(日本刊《大藏经》本)转录于下：

《新婆沙论》云：昔揵驮罗国(Gandhara)迦腻色迦王(Kaniṣka)有一黄门，恒监内事。暂出城外，见有群牛，数盈五百，来入城内。问驱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将去其种。于是黄门即自思忖，我宿恶业，受不男身，今应以财，救此牛难。遂偿其价，悉令得脱。善业力故，令此黄门，即复男身，深生庆悦。寻还城内，伫立宫门，附使启王，请入奉现。王令唤入，怪问所

由。于是黄门具奏上事。王闻惊喜，厚赐珍财，转授高官，令知外事。

又据《玄奘法师传》所述龟兹之事云："前渡一大河，入屈支国界。将近王都，王与群臣大德僧木叉鞠多(Moksagupta)等来迎。自外诸僧数千，皆于城东门外张浮幔，安行像，作乐而住。法师至，诸德起来相慰讫，各还就坐。使一僧擎鲜华一盘，来授法师。法师受已，至佛前散华礼拜讫，就木叉鞠多下坐。坐已，复行华。行华已，行蒲桃浆。于初一寺受华受浆已，次受余寺亦尔。如是展转，日晏方讫，僧徒始散。"

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寺在城东南，以法师从家乡来，先请过宿，因就之。王共诸德各还。明日王请过宫，备陈供养，而食有三净，法师不受。王深怪，法师报此渐教所开，而玄奘所学者《大乘》不尔也。受余别食。

食讫过城西北阿奢理儿寺，是木叉鞠多所住寺也。鞠多理识闲敏，彼所宗归，游学印度二十余载，虽涉众经，而声明最善。王及国人，感所尊重，号称独步。见法师至，徒以客礼待之，未以知法为许。谓法师曰，此土《杂心》(Samyukta-hrdaya)《俱舍》(Abhidharma:Kosa)毗婆沙(Vibhasa)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法师报曰，此有《瑜伽论》(Yoga-caryabhumi sastra?)不？鞠多曰，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

法师初深敬之，及闻此言，视之犹土。报曰，《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又《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Maitreya)所说。今谓邪书，岂不懼无底枉坑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谓非

深？法师报曰，师今解不？曰，我尽解。法师即引《俱舍》初文问，发端即谬。因更穷之，色遂变动，云汝更问余处。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论无此言。时王叔智月(Jnanasoma)(按此名于新发见寺中簿记中重见之)出家，亦解经论，时在傍坐，即证言论有此语。乃取本对读之。翘多极惭云：老忘耳，又问余部，亦无好释。

时为凌山(col Betel)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观眺之外，时往就言。相见不复踞坐，或立或避。私谓人曰，此支那僧非易酬对，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有也。其畏叹如是。

至发日，王给手力驼马，与道俗等倾都送出。从此西行二日，逢突厥贼二千余骑，其贼乃预共分张行众资财；悬诤不平，白斗而散。

龟兹当时虽尚小乘，然赴印度之龟兹、沙门，仍往来不绝。而所藏之经文亦富，故十四年后，玄奘渡信度河失经；一到于阗，即使人往屈支、疏勒访本也。龟兹与于阗之交际，亦不始于是时。读西域于阗国夹纻佛像一事，可以知之。据云："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婴缚那(Dirghabhavana)伽蓝，有夹纻(按夹纻为干漆造像，伯希和别有考)，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此。昔此国中有臣被谴，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后蒙还国，倾心遥敬，夜分之后，像忽自至，其人舍宅，建此伽蓝。"

《新唐书·龟兹传》所志当时龟兹国事甚详。今录其文于下：

龟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自焉耆西南，步一百里，度小山，经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横千里，纵六百里，土宜麻麦粳稻葡萄。出黄金。俗善歌乐。旁行

书。贵浮图法。产子以木压首。俗断发齐顶,惟君不翦发。姓白氏。居伊逻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

高祖受禅(618年),王苏伐勃馱遣使入朝。会死,子苏伐叠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630年)献马。太宗赐玺书,抚慰加等。后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644年)。乃遣兵与焉耆影援。自是不朝贡。

苏伐叠死,弟诃黎布失毕立。二十一年(647年)两遣使朝贡。然帝怒其佐焉耆叛,议讨之,乃以阿史那社尔为崑邱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左武卫将军李海岸等,发铁勒(Tölös)十三部兵十万讨之。社尔分五军掠其北,执焉耆王阿那支。龟兹大恐,酋长皆弃城走,社尔次碛石,去王城三百里。先遣伊州刺史韩威以千骑居前,右骑卫将军曹继叔次之。至多褐,与王遇,其将羯猎颠(Kereptanne)兵五万合战,威伪北。王见威兵少,麾而进。威退与继叔合,还战大破之,追奔八十里。

王婴城,社尔将围之。王引突骑西走,城遂拔。孝恪居守。沙州刺史苏海政,行军长史薛万备以精骑穷蹑六百里。王计穷,保拔换城(按即大食人所名之 Barkhouan),社尔围之。阅月,执王及羯猎颠。其相那利夜逸,以西突厥并国人万余来战,孝恪及子死之,王师扰,仓部郎中崔义起募兵战城中,继叔、威助击之,斩首三千级。那利败,衰亡散,复振,还袭王师,继叔乘之,斩八千级。那利走,或执以诣军。

社尔凡破五大城,男女数万,遣使者谕降小城七百余,西

域震惧，西突厥安西两国归军馕焉。社尔立王弟叶护(Jabgou)王其国，勒石纪功。

初孝恪之击焉耆也(644年)，龟兹有浮屠善数，叹曰，唐家终有西域，不数年吾国亦亡。

社尔执诃黎布失毕、那利、羯猎颠献太庙，帝受俘紫微殿。帝责谓群臣皆顿首伏诏赦罪；改馆鸿胪寺，拜布失毕左武卫中郎将，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按安西之徙，在658年)

高宗复封诃黎布失毕为龟兹王，与那利、羯猎颠还国。久之，王来朝，那利烝其妻阿史那，(按此可见龟兹与突厥联姻也)，王不能禁，左右请杀之。由是更猜忌。使者言状，帝并召至京师囚那利，护遣王还。羯猎颠拒不内，遣使降贺鲁，王不敢进，悒悒死。

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禽羯猎颠，穷诛部党(658年)。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更立子素稽为王，授右骁卫大将军为都督。是岁(658年)徙安西都护府于其国。

上元中(674至675年)素稽献银颇罗名马。(按《册府元龟》作674年12月)。天授三年(692年)，王延田跌来朝。始仪凤时(676至678年)，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693年)，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于是沙碛荒绝，民供赍粮，苦甚。议者请弃之，武后不听。〔按《册府元龟》补志景龙三年(709年)正月龟兹来朝一事〕

开元七年(719年)，王白莫苾死，子多市立，改名孝节。十八年(730年)。遣弟孝义来朝。

据《册府元龟》,十九年(731年)正月龟兹遣使朝贡。

唐代史书之记载止于八世纪上半叶,读圆照撰《悟空行状》,又可略知八世纪下半叶龟兹之历史。《行状》略曰:悟空于纪元751年随唐使臣赴健驮罗国,凡往来经四十年。归途经行疏勒。于787年或788年至安西(龟兹)。时郭昕为四镇留后,白环为龟兹王。城西门外有莲华寺,有三藏法师勿提提羼鱼,华言莲花精进,善于传译。空因将《十力经》(Dasabala sutra)来,请翻之。师允之,遂为译出,可用东纸三幅成一卷。师善四镇方语,印度唐言,安西境内有前践山,下有前践寺,又有耶婆瑟鸡山,有水滴滴成音。彼人每岁一时采缀其声,以成曲调。是以建立耶婆瑟鸡寺,寺东西有拓厥寺阿遮哩贰寺。悟空留此城年余。

如前所述,八世纪末年龟兹尚保其旧风,佛教、学术、音乐尚昌盛也。并有继承鸠摩罗什之事业翻译梵文经典者。勿提提羼鱼所译《十力经》,尚存高丽本《大藏经》中。此经梵文原本,近已在敦煌石室发见。其一部分为伯希和所得,一部分为斯坦因所得。勿提提羼鱼,《宋高僧传》有传,传记多同圆照《悟空行状》。末段云:"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山下有伽蓝,其水滴滴成音可爱。彼人每岁一时采缀其声,以成曲调,故耶婆瑟鸡开元中用为羯鼓曲名,乐工最难其扶撩之术,进(莲花精进省称)寺近其滴水也。"

此后二百余年,龟兹之历史又沦入黑暗时代。至纪元1001年,龟兹之名重见于中国史书之时,中亚与东亚情状已变矣。唐室已亡于藩镇,其强敌突厥、吐蕃、回鹘,已次第瓦解。宋朝定都于开封,中国北方弃于契丹,回教信徒已侵取西域于佛教僧徒之手。据《宋史·真宗本纪》云:"咸平四年(1001年)11月龟兹来朝贡。"又别有一贡使"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来朝"。此贡使之来朝,附见

于《回鹘列传》。传云:“龟兹王可汗遣使李廷福翟进贡方物。”传又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龟兹遣使李延庆等三十六人贡方物”。“天禧元年(1017 年)六月,遣使张复延贡方物。”天禧四年(1020 年)十二月、天圣二年(1024 年)、天圣七年(1029 年)、天圣九年(1031 年)、景祐四年(1037 年)入贡者五次。最后赐以佛经一藏。神宗熙宁四年,其贡使仍为李延庆,又有使名曹福(前有曹妙达,似曹姓为龟兹之著姓)。次年(1072 年)二月,其使为都督卢大明。哲宗绍圣三年(1096 年)为末次贡使朝宋之年。据史载“绍圣三年,使大首领阿连撒罗等二人,以表章及玉佛至洮西,熙河经略使以其罕通,请令于熙、秦等州博买,而估所赍物价答赐遣还。从之”。

又据《宋史》所志龟兹国事云:“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有米麦瓜果。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九十日,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或称龟兹回鹘。”

龟兹城过去亚利安之历史,至是遂完全告终。印度欧罗巴语之国民,至是已为回鹘所吸收。古白氏王朝已亡。其新国主有可汗(Kagan)及师子王(Arslan)之号,显已完全遵从突厥风习。然佛教固未全灭,如纪元 1037 年赐藏经,1096 年之贡玉佛,二事可以证之。但距消灭之期亦不远矣。观其国距大食之近,可知其信心之改。昔之佛教西域,至是一变而为回教之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盖自 1043 年以来,八拉沙衮(Balassagoun)及喀什噶尔(Kachgar)之突厥,信回教者约有万帐。此后古龟兹之名,遂不复重见于史书。

纪元初一千年间,龟兹之国运,略如前述。近年中学家又增加不少史料。究竟印度欧罗巴语系种族何自来,吾人不知。至其语

言之关联，据迈埃（Meillet）之研究，特近类义大利色特（Italo-Celtes）、斯拉夫（Slaves）、希腊（Héllènes）诸语，实难归纳于一类语言。尤奇者，此种亚洲亚利安语，与印度伊兰语（Indo-Iranien）又不相类。此龟兹人为吐火罗人（Tokhariens），诚如缪莱之考定，谢额、谢额凌二氏之是认者欤。前引之龟兹史传，无有能参证此说者也。假定月支即吐火罗人，其为龟兹之与国，仅偶见于纪元前 90 年一次。龟兹虽仿白沙威之雀寺，亦建雀离寺，玄奘《西域记》述阿奢理儿寺之原来，虽有类迦腻色迦王时结集《毗婆沙经》中之故事，此种宗教的假借，不遽能认为种族之关联也。当纪元前 2 世纪，龟兹见入历史之时，已为一文明灿烂之国。最古国王，其名可知者，为妻乌孙公主女之绛宾（约在纪元前 65 年）。乌孙者，据《前汉书》云，碧眼赤须之胡也。自绛宾效法汉仪之后，外国胡人以非驴非马讥之。绛宾死，丞德立，与汉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纪元 46 年时，莎车王取龟兹，以其子则罗为龟兹王。匈奴逐则罗，而以龟兹贵人身毒代之。此人名与印度当时古国名同也。73 年时，其王建附于匈奴。继传至八世纪，或八世纪以后之白姓王朝，即建立于是时也。班超至西域，废龟兹伪王尤利多，立龟兹侍子白霸为龟兹王。嗣后龟兹王即以白为氏。124 年其王名白英。3 世纪末年龟兹为佛教大城之一，有佛寺千所。384 年时，其王白纯即为笃信佛教之一人。吕光破龟兹，立白纯之弟白震，并携鸠摩罗什以俱东。但龟兹仍保其独立之精神也。448 年时，北魏又伐龟兹，击走龟兹将乌羯目提。百年之后，龟兹以其饱受印度化之音乐，传布于中国。521 年之尼瑞摩珠郎胜，581 至 615 年间之白苏尼咥，618 至 627 年间之白苏勃驮诸王，处中国突厥两大之间。虽亦臣属中国，然仅尽朝贡之职而已。白苏伐叠且受有突厥之时健莫贺俟利发官

号，与焉耆连结，不朝中国。其继王诃黎布失毕，于648年为服役中国之突厥军将阿史那社尔所执。复位之后，悒悒以死。子素稽继为王(658年)。素稽之后数王，惟知其名延田跌、白莫苾、白多匝、白环而已。龟兹一地，不特为中国所争，7世纪末之吐蕃，8、9世间之回鹘，亦觊觎之。但龟兹终能保其遗风，庙寺兴盛，颂读传译梵文经典。4世纪输入之《大乘》，虽亦有时信奉，迄未重视。但亦不乏龟兹语之译文也。龟兹于佛教感奋之下，文学发达。其输入之印度经文，并不拘泥原文，到处具见其独立精神。尝考此种文学运动之始期，不无线索可供寻究。夫中国佛经之初译，在纪元2世纪时。其间有佛教所用之语，非印度之原字所能对照；惟用龟兹语始能解其译音。如沙门梵文为 sramana，龟兹语为 samane。中国之译音与前者译远，与后者近也。又如沙弥，梵文作 sramenera，龟兹语作 sanmir；波逸提，梵文作 payantika，龟兹语作 payti 之类，皆可证明2世纪之汉译，本于龟兹语，非直译梵文也。此单就音之一方面言也。再就义之方面言；如梵文之 pravrajya……此言前进，而汉译为出家，龟兹语为 ost memlalne，义亦犹出家也。梵文之 mithydrsti，此言谬见，汉译为外道；龟兹语为 parnanne，犹言外也。梵文之 sama，santi，此言和也，汉译为灭；龟兹语为 kes，义犹息也。

由是推之，龟兹语为佛教传布中国之媒介，龟兹文学应始于纪元1世纪时也。龟兹久已与好战之突厥相接，故于突厥语亦有假借。如龟兹语之 kaun，此言日也；似即突厥语之 kün(甲种吐火罗语或焉耆语作 kon)。至突厥语亦有假借龟兹语者，如突厥语之 tuman，此言万也；显为龟兹语 tumane，tmane 之转(焉耆语作 tman)。足证龟兹文化，影响不知大数目之民族之事。

虽然，文化不高之突厥，终战胜文明之龟兹。纪元1000年时，

土著王朝已亡，其国主自称可汗，加之中亚变乱不绝，古龟兹之最后遗迹，遂以沦灭；但过去之历史，从未完全绝迹也。今之库车居民，尚以俗尚音乐语言著名，犹存有古龟兹之遗风。兹引一书以证之。哈特曼（Martin Hartmann）之《中国土耳其斯坦》（Chinesisch Turkestan）一书中有云："莎车土人言，库车之语言清纯；语言用诗，其语言多为吾人所不能。"哈特曼疑"其语言或为回鹘语言之所遗，盖其地虽亚于哈喇和卓（Qarakhodja）附近之高昌故都（Idikut），然亦为一大都会也"。今日吾人可更进一步曰，今库车语或存有古龟兹语之遗迹，此今人所当寻究者也。

吐 火 罗 语

见亚细亚报 1933 年刊上册一至三〇页

列维(Sylvain Lévi)撰

谢额(Sieg)、谢额凌(Siegling)二君,因通一种语言之解而得名,此语言即二十世纪初年由中亚发掘而突然重现于世的几种语言之一种。1908 年有论文一篇刊载于柏林研究院《记录》,声明其发现,题曰《吐火罗语,月氏人之语言》。用此语言书写之文籍,曾提供诸考订家之寻究,可是迄于是时,尚无诠释。谢额、谢额凌二君对于 Grünwedel 同 von Lecoq 等考察团携归柏林之大量搜集品,负担有整理编目之责,曾见其中有两种语言对照的文字,同梵语注释的文字,于是始能着手于此种文字之研究。他们立时认识有两种具有关系的方言之存在,曾慎重地用 AB 二字母而定其名(今译作甲种方言同乙种方言);著录其语词与形态之印度欧罗巴系的性质;他们的第一次报告,证明已将此久经湮没的文字从事移译。十三年后同一著者将柏林聚集的甲种方言文籍完全刊布,题曰:《吐火罗语残片》。第一册,原文,甲编,译写,柏林同来比锡(Leipzig)两地 1921 年出版(普鲁士遣派吐鲁番考察团),四开本,二五八页。第二册影印原文(乙编,图;凡六十四版)。谢额、谢额凌二君拟待将来翻译其文;是编仅粗述其性质,其内容,偶而标明与梵语同巴利(pâli)语有关系之段落而已。他们对于此类文籍,旋即编纂一种文法;因此取得一著名文法家 Wilhelm Schulze 君之合作。1924 年

对于柏林研究院之一报告，经《记录》刊布，而其内容关系重言过去时之构成者，表示此种簇新活动之开始。由三学者之合作，现有五一八页的巨帙之刊布，是编包括吐火罗语文法之全部[1]。其书盖据此种研究之有规则的计划循序渐进：(一)词语之构成(一至三二页)；(二)语尾变化(三二至二二八页)；(三)名词之结构(二二八至二五一页)；(四)无变化词(二五一至三二三页)；(五)动词(三二三至四八四页)。若将其子目转录于下，似不为无益；盖其足使从未与吐火罗语发生关系者获有一种概念。语尾变化篇分：(一)概说。(二)名词变化：(甲)单数之正格，单数主格，单数客格[2]，单数属格；(乙)复数之正格，复数主格；名词：(子)无特别客格之复数；(丑)有特别客格之复数；形容词，复数客格，复数属格；(丙)双数之正格；(丁)诸数之副格；用°ā 之格，与格，客格，位格；(戊)名词范例；(子)名词；(丑)形容词。(三)代名词：(甲)人称代名词；(乙)指示代名词；(丙)指示副词与指示连接词；(丁)疑问代名词与关系代名词；(戊)副词与连接词，疑问的与关系的；(己)不定词；(庚)疑问助词 te；(辛)询问代名词与关系代名词之扩张；(壬)代名形容词。动词篇分：(一)范例之式样与分析。(二)构成法：(甲)人称变化；(乙)不定动词变化；(丙)构成时间语根之字尾；(丁)构成方式语根之字尾；(戊)字头 p；(己)重言；(庚)声母之衰微；(辛)ablaut。(三)现在时之构成。(四)过去时之构成。(五)动词范例之结构：(甲)无因范例；有缺陷的动词；(乙)有因范例；其与基本动词之关系；范例之结构；(丙)有因式之范例；(丁)根尾之 s；(戊)从附隶式根引出的现在时之构成；(己)不规则动词。是篇以后，则有动词字根表，附带有可能考订之意义，并有一按时间分配之动词一览表。

撰者在其说明中，未将比较文法加入；而且对于乙种方言之可

宝贵的例证亦鲜利用。所编之文法,要为将甲种方言文籍中所见诸字编定一种表录;材料之繁多,致使有碍于说明,虽熟练的读者,处此博识的迷途之中,亦常失其线索。若将其规则与范例节录于卷首,应为读者所欢迎。是编开卷第一节即云:"吐火罗语动词之语根,大致为单缀音式。"谢额、谢额凌二君寝馈于其文字之中,约有25年,好像认定全世界人对于此吐火罗语皆甚熟习。又谨于言,对于他们前此的研究竟未提及,而对于在印度欧罗巴比较范围中曾经研究并有时解决由此两种方言所提出的诸问题之其他学者,亦无一语及之。

谢额、谢额凌二君不作何种讨论,仍将他们从前所定甲种方言之"吐火罗语"名称维持。可是前在发明时感奋之中所加的补充名称"月氏人之语言"取消了。Pischel 在提交柏林研究院之一报告中,曾经说过:"谢额、谢额凌名吐火罗语为月氏人之语言,似不如谓为月氏人之一种语言较为慎重?"问题虽用此种缩小方式提出,然24年以来,仍未接受何种答复,无一证实此始终迷离不明的月氏人与甲乙两种方言之关系者。证实或仅辅助吐火罗语名称之说亦并无之,而此名称之惟一根据,仅在具有天才的缪莱(F. W. K. Müller)所译释的一种回纥语题识之上;据说回纥文之《弥勒下生经》(Maitrisimit)先从印度语译(译字有疑义)为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我们既在甲种方言中见有同一经文,似可证明甲种方言即是吐火罗语,但是不能证明中亚其他语言中皆无此经。我们整理的文籍太少,不能遽将此种假定屏除。我们所整理的文籍中,迄今尚未见有吐火罗人的名称;中国载籍关涉中亚者,亦无将吐火罗名称与甲种方言文籍发掘之区认为一地者。吾人之 Tokhares,梵语作 Tukhāra,希腊语作 Tokharoi,华语作吐火罗,皆表示

有一种很重的送气声(aspirées),而甲乙两种方言绝对无此送气声。吐火罗地方,无论为阿剌壁人之吐火罗斯单,抑为玄奘之睹货逻,要在乌浒(Oxus)水上流,南抵印度库什山,北接乌浒水之阿富汗地带。在玄奘时代,我们所得文籍亦多属此时代,睹货逻故国尚役属突厥;境内诸国皆由突厥治之。如此看来,有一突厥书籍系从吐火罗语原本译出,毫无足异,且应申言者,吐火罗人之语言,吾人现在完全不明。甲种方言文字所识适用于他们本国的种族名称,只有Arçi一字。曾经谢额君在1918年检出(柏林科学研究院《记录》五六〇页),立时与希腊拉丁载籍中之Asioi,Asiani,名称比附,尤特别与Trogue-Pompée书目录中之Reges Tocharorum Asiani同比附,盖此目录将吐火罗人与Asiani并列,不幸较吾人之文籍至少早六世纪,而在此六百年中,中亚应历经政治变化也。缪莱并不因此而不采用谢额君之说(同一《记录》1918年刊五七九页)。谢额、谢额凌二君曾将著录此名之句段裒辑,皆属残片;有"Arçi语"(ārśi kantu)见229 b7,并见236 b1(ārśi un kantwā),第在后一写法中用nu(等若梵语之api)助词将二字分开,未免甚奇。此三学者在第三八四节释其义为"Ārśi语";又在第三九六节言及nu助词时又解作"在Ārśi语中"。Ārçi地方(ārśi ype)见一残片著录,惟此片无关重要,故未刊布。Ārçi名称并在两种尺度中见之:一作ārśi-niskr-amā(ntaṁ);一作ārśi-lāñcinaṁ。此字复数属格作ārśiśśi见下列诸残片中,251 b7,252 b7,294 a6,383 a1,惟其前后文毫无足资考证者。

谢额君既然无疑地承认Ārçi为古代之Asioi,有一印度学者Jayachandra Vidyalankara君又在此同一名称中认定为印度之一古种族名,即Ṛṣika是已(Journ. Bihar and Orissa Res. Soc., XVIII, 1, 97 & 99, Bhārata bhūmi aur uske nivāsi);他以此Ṛṣika即是月氏,亦即谢

额、谢额凌二君最初赋与甲种方言的种族名称也;既然投身于发现之途中,又以为在 Arthaçāstra 中见有大小月氏名号;Kauṭilya, II. 11,著录有价值之物品,中有 bisī 同 mahābisī,据云:"bisī 与 mahābisī,十二村所出。若其形无定,若有毛或杂色,是为 bisī;若粗硬而其色近白,是为 mahābisī;彼此皆长十二指。"观前后文,应指毛皮而言,故注释者释为两种皮革。Jayachandra Vidyalankara 君即在此无意味之文中发现大小月氏。

Sten Konow 君(Corpus, Kharoshthī Inscriptions, Calcutta, 1929, introd. p. LVII(《大夏与吐火罗人》), p. LVIIIILIX(《月氏与吐火罗人》)又从别途而抵于此同一月氏:"甲种方言显为大夏西部吐火罗地方之方言……似应推测此 Ārśi 或 Asioi 或 Asiani 应为月氏,吐火罗人应为大夏。"其理由则在:"吾人结论以为统治吐火罗人之 Asiani 既已考订与其臣民同种,则恰合月氏、大夏之情形矣。"由是"得谓甲种方言为吐火罗人之文言"。建筑可谓伟大,可是基础仅在云雾之间。

首应忆及已有两点业已确定。乙种方言乃是中国新疆境内库车小国之文学用语,官署用语,宗教用语。我幸已将其证明(《乙种吐火罗语即库车语》,见《亚细亚报》1913 年刊二册三一一页以后),而其事颇显著,所以其后未见有人反驳。谢额、谢额凌二君(《残片》四页)仅谓我所拟之名"太狭",盖"有人在库车至吐鲁番一带重见其残片写本壁画也"。此事我已知之,毫无足异。库车在佛教文化东被中国中执有一种重要任务,我以为业已完全说明。又一方面,甲种方言残文出自哈喇沙尔(第一至第三八三号出自 Shörtchouq,地在哈喇沙尔西南南十六哩)吐鲁番(第三八四至第三九三号出自 Bäzäklik, Murtuq;第三九四至第四二八号出自 Sängim;

第四二九至第四六七号出自 Idyqut - shahri)两地。我曾建议名此方言曰“哈喇沙尔语”;有人责我不应将吐鲁番名称除外。则在此处裒辑中国载籍涉及哈喇沙尔、吐鲁番二国之文,不为无益,至少可知此二小国在纪元初 10 世纪中所执之任务也。其事并不特别繁重。关系吐鲁番者,Walter Fuchs 君曾辑其文(《吐鲁番区域》,见《东亚期刊》1926 年刊一二四至一六六页);关系哈喇沙尔者,沙畹(Chavannes)在各种研究中曾将诸史列传迻译,我仅据《边裔典》(卷五一)略为补充而已。最后斯坦因(Aurel Stein)君曾辑有历史概略,关于吐鲁番者,载入亚洲腹地(1928 年刊二册五六九至五八六页);关于哈喇沙尔者,载入《西域》(1921 年刊三册一一八〇页以后)。

哈喇沙尔——中国名曰焉耆,前汉时通中国,武帝(前 140 至前 87)时拓殖四裔,焉耆遣使入贡。时其国都在员渠。王莽篡位,谋自立。后汉(25 至 220 年)时与龟兹(库车)相接;纪元 75 年左右,焉耆王舜与其子忠攻杀都护,以下吏卒二千余人尽死。班超奉命讨叛,计杀焉耆王广,与其将曾为匈奴侍子之北鞬支;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立先为质于中国之焉耆左侯元孟为王(94 年)。纪元 121 至 125 年间元孟亦叛,超子勇讨之(127 年),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时焉耆国王居南河城;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后汉末 220 年时,遣使入贡中国。晋武帝时,285 年焉耆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狯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胁生子曰会。立之为世子,后即位,袭灭龟兹(库车),遂据其国,遣子熙归本国为王。熙拒中国使臣(345 年),中国军两败之。吕光讨西域,焉耆王泥流(有若干载籍误名之曰熙)请降;及光僭位,遣子入侍[4]。

《晋书·焉耆传》志焉耆风俗有云："其俗丈夫剪发；妇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华夏。好货利，任奸诡。王有侍卫数十人，皆倨慢无尊卑之礼。"

北魏时仍通中国。纪元437年与439年曾遣使入贡；惟至448年北魏遣兵讨之；焉耆王鸠尸卑那奔龟兹（库车）。《魏书·焉耆传》志其异闻云："其王姓龙，名鸠尸卑那；即前凉张轨所讨龙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国内凡有九城。国小人贫。无纲纪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华夏。死亡者皆焚而后葬。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蒲萄酒，兼爱音乐。"

北周代魏，纪元564年，焉耆王遣使献名马。《周书·焉耆传》仅转录魏书文。隋朝统一中国，606年焉耆国王龙突骑遣使贡方物。

纪元629年玄奘经行焉耆，仅停一宿。"阿耆尼（玄奘名焉耆曰阿耆尼）王与诸臣来迎，延入供养。其国先被高昌（即吐鲁番之回纥，曾优礼玄奘，并赠给资物护从）寇扰，有恨不肯给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唐西域记》（卷一）阿耆尼国条记有云："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毡毼；断发无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Sarvâstivâdin）。经教律义，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

《唐书·焉耆传》文甚长（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一〇至一一四页有译文）。7世纪时，焉耆仅有"户四千，胜兵二千"（较之后汉时已

甚少矣)。“俗祝发毡衣。”常役属西突厥。俗尚娱遨。二月腊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岁尽止[5]。其后历言焉耆与唐代初叶诸帝之关系。“632年其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自隋乱,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吐鲁番)。突骑支请开大碛道以便行人,帝许之。高昌怒,大掠其边……640年高昌破,归向所俘及城;遣使者入谢。”已而焉耆与西突厥结合:“不朝贡,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会王弟颉鼻栗婆准叶护等三人来降。帝即命孝恪为西川道总管,率兵出银山道;以栗婆准等为乡导……执突骑支,更以栗婆准摄国事。”突厥以兵救焉耆,而唐兵已退;囚栗婆准,已而复立。其从兄薛婆阿那支自为王,号瞎干,执栗婆准,献龟兹杀之。阿史那社尔禽阿那支,斩以徇,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648年)。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婆伽利死,国人请还前王突骑支,高宗许之,拜左卫大将军。归国死,龙嬾突立……719年,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Tokmak),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6]……讫天宝(742至755年)常朝贺。”自是以后,吐番、回纥互争中亚;遂与中国绝。

吐鲁番——吐鲁番虽与哈喇沙尔邻接,然其社会特殊。吐鲁番低地虽有天山亘延其北,然在历史中与山北一带构成一种组织本位。斯坦因君曾将连结南北两部之人文地理的原因详为说明(《亚洲腹地》第二册五六九页)。当后汉时,中国已视其为一地,特分为两部而已;山南之吐鲁番为车师前部(或车师前王庭),山北之金满为车师后部(或车师后王庭)。纪元327年以来始正式名称吐鲁番曰高昌。《后汉书》谓其为“西域之门户”,具见其政治重要。此地亦在前汉武帝时纪元前108年始通中国;纪元前60年,前部始内属,然北道之后部仍役属始终与中国为敌之匈奴也。汉衰,其

地与中国隔绝;然前部在纪元后四五年曾遣子入侍。其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纪元89年汉兵破匈奴后,又附中国,“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90年)。已而两部相争;96年后部王击前部王尉卑大,汉遣兵救之。其后后部又畔,125年班勇击斩其王。中国与匈奴争后部迄于后汉末年。西晋时,东师前王于280年遣子入侍。前凉时(324至346年)并高昌;387年,车师前王弥第(一作弥寘,或作弥寘)朝秦于邺,请置都护,入朝时曾携国师鸠摩罗佛提(Kumārabuddhi)同行。先是注七吕光破龟兹(库车)得鸠摩罗什(Kumārajīva),送之入朝。已而光僭位于凉州(386)。有沮渠蒙逊(363至433年)者,系出匈奴,据凉土,并高昌。其人崇信佛法,招聚名僧,翻译经典,中有昙无忏(Dharmakṣema)者,颇蒙敬事,然在433年为蒙逊所害。蒙逊有从弟名京声,崇奉弥勒(Maitreya),亦以译经著名于当时(参看南条《目录》,附录二,第六八同第八三号)。哈喇和卓(Idikutsanri)有碑证明沮渠氏信奉弥勒(参看O.Franke《吐鲁番附近之汉文庙碑》,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专著》1907年刊一至九二页)。蒙逊死,其子无讳破车师,据高昌;车师王车夷洛奔焉耆东界。无讳死,弟安周代立。460年,为柔然所并,柔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477年高车王阿伏至罗杀伯周;子义成立,为其兄首归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481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而以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497年国人杀儒,逐其子义舒,与长史巩顾礼,立麴嘉为王。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嘉死,子坚立,遣使朝贡于魏(531年)。其后继主高昌者曰玄嘉(548年);曰茂(555年)。559年、561年,高昌遣使入贡于北周。590年,突厥破其四城。后有高昌王麴

伯雅(602至619年?);大母本突厥可汗女,故从突厥俗;后从隋炀帝击高丽,因慕华风,归国下令命国人从之。子文泰继立;630年玄奘至高昌颇受礼待;文泰欲留之,玄奘绝食却之;文泰乃许其行,惟求在行前讲《仁王般若经》(凡八卷,先有鸠摩罗什译本,后有不空译本,参看南条《目录》第十七与第九六五号)一月,并请于还日留住此国三年。行时,文泰作书二十四封通玄奘所经诸国。时文泰交际甚广,叶护可汗长子咀度设,而君临活国(Koundouz)者,即文泰之妹婿。当时高昌佛教并从华风,有彖法师曾学长安。玄奘去未久,文泰背中国,与西突厥破焉耆三城。(630年)文泰死,子智盛立,唐兵已入国境;智盛降,以高昌为州县,设西昌州。群臣谏止,太宗不纳。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按《旧唐书》,贞观十四年(640年),置西州。永徽二年(651年)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最后在纪元658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自是以后,高昌不复成为独立国,突厥、吐番交争其地。870年左右,回纥得其地,定都于哈喇和卓。

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历史,若与库车史比较,颇黯淡无色;从诸洞窟发掘所得之文学作品残片,与所见之壁画证之,固有一不可否认之智识的与艺术的生活,然为一种纯粹地方生活,未能发扬于外;其显著而有意味者,甲种方言诸写本曾用乙种方言注释,而我在所研究之乙种语言不少残片中,从未见有相反之例。谢额、谢额凌二君把持柏林所藏文籍之力,与所望认识伦敦所藏残片之殷,强度盖等,殊未知故 R. Hörnle 君曾将刊布伦敦文件之责明白托我。第据二君之说(《吐火罗语残片》四页):"乙种方言残片写本壁画并在库车、吐鲁番一带见之。"反之,我敢断言库车出土诸文件,我从未见有用甲种方言写定者,而我曾将斯坦因、伯希和、Hörnle、大谷、

橘瑞超(Tachibana)诸氏之搜辑品,全部检查也。兹数国处两大强国间,北有匈奴或突厥,东有中夏,所受此种叠为主人之压迫过重,显然未能将一整个文化完全发展。然可异者,处此政治情况之下,尚能在中亚文化中独据一席而无逊色。

二国对于佛教传播,力量亦微。中国释藏诸译师名录中,哈喇沙尔仅有代表一人:是即车师前王弥第国师鸠摩罗佛提(《南条目录》附录二,第五三号)曾随其王入朝于秦(382年)[8];其人曾对中国沙门竺佛念(《南条目录》同第五八号)佛护口授世亲所制之《四阿含暮抄解》(《南条目录》第一三八一号;东京本二十四函四册;大正本1505年)。车师王弥第曾得此本于外国沙门 Indriyasena。此外鸠摩罗佛提曾携有《般若波罗蜜经》一部赠给名僧道安(参看伯希和研究,见《通报》1911年刊六七五页)。吐鲁番供给中国之译人二人:一人名释法众,《释藏》无传(《南条目录》附录二第六五号),曾在纪元401至412年间应沮渠蒙逊之请,译有《大方等陀罗尼经》(《南条目录》第四二一号;东京本二十七函五册;大正本1339年);别一人名释法盛(《南条目录》同第七十号),曾游西国,撰有行传,于430至440年间在凉州译有《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南条目录》第四三六号;东京本第四函十册;大正本一七二)。沮渠京声曾在高昌得有《观世音观经》与《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在455年左右翻译;此外沙门昙无忏在414至419年间应沮渠蒙逊之请,所出之《大般泥洹经》,其原本盖由沙门智猛从印度携回高昌,复经蒙逊遣使迎至凉州者(参看 Bagchi《中国释藏考》第一册二一三页注一,又二二二页)。

除上引纯粹中国载籍之记录外,吾人赖吕岱司(Lüders)君之研寻(《新疆史地贡献》,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30年刊语言

历史门第一册二八页以后),可以加入一种本地文件,其文不无关系;是为昔在硕尔楚克(Shörtchouq)地方发现之一纸片,长七公分,宽四一公分半,字体应属晚代;每页五行;纸上记页数为第四十页,盖为一种用语汇集之残文;此纸著录延众供食之文;首数行为不规则之梵文,其后则写以甲种方言。乃 Agni 国王 Indrārjuna 偕同王后 Sūryaprabhā 延请之词。所请者为弥勒暨诸天神,若梵天(Brahma)、帝释(Çakra)、诸乾闼婆(Gandharva)军主、鸠槃茶〔Ku(m)bhāṇḍa〕、龙(Nāga)、夜叉(Yakṣa)等,次言愿 Agni 诸王自去世已久之 Candrārjuna 以下皆得善生。吾人今已确知玄奘之阿耆尼国名为梵语 Agni 之对音,殆为焉耆之别译。吾人又据其他资料,知此国奉祀弥勒,并其他次要人物以为护法(参看我前译《月藏经》名录,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1906 年刊抽印本十至十六页)。复次吾人见 Arjuna 一字似为哈喇沙尔诸王名称中之一种例有的成分。吕岱司君以此字可以训为"白",得与中国载籍中常见的龟兹(库车)诸王白姓相对照,可是库车出土之梵语文件尚无证明;至若焉耆(哈喇沙尔)诸王姓龙,可对梵语之 Nāga。吕岱司君之根据,盖为我在 1913 年《亚细亚报》中刊布之论文:《乙种吐火罗语即库车语》。可是其后我曾考出《酉阳杂俎》所记故事中之主角原名是 Arjuna,其人汉名阿主兒;我曾还原作 Atchour 而疑是一种突厥官号。可是"兒"字以及其他同音之字在古译写中只能对 ni,则阿主兒之原名可假拟为 acuni。乙种方言无浊音,此 Arjuna 名称读写应如此也。列宁格拉德搜藏品中有乙种方言信札一件,首云:"在位之二年,国王Kṣemārcune在虎年中……"札中第十二行有云:"前年国王Kṣemārcune……"此国王Kṣemārcune尚未见他处著录;字体为草书,颇散漫,似出晚代。"虎年"名称,足证库车适用十二生肖制;此

制流行突厥，世人已知之矣；其在中国似甚远古（参看 Léopold de Saussure 撰文，见《通报》1910 年刊六二五页以后）；印度不知有此制也。由是观之，库车在历法范围中，与其东邻北邻相系结[9]。至若 Arjuna 名称，吾人在回纥文中见有 Arcuni 写法，盖在缪莱所译 Hiḍimbavadha 编之一残片中，此名凡两见（Uigurica 第二卷，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论著》1910 年刊，二四页以后）。世人可以假拟此插叙于《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书中之故事，得因其有 Arjuna 名称，而由一开国主有 Arjuna 名称的国家之介绍，流传于突厥区域。此事既明，吾人得以自问，汉文所译王名或王族名照例用三字者，是否在“周”“顺”等字下隐伏有 Arjuna 名称省写之对音。此名常见汉文译写，盖在佛本行（如《普曜经》之类）中或龙树（Nāgārjuna）之名称中见之也；经我检出者，有阿周那、遏受那、阿树那、阿顺那、阿阇那等写法；此类译名盖为学者翻译时代译写之名称。由是可以假拟吕光所讨之龟兹（库车）王白纯名称，容为 Arjuna 之音义两译的名称。又如最初见于史书之焉耆王舜（纪元后 75 年）与后来摄国事之栗婆准，其原名中应亦含有 Arjuna，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七七页注一引）写后一名作先那准，则可假拟为 Senārjuna 之对音矣[10]。

如前所述，涉及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诸文，皆未言有吐火罗。我不欲在此处重提吐火罗问题。惟就现持之说言，仅将鸠摩罗什之一注释提出，引起世人注意而已，此注似未经有人引证。他在所译《大智度论》卷二五（东京本第二十函二册二三页下二行）中列举有安陀罗（Andhra）、舍婆罗（Śavara）、兜呿罗（Tukhāra）、修利（Sogdiane）、安息（波斯）、大秦（中国）等国名。舍婆罗下注云“裸国”，兜呿罗（即吐火罗）下注云“小月氏”。鸠摩罗什是龟兹人，必

知中亚情形,脱知其国或其邻国名吐火罗,必定不用此种译写注释。既以小月氏名之;小月氏即在纪元前176年,月氏败于匈奴西迁后所余之小部,史书不乏记录也。佛兰克(O. Franke)君曾将关于小月氏之文裒辑成编(《中亚月氏与突厥之特征》,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论著》1904年刊)。《史记》卷一二三云:"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此羌业经佛兰克君说明,为西藏种,游牧于甘肃至西藏之间;据《后汉书》之记录,当时虽颇与羌同化,然尚能保存一种自治能力。《三国志·魏志》引《西戎传》:"燉煌西域至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前汉书》卷九六上:"婼羌去阳关千八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葱岭指帕米尔及诸附属山系。玄奘归途历瞿萨旦那(和阗)至尼壤(尼雅),谓其为"东境之关防……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西域记》卷十二)。小月氏同吐火罗在此处相合,与大月氏同吐火罗在乌浒水上流相合,情形正同。则可寻究斯坦因君在尼雅与楼兰间所得诸文件中或有此种羌化的月氏语言之遗迹,并可寻究史籍与传说所录大月氏葱岭以东诸役是否与联合东西两部月氏有其关系。此种问题固未成熟;就吾辈现在之知识言,尚难提出,应留待将来解决也。

由是观之,迄于现在毫无可用吐火罗名称以名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等地印度欧罗巴系语言之理由。若是仅在用一假定解说回纥文《弥勒下生经》题识中之"吐火罗语"名称,则谓印度原本曾经圣月(Āryacandra)翻译为吐火罗语,而在此种形式下流传于葱岭以东,不为武断。吾人已知与玄奘同时之高昌王麴文泰有妹婿为吐火罗境内之活国国王;当时固在突厥帝国势盛时代,可是人种与地理交相证明中国之突厥斯单(新疆),与俄罗斯属之突厥斯单

同阿富汗属之突厥斯单,在任何时代未尝分离;突兰(Touran)与伊兰(Iran)相连之关系,不仅在英雄故事而已[11]。

"吐火罗语"名称过于虚浮则应消灭,至少应暂时消灭。"库车语"名称适宜于乙种方言,毫无疑义。然则如何名此甲种方言欤?吾人所见文籍,既有 Ārçi 名称,最谨慎的办法则在保存此种名称。世人如有兴趣,不妨仍旧在此名称中寻求七八百年前曾在中亚犹如幽灵一现的 Asioi 同 Asiani,要知中亚游移不定为例之常,曾历见匈奴、月氏、哌哒、突厥、回纥、蒙古、满洲等种族驰逐于其中也。但是 Ārçi 名称似若土语中之一外国字。"Ārçi 语"(ārsi nu kantwā)语句之奇,盖与 Ārśi enim lingua, Turan enim lingua 语句正同;是为字根形式仅在文章中表现的语言中之一种无变化的字根;顾 ārçi 既有复数属格作 ārśiśśi,则为可能变化之词。其用甲种方言编撰《弥勒下生经》之人,既在一种笔无浮辞的撰作中加入一种不合文法训义如 ārśi nu kantwā 之类,即因其视此字非本国语言所有之字。足令我不能不思及此不变化词若 Ārçi 者,盖为"安西"二字之本地读音,安西者,纪元 640 年中国给与其地之名称也。安西犹言安抚西域,与吾人熟闻之安南犹言安抚南越,其例正同。惟不可将安西与安息混而为一,安息盖为适用于波斯 Arsak 王朝之古称,唐代在 656 至 660 年间设置西域府州时,曾旧名新用,而以移称不花喇(Boukhara),同时且在活国(Koundouz)置月氏都督府(《新唐书》名此国曰阿缓城)。此安西都护府初置于吐鲁番之西,651 年徙高昌,658 年徙龟兹(库车),除中间一陷吐番外,延存迄于 787 年,终为吐番所得。甲乙两种方言文籍发现之处,皆在安西府境。观安息(Arsak)之例,足见汉语之 n 与外国语之 r 在韵母后互换之易;中国古读之 ni 在近代官话中一律转为 eul,可见汉语鼻音中有一近

于流音 r 或 l 之成分[12]。故意在甲乙两种方言之不少摩擦音(至少有六种)中选择颚擦音,正合西字官话之 si,汉和语之 sei,古音读(据高本汉说)之 sie 发音颚音化也。由是观之,如欲将甲乙两种方言求一共同名称,可以名之曰"安西语"(或 Ārçi 语),而别名库车语曰"西安西语",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语曰"东安西语"。华人曾经供给一例。沙门悟空行历印度经四十年,787 或 788 年归抵安西(库车),曾将所携一种梵经请其地法师名勿提提羼鱼[13]者翻译。"师善四镇方语,印度唐言。"四镇即安西所管疏勒、于阗、龟兹、焉耆四镇。悟空经过龟兹(库车)时,于阗(和阗)疏勒(喀什噶尔)两镇业已陷没;四镇仅余龟兹、焉耆二镇而已;勿提提羼鱼所说之语言,盖为甲乙两种方言。

注

〔1〕《吐火罗语文法》,普鲁士科学研究院委托 Wilhelm Schulze, Emil Sieg, Wilhelm Siegling 等合撰。Göttingen 城 Vandenhoek und Ruprecht 出版,1931 年刊,五一八页。

〔2〕钧案名词变化子目中 obl. 省称凡四见,疑皆为 ablatif 之省写,故皆译作客格。

〔4〕钧案烈维教授所辑史文多从他书转录,年代多误。此处作吕光僭帝位,383 年泥流称臣云云,业经伯希和教授在《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中摘出,兹为改正如上文。其他讹误,随时据史文改正,不备注(如此条有"纪元前 19 年乘王莽篡位……"等语,案是年为成帝鸿嘉二年,下距篡位时有十余年,亦误,并删)。

〔5〕纪元 860 年左右纂辑之《酉阳杂俎》卷四所志较详,其文曰:"焉耆国元日 2 月 8 日婆摩遮;3 日野祀;4 月 15 日游林;5 月 5 日弥勒下生;7 月 7 日祀先祖;9 月 9 日床撤;10 月 10 日王为厌法;王出首领家;首领骑王马一日一夜处分王事;10 月 14 日作乐至岁穷。"史传不及此文之备,盖得之于某行旅者;其足堪注意者史文漏弥勒下生一事,可参考南条目录第二〇五,第二〇

七,第二〇八等号经。此节颇有关系,盖甲种方言中有关于弥勒之残经不少,尤其是在甲种方言与回纥语中特有 Maitreyasamiti nātaka 经也(参看余撰《中亚之贤愚经》,见《亚细亚报》1925 年刊二册三〇五页)。《酉阳杂俎》并志有龟兹国(库车)相对之节庆事,拟在他文刊布之。

〔6〕 关于"四镇"者,可参考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一三页附注。其事尚不甚明了。其初以龟兹、疏勒、于阗、碎叶为四镇;纪元 719 年后西突厥请居碎叶,乃以焉耆代之。658 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四镇之名始见。若据《资治通鉴》记 670 年事,吐蕃陷西域,罢四镇,时焉耆已在四镇之列;其后碎叶复属中国,又以碎叶代焉耆;至 719 年西突厥请居碎叶时,复以焉耆备四镇。

〔8〕 钧案原作三八七,今改正如上文。鸠摩罗佛提既是车师国师,与焉耆无涉,业经伯希和教授指正其误。

〔9〕 我并在其他文件中见有"猴年"同"羊年"。

〔10〕 钧案《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禽斩焉耆王薛婆阿那支,立其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注云:《新书》曰,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此从《旧书》。则先那准乃婆伽利,至若栗婆准,早为龟兹所杀。列维盖沿沙畹之误,可参看《西突厥史料》译本一三〇页注八。

〔11〕 此吐火罗问题已费不少笔墨,西藏丹殊尔(Tandjour)藏有一题记似未见有人引证。西藏语 Vinayasūtraṭīkā 译本(丹殊尔 Mdo LXXXVI)题志谓此本乃 Dharmamitra 所制。据 P. Cordier 之考订,译本第一题志谓此 Dharmamitra 乃 Pakṣu 河畔 Tarmita 城之人。按 Pakṣu 为梵语乌浒水之名称,即玄奘译作缚刍河者是已。至若 Tarmita 而未经 Cordier 考订者,显是乌浒水上之 Termed (Termez),而位在吐火罗北界者也。《大唐西域记》卷一云:"出铁门,至睹货逻(吐火罗)国;……顺缚刍河北,下流至咀蜜国(古读作 Tat mit)。"

〔12〕 敦煌今以斯坦因、伯希和二君之发现佚籍而显于世,其名曾见 Hans Reichelt 君发表之窣利语(sogdiens)文件(《英国博物院藏窣利文残钞本》,第二分,《非佛教文件》1931 年 Heidelberg 城出版),写作 Drw"n = Dar wan。就反面说,其情形与安息(Arsak)译名相等。汉文第一字鼻音收声曾由侨居其地之伊兰侨民用流音 r 代之。Ptolémée 书所录之希腊文译名 Throana,盖本此伊兰写法。

〔13〕 《悟空行状》云,勿提提羼鱼,华言莲花精进,则为梵语之 Utpalavīrya。库车语之对称应是 Utpal-tairauwñe。译名似有省译,此亦惯例,盖

在庙寺簿籍之不少署名中常见有之;例如 Jñāna candra 省署作Ňa ca 等例是已。勿提盖为 Utpala 省写的 ut 之对音;提羼鱼应对 tsirauwñe。鱼字或为鲁字之误,则其原译名下半之提羼鲁可对 tsirau(wñe)矣。

吐火罗语与库车语

见《亚细亚报》1934年刊第一册二三至一〇六页

伯希和撰

近四十年来敦煌、新疆一带的文物发现以后，其中有三种语言是世人从来未识的语言。一种是窣利语，我从前因为此语的发源地就是古之康居，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以康为姓者，可以说十九是此地的人，所以我在从前译此语曰康居语。后来虽经缪莱考订是粟特，然而我总以为粟特的名称仅见《周书》同《北史》，《魏书》的《西域》传是从《北史》抄补的，原书是否著录有此粟特，未可知也。末了我想起了一个折衷的译名，名曰窣利语；《大唐西域记》卷一说："自素药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这是我定名之所本，至若晋、唐间的同名异译，若修利，若宿利，若速利，若苏哩，虽然散见释藏诸译本，恐世人不识，所以不用。此一语言流行区域，较其他两种语言为远，北方竟传布到北突厥可汗建牙之所。

其余两种语言，最初定名曰第一种语言同第二种语言。后来第二种语言名称叠有变换：曰东伊兰语，曰于阗语，曰塞语，这是最近的定名；《汉书》九六上《罽宾传》曰："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塞语名称本此，梵文亦有此种名称，旧译作释迦，作赊迦，作铄迦。此种语言文字，据所得写本考之，大致流行于于阗、鄯

善一带。

第一种语言后名吐火罗语，并分为两种方言：曰甲种方言，曰乙种方言。证以此二方言流行的区域，甲种方言独在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发现；乙种方言上述两地固见有之，可是在库车一带盛行；由是 Lèvi 定名曰焉耆语，曰龟兹语。后又有人以为焉耆语名称不妥，仍名之曰吐火罗语。

这些语言关系各种宗教输入中国一事很重，有些宗教似以此种语言为媒介，尤其是吐火罗语之与佛教。列维教授曾说过，佛教初输入时，所用译语，在音义两方面，与龟兹（库车）语近，与梵语远，足证是从转贩而来，可见此一类语言之关系重大。

据伯希和教授的考证，只有所谓甲种方言是吐火罗语，而乙种方言是库车语。库车语这个名称我觉得太新，因为库车名称最早著录时间，不过 11 世纪下半叶；所以我从前译列维的《库车语考》为《龟兹语考》。现在为求译文忠实，还是用库车二字，惟有时著龟兹、屈支等名于下，俾详所本。吐火罗是本编常见的名称，虽然有吐火罗、吐呼罗、兜佉罗、兜佉勒、睹货罗种种同名异译，除必须引证别译外，皆用吐火罗译名代之，以期划一。又如回纥亦然，后来著录的回鹘、畏兀儿、畏吾儿、回回等同名异译，皆用此初译名概之。

本编所译伯希和教授研究两篇，一题《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一题《说吐火罗语》。前篇较长，分五段，无子目。首驳前人定名之非，并辨明贵霜非大月氏；次就回纥文题识，而证明甲种语言为吐火罗国之吐火罗语，乙种语言为苦先语或库车语；三根据此类语言之一名称，上溯至《后汉书》之罽离，下抵悟空《行记》中的柘厥；四补正列维文之疏误；五结论。后篇证明乌耆、乌夷等名称皆为传写

之误，因为昔人有以甲种方言为焉耆语者，故旁考及此。伯希和教授撰作之提要是很难作的，学识之博，考证之广，可谓前无古人。音韵始终是我的缺点，此编涉及音韵地方甚多，有行不通时，曾就正于曾君广源王君静如，自信疏误或不如前此之甚。原文希腊字母，概易为罗马字母，凡有 bêta，gamma，delta，thêta，khi 等字母处皆以 bh，gh，dh，th，kh 代之。

1940 年春　冯承钧识

（一）

使我发表这篇研究的两篇论文[1]，同将缪莱（F. W. K. Müller）首先创定的而在今日几尽采用的“吐火罗语”（tokharien）名称重再提起；吐火罗语，就是首先定名曰“第一种语言”之印度欧罗巴语，其中“乙种方言”（dialecte B）的文字适应库车（Kacā）方言，而“甲种方言”（dialecte A）的文字只有哈喇沙尔（Qarašahr）同吐鲁番（Turfan）两地有之；可是这两篇论文所提出的答解并不一样。

列维君在 1913 年曾将“乙种方言”定名曰“库车语”。谢额（Sieg）同谢额凌（Siegling）二君在所撰《吐火罗语残片》第一卷（1921 年）四至五页中曾驳“库车语”名之非是，以为在哈喇沙尔与吐鲁番两地不特见有乙种方言的文字，而且见有乙种方言的壁上题识。反之，甲种方言既然仅见写本著录，他们假拟其非一种本地土语，而认为来自大夏（Bactriane），质言之，来自未来的吐火罗地方（Tokharestan）之一种语言，同时与佛教移植于新疆，并与梵文同为其地之作媒介的语言；他们既然提出这种假定，可又自己声明无从解说何以甲种方言写本仅见于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而库车为佛教从大夏东渐这些地域必经之道途，反无此种方言写本之理。到了

1921 年，他们决定为仅见写本的甲种方言保留吐火罗语的名称[2]，而对于别一方言暂名之曰“乙种方言”。至若钢和泰（de Staël-Holstein）君在 1908 同 1909 年所发表的那些论文，皆未提及，钢和泰君（柯努君曾有一时采取其说）曾试为证明“吐火罗语”，吾人不应视为“第一种语言”之任何方言，而应视为“第二种语言”，质言之，Leumann 误称之“阿梨耶语”（arienne），我名称之“东伊兰语”，嗣后世人采吕岱司（Lüders）君之说，而在今日渐具定名倾向之“塞（śaka）语”。

其间谢额君曾在他那些甲种方言写本中发现一个 ārśi 语名称，以为就是回纥人所称“吐火罗语”之土人名称（1918 年），而缪莱提议将此 ārśi 比附 Strabon 地志中之 Asioi，Trogue Pompée 史书中之 Reges Thocarorum Asiani[3]，中国载籍中之月氏。此 ārśi 名称谢额与谢额凌二君在 1921 年他们所撰的《吐火罗语残片》绪言中，无一言及之；在 1931 年他们所撰的《吐火罗语文法》中常引此名，或独引，或在复合字中引之，然仅译作“固有名词”，对于此名同“吐火罗语”未定的比附，亦无一语隐喻及之。然有不可解者，此二作家先既以 ārśi 为“吐火罗语”之土著名称，缘何不用此名称，而保存其视为外国人如回纥之类所称 ārśi 语之名称欤。柯努、列维二君论文发表于前，问题景况如是。

柯努君承认 Arśi-Asioi 之音声比对，然将月氏屏除，缘高本汉（Karlgren）君曾告其月氏名称始见于纪元前二世纪之史书，其音读大致如 *Gwat-ti（*Gwot-ti，*Gat-ti，*Got-ti，*Gut-ti）；可是 Arsi-Asioi 与月氏之事实上的一致仍然存在[4]。柯努君以为月氏名称在“吐火罗语”中归结的名称，就是库车的古名，质言之 Kuči（屈支），今之 Kučā（库车）盖为一种阴类写法，Kučā（ri）犹言“Kuči 城”也。《摩诃

婆罗多书》(Mahābhārata)之 Rsikā 乃为 ārśi 语"学者(Pandit)语源"之所自出。昔有安西都护府,治所先在吐鲁番,后徙库车,缪莱并以此安西名称比附 ārśi,如有理由,则亦可将 ārśi 名称扩张及于"乙种方言"。柯努君既见高本汉君所考纪元前 2 世纪大夏二字之对音读若 D'ât-g'å,乃将马迦特(Marquart)所为大夏与吐火罗二名之比附屏除,然而承认此二名在事实上仍为同名异称。其结论如下:名称"吐火罗语"之语言确为月氏之本来语言,然在月氏征服吐火罗人后,始得是名。至若原来吐火罗人,或因其始终占据吐火罗地方,或因其人来自玄奘所记之"睹货逻故国",其本来语言应为一种与塞语相类之东伊兰语。"然则钢和泰之说并不如缪莱、谢额之想象而被人完全反驳也。"

列维君先说谢额、谢额凌二君既将吐火罗语名称保存,所以不再如 1908 年时谓吐火罗语是月氏(Indoskythen)之语言,继以为二十五年来,"无一证实此仅仅根据一种回纥语题志而定的吐火罗语名称之说,而且辅助之说并亦无之";"回纥文之《弥勒下生经》(Maitrisimit),先从印度语译("译"字有疑义)为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我们既在甲种方言中见有同一经文,似可证明甲种方言即是吐火罗语。但是不能证明中亚其他语言中皆无此经也。我们所整理的那些文件,迄今尚未见有吐火罗人的名称……吐火罗人的名称表示一种很重的送声,而甲乙两种方言绝对无此送声也。吐火罗地方,不论为阿剌壁人之吐火罗斯单,抑为玄奘之睹货逻国,本在乌浒(Oxus)水上流。在玄奘时代,而我们所得诸文件亦多属此时代,睹货逻故国尚役属突厥。如此看来,有一突厥书籍系从吐火罗语书籍译出,无足异也,且应申言者,吐火罗人之语言,吾人现在完全不明。甲种方言文字所识适用于他们本国

的种族名称，只有 Arci 一字。”列维君曾经建议名乙种方言曰“库车语”，名甲种方言曰“哈喇沙尔语”，兹欲辩证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皆有乙种方言的壁上题志，与库车不见甲种方言文字之理，乃仿1913年研究库车史之例，将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史事裒辑；据说此两地之历史，“若与库车史比较，颇黯淡无色；从诸洞窟发掘所得之文学作品残片，与所见之壁画证之，固有一不可否认之智识的与艺术的生活，然为一种纯粹地方生活，未能发展于外也”。如此看来，迄于今日，毫无确定用吐火罗名称以名第一种语言之理。回纥文《弥勒下生经》之题志，亦可释其义为印度原本曾经圣月(Āryacandra)译为吐火罗国语言，而“用此译本流行于葱岭(Pamir)以东”。“吐火罗语”名称“则应消灭，至少应暂时消灭。库车语名称适宜于乙种方言，毫无疑义”。至若甲种方言，观 Ārśi 名称表现方式之异，俨若常用而不加思索的一种外国名字，可以令人想到此字仅为汉名安西都护府之译名。设若有人欲将甲乙两种方言定一共同名称，可以指定“库车语为西安西(Ārçi)语，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之语言为东安西语”。

我首先要声明的，很难同时将 Ārśi 同 Asioi 与安西共比对，像缪莱从前之主张，与柯努君之附条件的采用。Asioi、Asiani 等名称表现于纪元初年。安西名称则反是，只能上溯至纪元640年。又一方面不能说创设安西都护府时，采用一个 Ārśi 土名；盖安西犹言“安抚西域”；况且此是中国在边裔所设诸都护府之一，此外尚有安北、安东、安南诸都护府；这些名称自成保障，显是纯粹中国语名。

欲考订 Ārśi 之为 Asioi，首先应思及此二名称表现之时相距至少有五六百年，此意列维业已言之。纵然假拟纪元初年的名称

Asioi 可以比对最早在七世纪时表现之 Ārśi，尚须说明希腊拉丁名称中-r-丧失之理。缪莱曾引有对照之例(《吐火罗语与贵霜》，五七八页)，谓现代突厥语(turkī)俗称库车曰 Kučār 华语之大钱曰 dārčen；可是突厥区域中此类长拼音而加一 r 于语尾之字，与古代希腊标音中一种非突厥语的 r 之丧失，毫无关系之可言。缪莱别有一例较善，即五世纪中叶以来流传迄今之"波斯"译名是已，其所本之名疑是 Pāsī 而非 Pārsī。我以为此非节译，亦非讹译；好像中国人在五世纪时所识之波斯名称或由窣利(Sogdiane)人转贩而来，盖在窣利语中声母前之 r 不准有之，伊兰域内类多如是，例如 Bhs'ngh (*afsang?)同 Bhs'ngh(*fasang?)，或 fsx(*fasagh；窣利语基督教徒之称)，比对钵罗婆语(Pehlvī)之 frasang(即 parasange)，波斯语之 farsākh 等例是已[5]。可是此种解答不适应于希腊人认识 Asioi 名称时代。如此看来，Ārśi-Asioi 之比附似乎冒昧，至少可以说尚未成熟。

难道说 Ārśi 仅为"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对于汉语安西二字之音译欤？列维君以为是，而于安息之对 Arsak 作为证明。并云："中国古语之古 ni 音，今在官话中皆一致转为 eul，表示汉语鼻音中有一近于流音 r 或 1 之音素〔此处有一附注引证下列诸名之相等：敦煌 > 窣利语之 Drw"n(*Darwān) > 希腊语之 Throana〕。故意在甲乙两种方言之不少擦音(至少有六种)中选择颚擦音；正合汉语官话颚音化的"西"字 si 之发音，汉、和语 sei 之发音，古音读(据高本汉说)siei 之发音。

可惜我对于这些论据皆难赞成。姑置敦煌名称不论，盖汉名得本于一种土名，而窣利语的译写或者更为正确，容为意中或有之事；其事无关紧要，盖其涉及者，乃是纪元初年左右的一种译名，而

我行将言及之安息比对 Arsak 之说，于必要时，亦可加之于敦煌也。言及中国译写，必须注重年代。安息确可比对 Arsak，然在纪元初年，当汉语古齿音闭口音纯为齿音之时，而汉语无-r 尾声，遂有时以-n 译写外国语尾声之-r；佛教传布中国之初，译梵文俗语一种写法之 Uttarāvatī(= Uttarakuru)为鬱单越或鬱单曰，译Parinirvāṇa 为般涅槃，其理正同[6]。可是安西都护府始建于纪元 640 年。顾在唐代，或因汉语齿音尾声在北方初转为 d，继转为 dh，或因其他原因，而确定之事实则在突厥人同吐蕃人(西藏人)所耳闻而笔录者皆等若 r；如此看来，自是以后，有一译写外国字尾的 r 之完备译法，这也是中国人在此时代常用的译法；译 Arsak 作安息，乃适应汉代音韵之译法，而与唐代译法不合。反之，毫无理由可说中亚人在当时将汉语纯正的尾音 n 译作 r 也。列维君引证汉语古读之 ni，在近代官话中转为 eul，可是其说不确，中世纪汉语之 ni(例如尼字音 *nji)在近代官话中仍读作 ni 也。其转为 eul 者，盖为古读 nzi 音之字(例如兒字 *ńzi > eul)，质言之，凡用此发声之字，而此发声今日读作 j-(法语之 j)，惟以其韵母非 i，而为开口尾音(如 jou，jen 等类)，并在唐代经突厥人同吐蕃人仅用 z-译写者为限；今日有时听作一种流音，而使近代突厥人用 r-译写者(例如译大人为 darin 之类)就是此古发声之ńz-，今读之 ž-；可是此类用 r-的译写，在唐代无其例，其在今日对于，ńz- > j-发声固可引证，然对于中世纪汉语三个鼻音尾音中之最纯粹而最坚强的鼻音尾音之-n，纵不注意年代，亦难引证也[7]。况且不见有何理由而谓一种-ns-组合不适宜于“第一种语言”，致使之用-rs-替代。复次所用以替代-ns-者并不是-rs-，而是-rś-，列维君在此点上求助于汉语之 r 在 i 韵母前“颚音化”一说。北方官话中今日 s 在 i 前确读作舌叶音，可是此种近代

现象不能适应于唐代；自唐迄元，用 s 译外国语之 s-者，始终是 s，并非ś，亦非š-，纵 s 后有 i 亦然；反之，一切突厥文同吐蕃文之译写，皆用 s-发声翻译汉语之 si，而不用š-。节而言之，唐时安西二字在“第一种语言”中应译写作 *Ansei 或 *Ansai。同在其他语言中一样，我不信有写作 Ārśi 之可能；后一名称之起源，其意义与其用法，皆秘而难明。

现在请言 Tokhrï 问题。此名未见“第一种语言”著录，仅见突厥回纥文件中有之。Tokhrï 在突厥语中之实在意义，必定是一地名，犹言吐火罗国。有一回纥语摩尼教经文言及 tokhrï-daqï ulugh možak（Le Coq，Manichaica I.27），人尽同意而解作“在吐火罗国的大慕阇”，同中国载籍著录纪元 719 年来，自吐火罗国信奉摩尼教的大慕阇（mōže，možak）一样（《亚细亚报》1913 年刊第一册一五一至一五三页）。则就大体说，tokhrï 语（tokhrï til）在突厥语中应训为“吐火罗国之语言”。惟因有后此所见诸难题，拟先引证中国撰译著录之吐火罗名称。

梵文名之曰 Tukhāra 与 Tuṣāra，后一写法或如柯努君之说，乃由梵文训义为“霜”之 tuṣāra 引诱而成此种变体，然亦得如 Kern 向马迦特（《伊兰考》二三九页）表示之说，或因北印度之 s 发音有以致之。纪元 435 至 443 年间译出之《杂阿含经》（Samyuktāgama）中有兜沙罗，即是 Tuṣāra 之对音（参看列维说，见《亚细亚报》1897 年刊第一册十页；《通报》1907 年刊一二〇页）。此外 383 年译出之一经文写作兜佉勒，可以假拟其对音为 Tukhāraka，或为一种伊兰化写法之 *Tukhāraga〔 > Tukhārag〕（参看列维说，见《亚细亚报》1897 年刊第一册十页）。列维君又谓求那跋摩（Guṇavarman）在 431 年译出之一同样名录，以月氏名称代替吐火罗名称；此名录列举诸国方

言，有达罗毗荼(Drāviḍa)[8]、粟特(Soghdig, Sogdag, Sogdiens)[9]、月氏、大秦(地中海东部)、安息(Parthes)震旦诸国，并有佉沙(Kāsghar)[10]、裸形[11]、鲜卑[12]等国。缪莱(《吐火罗语与贵霜》五七六至五七七页)以为列维君对此二录兜佉勒、月氏两名假拟之比对，并无根据，盖彼以为诸国相距甚远，有何理由而使同一国名并见于两种经文之内。其实列维君所见甚是，盖其在本论文中(二四至二五页)将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殁于 413 年)所译一本中著录之国名重行录出如下：安陀罗(Andhra)、舍婆罗(Savara)、兜呿罗、修利(Sūli, Sogdiane)[13]、安息(Arsak, Perse)、大秦[14]；而此生长于龟兹(库车)之鸠摩罗什附註说兜呿罗即是小月氏。如此看来，4、5世纪的中国人曾将印度名称吐火罗之民族名曰月氏[15]。

我省称曰月氏者，因为求那跋摩在纪元 431 年译本中即作此省称，可是二十余年前鸠摩罗什作小月氏[16]。然则鸠摩罗什将此等若吐火罗的小月氏，解作司马迁记录之敦煌南山的小月氏，同 240 年左右《魏略》根据年代较古的来源所称之“月氏余种”[17]欤？我不相信。问题好像应该这样提出。

中国载籍名称大月氏之月氏，西逾葱岭，击大夏而臣之。大夏无大君长，有五翎侯(yabghu)，居东北北；皆臣属大月氏。有贵霜翎侯丘就却(却应为劫之误)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此先为翎侯后为贵霜王之丘就劫，应是创立 Kuṣaṇa 朝之 Kuzulakadphises，无可疑也。《后汉书》识其名号甚明，故云“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19]。

由是观之，中国载籍之“大月氏”，自丘就劫以来，皆属原籍大夏之贵霜，而非来自甘肃之“大月氏”。就地理言，大夏适应吐火罗国，所以马迦特曾提议在音声方面考订大夏为吐火罗。高本汉君

供给柯努君纪元前2世纪大夏二字之*D'ât-g'å读音，不甚可靠，盖-t仅为一种或有之尾声，而发声一方面，应注意大太二字之互用也。然而我以为纪元前2世纪末年之中国人，因译写吐火罗之名称，曾假用中国载籍固有之中国旧名（参看Maspero说，见《亚细亚报》1927自刊第一册一四四页），而此旧名之适用，遂有碍于译音之正确。

由是观之，贵霜即是大夏，别言之吐火罗，然中国人仍误称之曰"大月氏"历时甚久。除世所熟知之汉代载籍外，尚有《三国志》（卷三）之记录："太和三年十二月癸卯（230年1月5日），大月氏王波调（读作婆调，疑是Vasudeva）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但在流行文籍中，特在佛经译本中，所常见者，仅有月氏，而无大月氏。

晋代（265至419年）史书未正式著录有月氏或大月氏名称[20]。北魏拓跋氏建国于纪元386年，初与辽远的中亚无正式交际。晚至435年6月15日，始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同年9月9日，粟特国（Soghdig，Sogdiane）遣使朝献（《魏书》卷四上）。距遣使时不及三月，恐与所遣赴西域使者无何关系，只能说前此未久中亚道路复开，而粟特利之，遽遣使朝魏。其实第一次派往西域的使者似无成绩，又在436年9月4日遣使六人使西域。此次成绩较佳，437年龟兹（库车）、悦般、焉耆（哈喇沙尔）、车师（吐鲁番西北之雅尔）粟特（Soghdig）、疏勒（喀什噶尔）、乌孙渴槃陁、鄯善、破洛那（Ferghāna）、者舌诸国分两班遣使朝献（《魏书》卷四上），自此以后，西域使臣陆续入朝。惟《魏书本纪》未著录有大月氏使臣入朝事，但在《北史》（卷九七）《西域传》[21]中有《大月氏传》，言其王寄多罗[22]数为蠕蠕所侵，西徙都薄罗城，[23]已而南侵"北天竺"，自乾

陁罗(Gandhāra)以北五国尽役属之。续云,太武时(424至451年),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此类商贩应随436至451年间西域朝献之使臣而俱来,中国得悉大月氏国王寄多罗事,应闻之于此辈也。《北史》同卷有《小月氏国传》,王都富楼沙,质言之,Puruṣapura(Peshawer)也。大月氏王寄多罗为匈奴(犹言蠕蠕)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24]。传未记录著名的"迦腻色迦塔",疑得之于某次使臣,抑得之于550年之一西行巡历人也。观两传所志寄多罗名称皆同,似亦得之于436至451年间之商贩者,惟中国人以旧用"月氏"名称属之[25]。我尤信以为是者,当时代稍后的使臣来自此类"月氏"地域时,其国名不复为"月氏"。477年偕西天竺与舍卫(Srāvastī)国使臣同时入朝的车多罗国[26],或者即是寄多罗朝(Kidarites)之同名异译(《魏书》卷七上),而511年在两个月之距离中偕乾达(Gandhāra)伽使密(Cachemir)[27]二国使臣两次入朝之不流沙国使臣(《魏书》卷八),其为来自小月氏国都城富楼沙者,可无疑也。

鸠摩罗什所言等若吐火罗之"小月氏",盖为印度西北之"小月氏",而非残存敦煌南境之"小月氏"。可是立见因年代而引起之难题:言及"小月氏"之鸠摩罗什殁于纪元413年,而《北史》记载富楼沙"小月氏"事之史文似不得上溯至436至451年以前。复次波斯人与寄多罗朝之冲突,似只能在450年以后。对于此类难题可以答曰:报告寄多罗与其子战役消息者,固是436至451年间之商贩,然分系其事于"大月氏"与"小月氏"两传,疑与商贩无涉。所谓"小月氏",只有中国专有名称中有之,而所指者要为留存敦煌南境之部落。惟其名流传既久,多少具有传说的性质,是以939年之旅行者尚在考求此"小月氏"。至若大月氏,自3世纪最后三十余年

间西域交通断绝以后，已被人所遗忘，而世人仅言“小月氏”矣[28]。鸠摩罗什既为中国人翻译经文，故用当时中国人所识之名称，遂将吐火罗译作小月氏，缘其为当时尚能了解之唯一月氏名称也。否则以一生于库车（龟兹）曾游印度之中亚人，欲用甘肃西南部小月氏之名，解释吐火罗之地，岂不诞妄不经，况且大月氏本名用作吐火罗之汉文名称为滥用欤。迨至三四十年后北魏朝廷之人又闻有寄多罗之吐火罗国，译人乃又以月氏之名冠之。惟史文载有大小月氏，大者在史书中为最重，小者在传说中为最熟悉。由是于二者中选择其一，及为富楼沙之小月氏立传时，遂不免于采集《后汉书》若干关于甘肃小月氏之文[29]。

虽有此大小月氏传，然大小月氏在中国历史名称中之任务业已终了（惟除纪元661年唐代设置西域府州古名新用之例外）。至若吐火罗，在436至451年间商贩莅华后，曾与中国发生正式关系，然用真正国名，据《魏书》（卷五）：“和平五年十二月（465年1月13日至2月11日）吐呼罗国遣使朝献。”《魏书》本纪所记此国朝贡事，只此一见。453年遣使朝贡之十余国，457年遣使朝贡之五十余国（并见《魏书》卷五），或有吐呼罗在内，然而无从考证。总之，吐呼罗名称正式传于中国以后，未久又隐而不彰，盖其几立为哌哒所征服；自是以后常遣使朝魏，而有时遣使至南方之梁朝者，遂为哌哒。赖有465年一二月间之遣使，《北史》曾为吐呼罗立一小传（《北史》卷九七），惟所记四至邻国迷离不明，马迦特（《伊兰考》二一四至二一五页）只能作一部分之阐明也[30]。嗣后吐火罗仅在7世纪初年重见于《隋书》，时其国役属西突厥；自此以后，交际频繁，亘二百年。

此种交际，赖玄奘记传与沙畹《西突厥史料》而传，世人已熟知

之,我在本文中仅取品质备具身亲目击之证人若玄奘者之记载以考之。玄奘发足中国,历高昌(吐鲁番)、屈支(库车),从大清池(Isïgh-köl)而入窣利(Sogdiane)境,已而通行睹货逻(吐火罗)全境而至印度;归途取道瞿萨旦那(和阗)与罗布淖尔之南而抵敦煌。兹就其所言经历诸国之语言文字述之:

高昌国(吐鲁番东之 Q̣očo)汉化已深,玄奘所见之人皆作汉语,故未言此国人自有一种语言文字。

阿耆尼国(Agni 即哈喇沙尔),玄奘记云:"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

屈支国(库车),记亦云:"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

跋禄迦国(Bharuka 阿克苏),记有云:"土宜气序,人性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

迨抵窣利(Sogdiane)境后,所记遂异:"自素叶(Sui-āb)水城至羯霜那(Keš在撒麻儿罕南)国,地名窣利(Sūli Soghdig, Sogdiane),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

玄奘历经窣利全境而抵铁门:"出铁门,至睹货逻(Tukhāra, Tokharestan)国[31]。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Pamir 与天山西南部);西接波剌斯(波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Vakṣu, Oxus)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来,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

玄奘出睹货逻(吐火罗)境,至梵衍那(Bāmiyān)国,记云:"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至迦毕试(Kapiśī)国,

记云："文字大同睹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至尸弃尼(Šighnān)国，记云："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有异。"至商弥国，记云："文字同睹货逻国；语言别异。"

然玄奘所记中亚之各种文字，不仅此也。记朅盘陀国云："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喀什噶尔或疏勒)国。"记乌铩国云："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记佉沙国云："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语言辞调，异于诸国。"

至斫句迦国，记云："文字同瞿萨旦那(和阗或于阗)国；言语有异。"至瞿萨旦那国，记云："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

节而言之，玄奘所识中亚文字语言，可以类别于下：(一)有一几尽汉化之国，无特别语言文字可以记录，质言之，高昌(吐鲁番东)是已；(二)阿耆尼(哈喇沙尔)与屈支(库车)等国，文字取则印度，则模仿婆罗密(Brāhmī)文字矣，惟对于语言毫无记录；(三)更西属窣利语言文字之广大区域，粗有书记；(四)窣利境南，则有吐火罗文字，字源二十五言，书从横读，自左向右，而文记渐多，逾广窣利；附有梵衍那、迦毕试、尸弃尼、商弥等国，文字同吐火罗国，而语言有异；(五)佉沙，文字取则印度，而语言异于诸国，别有朅盘陀、乌铩二国，属此系统；(六)瞿萨旦那，文字聿遵印度，而语异诸国，别有斫句迦文字与此国同，而语言有异。

凡六类，只有窣利语吾人不复加以踌躇。至若佉沙语，吾人毫无所知，然不应忘者，有一印度名录胪列各种语言，已有佉沙语在内。至若瞿萨旦那语，若一思及前在和阗一带，与南路诸城东抵敦煌，所得诸写本，其文字出伊兰语，而经吕岱司(Lüders)君定名为塞(śaka)语者证之，似即玄奘所记之文字语言。诸印度学家受纪元

初印度西北历史之萦绕,倾向既重,必不致于忘却我辈所得之诸非梵文写本,年代大致甚晚,而吾人应宁就玄奘所识之情势立定脚跟也。所谓塞语,吾人仅在一种颇有进化的形式中识其文,大致以敦煌诸写本作代表,而其写定时代,可以位之于9世纪至10世纪间;别有一类较古本,以和阗一带出土诸写本作代表,写定之时约在玄奘时代,或者较早;则距塞种时代尚远也;我以为所谓塞语诸写本之伊兰语,要为从6世纪至10世纪转化的和阗语。

至若"吐火罗语",第一种语言甲乙两种方言之写本、文件、壁题,要亦出于唐代,由是吾人之出发点应以玄奘时代为准,不应上溯至大月氏时或贵霜朝初叶。回纥文题志且在玄奘时代之后。吾人所见建国蒙古高原时代之回纥文记,仅有古体碑刻可考,其语言与北突厥同。迨至其种徙居吐鲁番以后,其时最早不逾9世纪下半叶,回纥文始供给有用突厥语言编辑,而用晚见的窣利文字书写之文件,是即吾人所称之回纥语也。涉及从吐火罗语翻译之文字者,即在9世纪或10世纪时此类回纥之语言中。此 Tokhri 字,在突厥人视之,尤其是突厥回纥人视之,既为吐火罗国之名称[32],我以为就原则言,此名所指者不得为7世纪时玄奘所记文记渐多的吐火罗语以外之语言文字。然在此处吾人亦应就7世纪至10世纪唐代证明之情状考之,不得涉及 Trogue Pompée 书中之 Thocari 也。

假拟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即是玄奘所言之吐火罗语,玄奘所记能适用于此方言欤?玄奘谓吐火罗语横读,自左向右;则一方面与业已废置的佉卢瑟吒(khoroṣthī)文字,又一方面与其他本于阿蓝(Aram)系文字如窣利文方式的文字,毫无关系。由是观之,可以令人想到的,只有一种原型,玄奘虽未记录,似为婆罗密(Brāhmī)

文字；玄奘未言此种文字者，或因此婆罗密字之在吐火罗国写法颇异。又一方面，吐火罗字源二十五言；今颇难言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究有字母多少，盖有若干字母成双，别有若干第一种语言不需要的字母而有时用以译写梵文者。第若仅就第一种语言本身之音素计之，好像其固有字母约在二十五言左右；如此看来，在此点上亦无不能排除之困难。惟玄奘对于吐火罗语之观念或者模糊不明。然所余问题即在考究玄奘所记吐火罗国的吐火罗语，与回纥题志中的吐火罗语之几尽必然的一致，是否能与考订第一种语言为吐火罗语之说相合。

（二）

赖有缪莱与其同僚等之努力，吾人始得认识若干题志，现宜取而研究之：

（一）缪莱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07 年刊，九五九至九六〇页”，回纥文题志：“《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经》，第十分终，由阿阇黎（ācārya）论师（vaibazaki = vaibhāṣika）圣月（Ariacintri = Āryacandra）从印度语言（änätkäk）之《弥勒下生经》（Maitrisimit = Maitreyasamiti）编[33]为吐火罗语（Tokhrï），并由博士 Prtaniarakšt（= Prajñārakṣita）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Türk）。”

后来缪莱同谢额君发表《弥勒下生经与吐火罗语》论文（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16 年刊），在此文四一四页将同本其余诸卷题志刊布。圣月的名衔在其中大为加增，而 Prajñārakṣita 的名称陆续写作 Prtyanksit，Prtarakašit，Prtanyarakšiti，Prtanrakšit，Prtan-，Part-，Pratanrakšiti，Pratnarkšit，足见抄录者不解此名；并据此文得知此《弥

勒下生经》有二十七分；惟最有关系之点乃在谓圣月是 Nakridiš或 Nagridiš国(uluš或 ulas)人，而 Prajñārakṣita 是 Il-balïq 人。前一名应对 Nagaradeśa，而此 Nagara 国应是阿富汗今J̌elālābād 城附近之 Nagara 或 Nagarāhāra，诚如刊布题志者之假拟；此城延存于中世纪初年。至若 Il-balïq 刊布题志者以当元、明时代伊犁流域之亦剌八里(Ila-balïq)或亦力把里(Ili - balïq)。此考不及前者确实，盖伊犁在唐代已以伊列(Ïla，Ilä)之名而显(Kāšgharī 书在十一世纪写作 Ila)。据我所知，亦剌八里或亦力把里未见元代以前载籍著录，伊犁与吐火罗同吐鲁番之回纥皆相距甚远，复次一回纥人毫无将 Ili 省写作 Il 之理由，除非抄写者之误，然亦不类真相。Il-balïq(亦可读作 Nil-balïq)或者是一 El-balïq = Al-balïq。宁视此名是突厥语名，然为无人认识之名。

即因此经题志而使缪莱在 1907 年提议将第一种语言命名曰“吐火罗语”，盖在此题志中见有回纥文《弥勒下生经》从吐火罗语译出之指示；顾在窣利语与突厥语中既已见有佛教经文，他遂以为似可认定第一种语言或第二种语言为“吐火罗人之语言，质言之，月氏人(Indoskythen)之语言”，第在回纥区域见有译文，而有一回纥题志谓一种译本系从吐火罗语转为回纥文，则不如谓第一种语言是吐火罗语。谢额、谢额凌二君在 1908 年发表《吐火罗语为月氏语》论文(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08 年刊，九一五至九三四页)，他们在此文中将第一种语言之《弥勒下生经》(Maitreyasamiti nāṭaka)三种不同的写本选择几段研究，据诸本题志，原著者即是论师圣月。缪莱、谢额二君在 1916 年论文中将第一种语言的《弥勒下生经》同回纥文的《弥勒下生经》作一比较，考究回纥文借用第一种语言的文字，而加强其论证；虽不能说两经完全一致，关系密切，

可得言也,其为出于同一撰作无疑。我请补充一说,1916 年刊布的第一种语言题志,刊布人好像未注意到圣月名称前并未志及他"根据印度语言"编成此本(这或者不是实情;意者回纥译人增加此语而使其本更加名重,而忘将训为"编"而不训为"译"之 yaratmïš一字改窜,因而泄露其增加之迹)[34];无论如何圣月名后未言其经已从吐火罗语译为别一语言,而此语言即为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这是有利于考订第一种语言即是吐火罗语之一种凭证。

(二)缪莱《吐火罗语与贵霜》[Küšän],"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18 年刊,五六六至五八六页;又五八〇页",回纥文题志:"《一切有情……救经》,第三十二分终,原列阿阇黎论师 Klianzini(Kalyānasena)之 idivut[35]中,师从 küsän 语译为 barčuq 语,附有大阿阇黎 Srvarakšti 遗留之 idivut 经赞……"

(三)缪莱同一论文五八一页。回纥文题志:"……此外在 Tört Küsän(上一字犹言"四")之国(ulus 或 uluš)有诸博士(bakhši)大有功绩于佛教;对于彼等,Budarakisit(Buddharakṣita),Srvarakisiti(Sarvarakṣita),Azokrakkišiti(Aśokarakṣita),我亦跪礼。同样,在 Üč Solmi(上字犹言"三")……"

(四)缪莱同一论文五八二页(A. von Gabain 有增补文,见缪莱《回纥考》第四分,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31 年刊,六七八至六七九页),回纥文题志:"《十业喻鬘经》(Daśakarmopathaavadānamālā 钧案经名从意译)……终,论师 Sangadas(Saṅghadāsa)通晓论(śāstra)秘(tantra)与夫 kriyādhara,曾由 Ugu Küsän 语译为吐火罗语,并由 prašniki(别一题志作:praš tinki = praśnika?)Silazin(Śilasena)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türkčä)。"

缪莱对此犹豫难决之译名,我曾读作 Küsän,顾吐火罗语名使

他忆及 Kuśaṇa,他于是以为在此译名中见有汉代贵霜二字之对音,乃读作 Kuišan,仅在括弧中附带一种可能的 Küšän 译法,然仍视其为贵霜;Bang 君同 von Gabain 女士仅取 Küšän 写法;盖案照回纥文字惯例,只能有 Küšän 或 Küsän 的正读。然则应选择者,确为此 Küšän 欤?

列维、柯努二君在他们的最后论文中曾谓世人未识第一种语言中乙种方言之古名,质言之,库车流行的语言之古名。他们盖未见着羽田君前用日文现用法文刊布的那篇研究,我在《通报》1931年刊四九三至四九五页曾有说明。羽田君在此文中研究两种回纥文文件,其一关系摩尼教者,志有四人,一为 Qamllgh,一为 Küsänlig,二为 Solmïlgh。此 Qamllgh(=Qamïllïgh)当然是汉名哈密(Qamul,Qamïl,Qomul)地方之人,此名在 1050 至 1052 年间初见于 Gurdēzī 书,写作 Qamul (Bartol'd,Otčět o komandirovké,92,117)。二 Solmïlgh (=Solmïlïgh)是唆里迷(Solmï)人,元代载籍视之为"国",应距天山以北之别失八里(Beš-balïq)不远;缪莱回纥文题志之一所著录者,显是"三唆里迷"之国;此名又见 Kāšgharī 书(第一编一〇三页;Brochelmann《突厥字书》未著录),写作 Solmī。此类突厥名称是中亚史晚见的名称,其时或在 17 世纪前后。至若 Küsänlig 或"苦先人"之本义,无疑地指的是一库车人。Kāšgharī 在 11 世纪时即著录 Küsän 是库车之别名,而此苦先名称已在迄于明代之突厥语同蒙古语中见之[36]。羽田君之第二文件从而证实此种考订:是为涉及一名称 Suvarnapuš-(名尾阙)的苦先国王故事;羽田君业已考订其人或为七世纪时龟兹(库车,苦先)国王苏伐叠(Suvarṇadeva)之父苏伐勃驶(Suvarṇapuṣpa),或是未定的龟兹别一前王,王名相同,即吕岱司君在《新疆史地贡献》(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

1930年刊五至六四页)中业已言及者也[37]。由是观之,我们如能脱离迦膩色迦同那些贵霜之萦绕,便可确定那个与唆里迷国并著之 Küšän 或 Küsän 国名应读作 Küsän,则所指者就是库车地方与库车语。尚须附带言及者,我们既然知道第一种语言之乙种方言确已在库车流行,势须承认回纥文那些题志所称的苦先语就是此种方言;则第一种语言之乙种方言确为"库车语",诚如列维君在1913年所持之说矣。除我们业已知道的库车若干作家博士名称外,又可加增 Buddharakṣïta, Aśokarakṣita, Suvarṇarakṣita 等名,末一人且撰有一 Idivut(疑是伊帝目多伽)。这些名称好像不能使我们上溯到很古的时代。比丘名称有一种流行风习,而其足以使人注意者,此三人名名尾皆作-rakṣita,同翻译《弥勒下生经》的回纥译人 Prajñārakṣita名尾一样。其他二回纥译人名称为Śīlasena 同 Kalyāṇasena。考元代的命名流风,名尾常用 -śrī。若谓此库车三译人所处之时代在唐代与唐以前不远时代,我绝不以为异也。

前已见过有一题志说从苦先(küsän)语译为巴尔楚克(barčuq)语。缪莱忆及巴尔楚克是喀什噶尔东玛喇尔巴什(Maralbaši)地方之古名[38],曾以为此巴尔楚克语是回纥语;我以为他有理由,我为此曾引证到成吉思汗时代畏兀兒(回纥)的亦都护(ïdïqut)巴而术阿而忒的斤(Bačuq-art-tegin)之名称。

据一题志,Saṅghadāsa 曾从 UguKüsän 语译某经为吐火罗语,嗣又经人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别一题志言有"四 Küsän"。此 Ugu 字意义未详[39];可是"四苦先"同"三唆里迷"与"四吐火罗"情形相类,古突厥、蒙古社会相类之古称足资引证者不少,如"九乌护(Oghuz)","三十达靼(Tatar)","三忽里罕(Qurïqan)","二十秃马惕(Tümät)","万秃别干(Tübägän)"等例是已。

从苦先语译吐火罗语之人名称 Saṅghadāsa。班(Bang)君与葛玛丽(von Gabain)女士(六七九页)曾想到 Tāranātha 书志有世亲(Vasubandhu)有一弟子而经迦湿弥逻国王延至国中者,即名 Saṅghadāsa。但是用此名称之人确有不少,我不信受迦湿弥逻国王延请的世亲弟子能译库车语为吐火罗语。Tāranātha 书所著录的 Saṅghadāsa 年代似乎太远,颇难考订为此人。Bang 君与 von Gabain 女士却又引证他们的《突厥语吐鲁番文件》第四分四四四页著录的 Sangadiz-i (? Saṅghadāsa),亦另为一人。

由是观之,苦先语即是库车语,而非贵霜(Kuṣaṇa)语[40]。惟是世人可以寻究此突厥名称 Küsän 既有梵、汉载籍完全证明的 Kuci 或 Kuči(屈支)等名称在前,如何能够发生。柯努君(四五八至四五九页)以为此 Kuci (Kuči)得为月氏(据中国古读*Gut-ti 之读音)之"晚近吐火罗语"的名称;我不相信。又一方面可以令人推想突厥语 Küsän 名称得为 Kuṣaṇa 之转变。复次柯努君曾云(《月氏年代考》八页)钱币上之 Kuṣānu 似为一*Kuṣa 名称伊兰化的种名之属格多数,同"Iran"之为属格多数一样。如果库车古名 Kuci (Kuči)所代表者即是此原名之单数,似亦可在一定限度中解说 Ku-ṣaṇa 朝国势发扬时,突厥人因而采用此伊兰化的名称也。然则缪莱将 Küsän 与贵霜同 Kušaṇa 比附时,在年代同历史情形方面虽有误会,而名称之相类,似乎不属幻想。但是我以为此说仍是一种很假定之说。

欲使此种解说可能,势须承认库车参加历史之初,质言之,当汉代时,其地居民所操语言根本与 Kuṣaṇa 人之语言相同,质言之,与吐火罗人之语言相同。这可确是要使我们承认的,第一种语言

之甲种方言是否为吐火罗(Tokhri)语,第一种语言之乙种方言是否为库车(Küsän)语。

将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考订为吐火罗语者,就因为那些题志表示圣月之吐火罗语的《弥勒下生经》曾译为回纥文,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有此本,而同一方言之数本同一经文写本已在吐鲁番地方发现。列维君(二六页)曾驳此说,以为圣月的吐火罗语本得流传至葱岭以东;如果我的了解不误,他似说此本得从吐火罗语译为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与从吐火罗语译为回纥语一样[41]。此事显然可能,可是两种回纥文题志说译文是从吐火罗语转为突厥语(犹言回纥语);又一方面,除开若干窣利语或中国语之语辞外,其供给回纥、佛教不少语辞者,全是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而在吐鲁番地方出土的那些写本中,不见有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以外,尚有别一语言能可代表此供给不少文件于回纥译人之吐火罗语者也[42]。

我以为设若缪莱、谢额、谢额凌诸君等首先未将"吐火罗语"的名称并适用于第一种语言之"两种方言",世人对于 Tokhri 或吐火罗语为第一种语言的甲种方言之考订,将无所用其疑虑;顾乙种方言既在库车流行,于是有人假拟甲种语言乃是哈喇沙尔同吐鲁番两地流行之语,若谓题志明白指定的吐火罗语,并是库车同吐鲁番之土语,似乎不近真相。可是谢额、谢额凌二君所提出的一种答解,似乎可以接受,尤以其在《吐火罗语残片》绪言中主持之说为可取。前在库车发现者,只有第一种语言之乙种方言,然写本与日常生活文件皆兼而有之,此"乙种方言"确为库车所操之语言;我以为就是回纥题志中的苦先语。至在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发现者,两种"方言"写本皆有,可是见于壁上的若干题志,独用"乙种方言";

在“甲种方言”写本中，亦有用“乙种方言”注解者；至若“甲种方言”，仅由具有文学性质的写本作代表。于是谢额、谢额凌二君曾假拟他们所认为“吐火罗语”之“甲种方言”，乃是一种外国语言，而其撰作皆从外国输入。我赞成的就是这一说。“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确是吐火罗语，可不是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口说的语言，而是吐火罗地方口说的语言。“第一种语言之乙种方言”是自有的库车语，或苦先语，可是此语在其东哈喇沙尔、吐鲁番一带也有若干效用。这些地方的汉代古国，如建国于吐鲁番西北雅尔地方的车师前国之类，流行的是何种语言，吾人不知[43]。当中国屯田高昌之时，因其发展，其地多被汉化，土语节节退让，致在7世纪上叶，玄奘竟不知有土语之存在；可是在哈喇沙尔，不致皆说汉语，好像此地土语就是苦先语，质言之，库车语，“第一种语言之乙种方言”。其间突厥人进向天山，而在9世纪中，蒙古地方破灭的回纥帝国残部，曾在天山北之北庭（别失八里）与天山南之高昌（和卓）重建新国。当此9世纪同10世纪时，应为回纥、佛教编辑《释藏》之时间。若干旧有居民尚能懂得并能说库车语，加以这些邻处的“国家”时有交换。可是库车业已衰微。反之，其地尚有吐火罗语写本。根据一种上溯至7世纪初年西突厥的传说，回纥仍与吐火罗维持交际，而旧有的吐火罗语佛经尚未经回教消灭。所以输入“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的写本，质言之，吐火罗语的写本，而译之为回纥文，同回纥之摩尼教仍继续属望于吐火罗地方之情形一样。

甲乙两种“方言”虽有密切的关系，而其音声形态语辞颇有殊别，足以使人视为个别的语言。此种区别表示甚显，致在唐代初年将一种在库车用库车（苦先）语写的经文译为吐火罗语，复由吐火

罗语译为巴尔楚克语，而此巴尔楚克语得为回纥语也。当库车语（“第一种语言之乙种方言”）在回纥区域尚为人了解而多少有人话语之时，未将此经直接从库车语译为回纥语者，好像原经已在原语中佚而不传了。

（三）

由是观之，“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是吐火罗语，是贵霜（Kuṣaṇa）语，无论如何，是吐火罗地方的语言，至若“第一种语言之乙种方言”是库车语（屈支语，苦先语），与吐火罗国之吐火罗语有密切的关系，并应亦是哈喇沙尔之古语，或者亦是吐鲁番境内车师前国之古语。惟此说涵有此意；汉代此二种语言之相近，或者较吾人所见7世纪至10世纪的文件所表示者尤为亲密。我因此想将昔在库车、哈喇沙尔早有证明的一字，提起世人之注意，盖我以为复见此字于“小月氏”国中，质言之，复见于富楼沙、寄多罗朝所统治的吐火罗国中。然此说将使我参加一种冗长的而很复杂的讨论。

玄奘在纪元630年经行屈支（库车）国时，记录有一种灵异的传说，即屈支王金花驭龙事。顾金花恰与Suvarnapuspa之义相合，列维君（《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一九至三二〇页同三五四至三五五页）曾以此Suvarṇapuṣpa就是殁于619年或此年之后不久的苏伐勃驮[44]。吕岱司君曾在1922年将著录有殁于619年左右的Suvarṇapuṣpa一种文件（第四号文件）发表，后在1930年之《新疆史地贡献》中发表别一文件，亦著录有Suvarṇapuṣpa之名；惟此第二文件（第十一号文件）似视此人亡故已久；复次此件文字较古于第四号文件，而此第四号文件应写于7世纪的Suvarṇapuṣpa在生

之时。吕岱司君结论以为屈支应有两王皆名金花，其一王是较古时代的人，其一王是7世纪初年的人，而玄奘所记之金花乃古之金花。欲明其事，我们应该将此故事原文一部分重新审查。吕岱司君（二六页）曾将儒连翻译之文转录，然此段译文讹误特甚；似应注意哇特斯（Watters）同列维君校改之文。惟此种校改亦未充足。兹录原文如下：

> 国东境城北天祠前[45]，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龙戾难驭，龙驹之子，方乃驯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闻诸先志[46]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龙驭乘。王欲终没，鞭触其耳，因即潜隐，以至于今[47]。城中无井，取彼池水。龙变为人，与诸妇会。生子骁勇，走及奔马。如是渐染，人皆龙种。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杀此城人。少长俱戮，略无噍类[48]。城今荒芜，人烟断绝。

玄奘采取此金花王降龙故事之“先志”，究为何书？预为推测，或是先前的中国撰述，或是本地方的记录。同一屈支条后所记王弟割势明心故事，亦谓闻诸“先志”，此故事之民话的性质不弱于前；列维君曾说明（《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六〇页）此故事与属于迦腻色迦的民话相连系，可是此一民俗学的话题，流传甚广，近代之小亚细亚尚见流传[49]。可供采录此类故事之古时叙述西域的汉籍，吾人不知，或者是业已散佚之彦琮（殁于610年）《西域志》[50]。惟玄奘毫无全录前人之文而不著明出处之理，况且他未曾为此。则吾人只能说他采录的就是流行西域之外国语言记录[51]。

龙马龙驹等名辞早见中国古籍，属于尧的故事中亦有驭龙之

说。此外在6世纪时,吐谷浑国中亦传有相类之故事,据说:“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魏书》卷一〇一)纪元860年左右的《酉阳杂俎》[52]所记龟兹龙的故事已大有变化;谓古龟兹国王阿主兒[53]降山北之龙,后常乘龙而行[54]。

玄奘所记故事中之金花(Suvarṇapuṣpa)国王,应位之于何时欤?若谓其是殁于纪元619年或此年后不远之苏伐勃驶(Suvarṇapuṣpa)显有重大难题,诚如吕岱司君之说[55]。从619年至玄奘经过屈支(库车)之630年,相距仅十一年,不能在此十一年中位置龙子生长不恭王命,王引突厥等事也。但其事在玄奘意中不应甚古,盖突厥(=*Türküt)名称未见于6世纪中叶以前,库车传说之采录成文,只能在6世纪下半叶中,所录突厥名称,或为梵化之睹鲁娑迦(Turuṣka),或为尚未能详的库车语名也。所以当玄奘言此“近代王”“金花”时,我敢信其必视此王为当时国王之前王。可是同时我并承认后文所记王弟割势明心事是一古来话题,特近代化而已。若谓其中主角原是金花,屠杀城人者原是突厥,然我未敢相信。不过吕岱司君发表的文件,好像七世纪初年的金花之前,有一第一金花之存在,势将承认此故事即在此古王之时成立。惟玄奘言及此“近代”金花时,好像不知有前一金花,应视此王为其经过屈支时约十年前之金花。玄奘记录见闻固甚忠实,可少鉴别。年代错误不足以阻之,况他未见及此。尚有一事,现在固不甚注重,然不能不说明者,龟兹(库车)早年有一著名佛寺,名曰金花寺,或金华祠;有一经本(南条《目录》第四〇二号)曾在此寺中译梵文为龟

兹语，已而在纪元394年从龟兹语转为华言（参看列维撰文，见《亚细亚报》1925年刊第二册三二八页）；半世纪后高昌名僧法慧即在此寺从师习业[56]。此金花寺之得名，未始非由吕岱司第十一号文件所言之大施主金花有以致之。设若不误，最晚应位置金花于4世纪中。

至若龙与妇人生子，而经突厥屠戮之城，玄奘所记虽泛，然无足异，我后此别有说。据云城在国之东境，儒连译作"东界"，Beal与列维君（《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五四页）并从之。玄奘次言"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河，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釐，而东西随称"；城西北有阿奢理贰伽蓝[57]。就一经行库车之人应该提出的明白考订，此二照怙釐就是今库车东北北苏巴什（Subaši）地方隔库车河两岸对立的两座庙宇。至若从都城西渡河而至的阿奢理贰伽蓝，或应是今日 Qum-tura 之西，穆杂尔特河（Muzart-daria）畔之 Dulduraqur（Duldul-akhūr），或是库车河西之 Qutlugh-ordu（假拟唐时龟兹都城在河东，不像今日之在河西）。

毕尔（Beal《西域记》译本第一册二一页）曾说照怙釐名称，"完全可解而难于翻译"，并望文生义，而解之曰"明恃双"，以"双"指二寺，谓于每日一定时间叠受阳光。这种答解，未能辩护；照怙釐（古读若 *Tšiäu-ghuo-lji）必定是一译名。然我深信其非最古之译名，亦非最后之译名。郦道元《水经注》（王先谦本二卷十三页）引《释氏西域记》云：龟兹"国北四十里有寺，名雀离大清净"[58]。《释氏西域记》，在《水经注》中亦作《释氏西域志》或《释氏西域传》，得为道安（残于385年）所撰之一卷本《西域志》；然则雀离寺之名在4世纪时已见著录[59]。此寺显然亦是鸠摩罗什传之雀梨大寺，诚如列维君之说（《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三五页）；什在胎时，

其母是龟兹王妹，曾在此寺，请斋听法；相传什生于纪元 344 年，则龟兹之雀梨寺在道安殁前四十余年时早已存在，或者更古[60]。

此库车雀梨大寺的名称，当然令人想到纪元 518 至 522 年宋云在富楼沙城（Puruṣapura，Peshawer）所见迦腻色迦起造之著名浮图（stūpa），宋云名之曰雀离浮图（参看沙畹《宋云行纪笺注》，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三卷四二〇页）。沙畹已将《法苑珠林》卷三八所引阙撰人名的《西域志》之文转录；迦腻色迦塔在此文中即名雀离浮图[61]。法显、玄奘记此塔时，皆未名之曰雀离浮图，在慧立撰的同别一彦悰笺的《玄奘传》中亦无此名。惟在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卷中言及迦腻色迦塔时，曾云："即世中所谓雀离浮图是也"；可是道宣后引有宋云等奉使事，应为此语之所本（《校刊》第三卷四二一页）。

毕尔（《西域记》译本第一册首一〇三页）谓"雀离"常训为雀，惟在此处乃是 sūla 之译音，犹言屋顶尖或三锋。哇特斯（《玄奘行传》第一册六二至六三页）以为"雀离"乃是近类雀与莺类之小鸟，然而鸠摩罗什传中之"雀梨"写法，可以使人想到是一外国语名，他于是想到印度语名称一种雀类小鸟之 chūri，或是旧译"侏离"之同名异译。沙畹虽有最后之审慎，以为雀离得为音译，可是不免译之曰"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本九五页；《校刊》第三卷四二〇至四二二页），而列维君竟采用之（《亚细亚报》1913 年刊第二册三三六页），并谓："郦道元采用的名称，足以充分证明库车之雀离，就是借用迦腻色迦在富楼沙城建造的莺（雀离）寺之名称。"

可是毕尔、哇特斯、沙畹、列维皆未指出训雀离为雀为莺之出处，或字书，亦未证明此雀离二字为中国名词。案雀字意译固不误，离似原训莺，然应从《易经》名曰黄离，此外离字皆训作别离之

离。独用一字以名莺而与离字同音者,则作鹂与鸳,然不常用,而常用之名曰仓庚,或鸱鹠,曰莺,或黄莺,曰黄离留,或黄栗留(并参看《通报》1928 年刊四一二页)。雀离二字不论在文言方面,抑在俗语方面,皆未见有用作莺之名称者也。

沙畹之所以屏除译名一说而以其为一鸟名者,盖因信赖义净,又受《易经》黄离之影响,所以译之曰"莺"。然则义净之典据安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末)记录中印度那烂陀(Nālanda)寺附近有一小制底(caitya)或窣堵波(stūpa),高一丈余,是婆罗门执雀问佛处。义净续云:"唐云雀离浮图,此即是也。"沙畹译文(译本九五页)作"莺塔",并谓(《校刊》第三卷四二二页)名称虽同,应将此小"莺塔"与迦腻色迦之大"莺塔"分别为二。

二塔必须分别,显而易见;可是义净将二塔混而为一,亦显而易见。首应注意者,玄奘亦曾巡历那烂陀寺附近之小纪念塔,并谓是外道执雀问佛处(《西域记》卷九);然未言此是"雀离浮图"。观义净所记,足见他将中国人所知之雀离浮图位置于此;可是此名在中国《释藏》诸文中所指者不是此那烂陀寺附近的小制底;《宋云行纪》《西域志》《续高僧传》皆足证明所谓雀离浮图者,就是迦腻色迦起造之著名窣堵波,而宋云谓"西域浮图最为第一"者也。我以为义净误会的原因很单简;他在中国同别人一样闻有雀离浮图,然不解其名,而本人又从来未到过西北印度。顾雀离浮图中有雀字,那烂陀附近的小制底乃纪念婆罗门执雀问佛而立,遂误会其为雀离浮图,而将西北印度之塔位置在中印度。别言之,他误从义解,同后人一样。沙畹本人亦曾说过迦腻色迦窣堵波故事中未见有鸟。道宣在 7 世纪时早已说过"亦不测雀离名生所由"(参看《校刊》第三卷四二一页)。

义净的证明既无足取，若是注意到雀离二字为汉典所未详，而迦膩色迦窣堵波故事同库车雀离寺故事中，皆未见有鸟参与，我们应该承认此名是外国语名的译音。有一民话集著录有“雀离寺”，亦不足为我们的障碍。此集名《杂譬喻经》，由一未详为何许人之道略纂集，经鸠摩罗什在纪元405年译为华言；其中有一民话的主角是雀离寺之长老比丘。沙畹曾将全集迻译，曾说由此指示可以位置此民话于乾陀罗（Gandhara）国，盖雀离浮图就是迦膩色迦之塔名也[62]。此事可能，然不明了。迄今所见诸文，著录有迦膩色迦塔者，皆言其是一“浮图”，质言之，一窣堵波，未言一“寺”[63]。道略集经过不少窜改，沙畹业已言之，则迁就说，可以说此雀离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古雀离寺，质言之，库车雀离寺是已。总之，只须注意到此本乃由鸠摩罗什译出，而什是龟兹（库车）人，其母怀什时曾在龟兹雀离寺设供听法，就可以承认，或是因有乾陀罗雀离塔相连系的寺宇，或是因有龟兹的雀离大寺，译人在此处所采用的就是他周围习见习闻的名称；此事毫未涵有雀离实为中国语名之意也。

纪元570年北齐亲王高睿被杀于华林园之雀离佛院[64]。我们只能说当时在中国有些寺院采用《宋云行纪》传扬的富楼沙雀离浮图名称。

只须审查关于富楼沙雀离浮图与库车雀离寺之文，即使我们相信雀离二字是一外国语名之译音。玄奘《西域记》对于此说可以供给一种确证。前此已言凡考古家之游库车一带者，必定以为苏巴什地方库车河两岸对峙之二废寺，即是屈支（库车）之二照怙釐伽蓝。是亦斯坦因君（《亚洲腹地》八〇六页）所采之说，他并以为可能推测唐代屈支都城之方位。据斯坦因君说，玄奘位置二照怙

釐于都城北四十里，核以苏巴什废寺南端至今库车城之距离八英里，大致相合。就实际言，今库车城在苏巴什之西南南，不在正南，此外在河西今库车城位置处，未见有古城遗迹。可是斯坦因君曾将河东岸较古之废城游历测量，此城确在苏巴什之南，距苏巴什较近，周围大致有十七八里，与玄奘之说合。由是观之，此城应是唐代之屈支或龟兹都城。

就底蕴说，我以为斯坦因君具有理由，考订亦是，不过他的考古家的鉴识使他感觉苏巴什之废址即是二照怙釐，而未细读玄奘之文，盖其文解说实不如是之易也。核以《西域记》原文以及儒连、毕尔、哇特斯等之译文，二照怙釐不在屈支都城北四十里，实在"荒城北四十余里"，质言之，在人皆龙种后为突厥屠戮之城北四十余里也。据玄奘说，城在国之"东境"；儒连、毕尔解作"东界"；然则此类情形如何能与考订二照怙釐在都城北若干英里的苏巴什之说相合欤？

首先可以想到"荒城"之"荒"字得为衍文，下一"城"字得为唐代屈支都城。玄奘述东境之业已荒芜的龙驹城后，接述北境之照怙釐，已而还至"大城"，此大城即是屈支传首之"国大都城"，末述西境之奇特伽蓝。由此假定，屈支东境之龙驹城所在不明，唐代屈支都城得在河东斯坦因君所拟位置之地。

尚有别一答解，将荒城二字保存，由是二照怙釐位在龙驹城北"四十余里"。如采此说，顾此二伽蓝应为苏巴什之荒寺，则斯坦因君假拟之唐代屈支都城，只能为唐以前早已荒废之古都。唐代都城所在不明，或在河之东岸，或勿宁在河之西岸。如采此说，则困难仅有龙驹城在国之"东境"一语而已。然此"东境"二字，不必从儒连、毕尔之说释为"东界"。假拟唐代都城在河之西岸，与今城

同,则东境可指库车河以东全境,其城或者距都城不远。此说之难关则在斯坦因所测河东荒城之周围面积与玄奘所记唐代都城周围里数相合。此外,荒城亦得为晋代之龟兹都城,而在晋时"其城三重",未经斯坦因君记录[65],然我宁取合乎记录之答解也[66]。

无论如何,二照怙釐在城北约四十里,其城或是唐代与晋代龟兹之同一都城,位在库车河东岸,抑是晋代之龟兹古都,而在唐代业已迁都西岸。顾前此引证之《释氏西域记》,5 世纪之撰述也,或者可以上溯至 4 世纪末年,曾将屈茨(库车)雀离大清净位在都城北四十里。势须承认哇特斯(第一册四二页)创于先,Herrmann 君(见 Sven Hedin《南西藏》第八册四二六页,四三九页)继于后的结论:《西域记》之《照怙釐》,即是鸠摩罗什传的雀梨,同《释氏西域记》的雀离之同名异译,音韵方面并不抵牾:雀离古读若*Tsịak-ljię,雀梨古读若*Tsịak-lji[67];至若照怙釐古读若*T'sịäu-ghuo-lije[68],其发声一方面表示一种摩擦音,一方面表示一种颚音,恰与库车古译名龟兹或屈茨(=*Küci, c = ts)与玄奘梵译名屈支(=Kuči)相对之情形相类[69]。玄奘之照怙釐所代表者好像亦是一种梵化名称,若*Coguri(c = č; < cökürі?)之类。由是观之,吾人应兼顾雀离,而假拟其原名是从*Cäkri 抵于*Cägüri 的一种读法。

此名之采用,究本于何种语言?显然未本梵语。梵语撇开,当然令人想到库车语与吐火罗语,尚有别的论证可以补充此说。迄于现在,我们仅在佛教时代见此雀离名称,4 世纪左右龟兹有雀离寺,6 世纪初年富楼沙有迦膩色迦的雀离浮图;可是有一更古之例尚未有人引证。纪元 127 年发兵击焉耆(哈喇沙尔),班勇取南道,敦煌太守张朗取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期至爵离关,破焉耆兵[70]。雀爵二字在现在北京习读之音中,固有送声有无之别,可

是古读皆同,而读若*tsiak,并且两字互用。由是观之,爵离根本同雀离一样[71]。

此"爵离关"显然已在焉耆境内,我们毫无理由可想焉耆人当时所操的语言,不是东方高昌(吐鲁番)同西方龟兹(库车)所操的同一语言,质言之,库车语。第此爵离关名,显是2世纪时焉耆所用语言的土名,别言之,库车语名。诚如是,则无在龟兹雀离寺名称以外录求别一起源之何种理由。由是可见龟兹雀离寺名并不是借用迦腻色迦窣堵波名,因为同一名称并见于焉耆,而其时代同情况,似乎与迦腻色迦窣堵波无甚关系。由是观之,4世纪时龟兹雀离寺名采用迦腻色迦"雀离浮图"的名称,或有可能(虽然此雀离浮图名称不见于纪元518至522年以前),然未可必也。

惟是此雀离浮图名称,自经纪元518年的巡历人指称迦腻色迦窣堵波以来,在中国走运至少有200年。雀离既然是龟兹焉耆一带的库车语名,初视之,颇不解中国巡历人缘何用以指称印度西北富楼沙城一窣堵波之理。

我以为此问题似易解决。开始假拟的就是宋云等携有龟兹人作伴侣或译人;我以为此说不甚近类真相。然而不应忘者,迦腻色迦是一"月氏"(含有吐火罗意义的月氏),而所谓"小月氏",实在也是吐火罗人,也在5世纪中定都于富楼沙城。虽有嚈哒之进取,置一敕懃(tägin)为乾陀罗国王,然而很可以主张宋云在纪元520年左右经行富楼沙时,吐火罗语的活动范围尚存。惟是嚈哒统治以后,突厥继之,将印度西北古月氏(等若吐火罗)国之最后遗迹悉为破坏;"吐火罗语"固有名称同时消灭;所以玄奘在此城不复闻有"吐火罗语"的"雀离"浮图名称。库车语与吐火罗语之密切关系,可以解说雀离如何能在富楼沙、龟兹、焉耆等地同用为一种土名之

理[72]。

此库车语同吐火罗语之“雀离”或“爵离”，既是焉耆之一关名，龟兹之一寺名，富楼沙之一窣堵波名，意义为何，考订较难；在试为考究以前，我拟将我视为此同一名称之一最后写法提出。

唐代巡历人悟空应在纪元788年左右，经过龟兹，曾记录有若干寺名[73]；龟兹都城西门外莲华寺[74]；前践山下前践寺[75]；耶婆瑟鸡山耶婆瑟鸡寺[76]；东西拓厥寺阿遮哩贰寺。沙畹与列维译最后一语之东西二字，以为拓厥寺在东，阿遮哩贰寺在西。阿遮哩贰为独一不误之译名，前此已有说明。译人对于此句之上半，因动词之欠缺，翻译颇费踌躇，第若谓拓厥寺在东，阿遮哩贰寺在西，似与原文未合；东西二字盖独属拓厥名称者也。此拓厥译名，究何所指？沙畹、列维读上一字为“托”；是固为拓字之一读法，拓跋之拓即从此读，然此字具有数音，唐代译音用字即从其第二读音，应读若*t'siäk，因字形之易混，唐代译文时常游移于拓(t'siäk)柘(t'sia)二字之间，虽然在不少场合中，此种译名第二字之声母为k-，固与拓字收声之-k相合，然以拓字为正，亦非不可能也[77]。至若“厥”字，正例读居月切；然《康熙字典》所引突厥名称之古读又读九勿切；则应译写突厥名称为Türküt，我以为同一古读应适用于拓厥(或未定的柘厥)，如从古读可还原作*Čäkür[78]。在此788年左右经悟空记录之东西*Čäkür寺译名中，好像不能不承认其是630年玄奘所见之东西照怙釐(*Čögüri)，也就是4世纪时之龟兹城北的雀离(*Čäkri)寺。根据此种情形，我们势须假拟汉晋时代，此名在库车语中有一隐伏的u音(*Čäkᵘri)而未经最古的译名著录。无论如何，我敢确认东西拓厥寺就是苏巴什的废寺。

不幸此问题又因其他记录愈趋复杂。当悟空时代，质言之，8

世纪末年，地理学者贾耽(730至805年)辑有入四夷道；《新唐书·地理志》保存有一大部分。沙畹《西突厥史料》(八页)曾译其文，中有关系龟兹通拨换或姑墨(阿克苏)[79]之通道云："安西(库车)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80]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阿克苏)……"

今日库车通阿克苏之寻常通道，开始几径向正北行，至Šaldirang-qaraul转向西北，逾Cöl-tagh山，西行至赛里木、拜(Saïram & Baï)平原，经雅哈阿里克(Yaqa-arïq)后，转向西南行，复逾Cöl-tagh山，抵于阿克苏平原。所以近代考据家，尤其是徐松在他的《西域水道记》中，在此道上寻求贾耽的通道，沙畹曾采徐松之说。可是尚有一较为直接之道途，现在几近荒废，此道自库车径向西行，在浑士拉(Qum-tura)之南渡穆杂尔特河，始终循Cöl-tagh山南行。我在H.Cordier刊行Yule的《契丹路程》(第四册二三一页)一条附注中，曾说明这条南道就是鄂本笃(Benoït de Goes)在17世纪初年经行之道。斯坦因君在《亚洲腹地》八一七页曾试为证明此道亦是纪元630年玄奘经行之道，并是8世纪末年贾耽所述之道。沙畹的考订未免疏舛：先为中国的旧考订所误，以姑墨当雅哈阿里克，不以当位在雅哈阿里克西南南一百二十公里之阿克苏。此外沙畹从徐松说，以穆杂尔特河当白马河，谓渡河处在"库车西六十里"之和卓土拉斯(Khōǰa-turasï)[81](可是和卓土拉斯的方向实是西南)，则在Cöl-tagh山南，可是徐松、沙畹考订后来的行程皆在山北；此说既不适用于寻常通道，亦不适用于Cöl-tagh山南几近荒废的道路。复次斯坦因君曾云贾耽所述路程应有脱误；盖其距离里数只有四百二十里，证以648至649年间之战役，库车、拨换两城

间距离至少有六百里[82]，而玄奘所记屈支至跋禄迦之距离亦有六百余里[83]；此亦只能作为最小之数，诚如此数，将使人以为姑墨或拨换之都城，当时不在旧阿克苏城，亦不在新阿克苏城，而在此二城之东矣。

我们在此柘厥关的名称中，显然见有悟空拓厥（或柘厥）寺之同一名称，而此关名亦应还原作*Čaktir；则最简单之说似应承认龟兹城北有一Čaktir寺，城西有一Čaktir关。然而问题解决不能如是容易简单。纵谓玄奘同贾耽之通道不在Cöl-tagh山北，惟不应忘者，此道业已有人通行：我在1907年发掘好些通行关津的木简，而经列维君在《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一一至三一八页）研究其一部分者，就在此道入口之处，Šaldirang-qaraul地方；惟此关口在当时有一库车语关名Salyinsai-yoñyai；犹言"咸关"，此与Čaktir毫无关系。可是尚有别的成分加入。我在1907年得有一纸片，不幸现今不在手边，可是我确未忘记其上有"柘厥关"名，惜无其他指示；我拾得此纸片之地，就在苏巴什西边废址中，质言之，在"西拓厥寺"所在之处；此种偶合，未免令人感觉困难。苏巴什北山中有一古道，西通赛里木拜平原；必要时亦可加入考证之列。现在不欲讨论全部问题，仅欲声明何以将一表面很重要的而使我延搁甚久的记录，屏除于考证之外。

此文可以说在些异常情况中表现。徐松是熟悉新疆史地之人，他在1821年撰《西域水道记》时无一言及此，而我始见俞浩《西域考古录》（十三卷五至六页）引之，据云出舆地广记。案《舆地广记》，三十八卷，欧阳忞撰，序题政和（1111至1117年）中，而成书于1114至1117年间；李光廷1870年撰《汉西域图考》（二卷三四页）亦引此文，微有异同，亦云出《舆地广记》[84]；最近纂修《新疆图

志》者采其文，亦谓出《舆地广记》，而其文与《汉西域图考》同[85]。乃检《舆地广记》数次，不见此文[86]。兹录其文如下：

> 拓厥关[87]在昆河水上；有铁骑五千戍之。其西五十里为白马渡；路通瀚海军。白山南有铜铁厂；军民杂聚[88]为冶铸之所。关城两山壁立；中峡深[89]百十丈；水流其中，日夜有声。人行北山颠，俯视骨悸魂摇[90]。过大龙峪、千佛洞，逾岭至突骑施(Türgäš)沙雁州。西至拨换城由北山口二百里。关距安西百里。

此文若真，则不仅上溯至宋，且应上溯至唐；惟是其文多抵牾矛盾。除俞浩穿凿之说不计外，欲试为解释，则将自问此距安西百里，西距白马渡五十里之关口所在的昆河，究在何处。瀚海军实应在别失八里，而在此处表现，未免可哂。这些距离皆属不可能距离，而其道有时在 Cöl-tagh 山南，有时在山北，亦无此理，其实此文杂采古今记录之文，混淆不分。“昆水”似假自系于纪元 744 年之一记录者(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三〇六页)，然距此地甚远也。若白山，若矿产，皆属旧文所有。至若沙雁州而经《汉西域图考》同《新疆图志》大胆地考订为沙雅(Sah-yar)者，我以为显是转录《旧唐书》(卷四〇)之讹误，而重复加以讹误。《旧唐书》云：安西大都护府(库车)“北至突骑施(Türgäš)界雁沙川一千里”；雁沙乃是鹰娑之误(关于此鹰娑川者，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十四页)；既由鹰娑川误为雁沙川，复由雁沙川误为沙雁州也[91]。“五千骑”疑从 708 年之役突骑施可汗娑葛(Saqal)所发之“五千骑”濡染而来[92]。此外若千佛洞同只能为穆杂尔特河之河水，应是得之于 18 世纪下半叶或 19 世纪初年之某旅行人者。复次关于柘厥关同白马渡之著录，对于贾耽路程毫无增益，似录其文而有误也。总而言之，伪造

此文者，似为俞浩；李光廷不知鉴别，又从而录之，至其异文，盖因校勘之疏也；最后《新疆图志》盲采光廷之文，致有此失[93]。

上引伪文既不足论，而我尚不欲对于任何答解视为确定，仅暂时承认，在一较晚时代，见一拓厥（或柘厥）关，与一拓厥（或柘厥）寺，同以前见一爵离关与一雀离寺一样。曾经我们还原的种种写法是*Čäküri，*Čögüri（<*Čöküri），*Čäkür；既为一窣堵波名，又为一寺名，复为两关名，究竟含有何义？研究到此，我只有假定可恃，而且不能掩盖其脆弱性。但是我敢于提出。诸"关"大致有候望台以为防守；可是今日在中亚一带尚有 turā 一字，以名候望台，并以名窣堵波；此*Čäkür 在库车语与吐火罗语中，或亦兼有此二义。我曾踌躇思惟此字是否在某一时代转入突厥语中。吐鲁番出土之一石柱，上刻有作何事所得之功德[94]，如建一小型寺宇，造一大如麦粒[95]之佛像，陈一大如芥子（qaz-üyüri）[96]之遗物，营建一如针大之窣堵波尖（yignäčä sutup čäkür turghursar）[97]，皆功德也。Sutup 当然是窣堵波（stūpa）之对称。唯一不明之字就是čäkür。缪莱（十五页）曾将此字与čoqur，čuqur 共比较（后二字犹言"穴"），并谓相对之名假拟有一种如同喉音读法之鄂音化的读法，其例可引者固甚多也。殊未知此是一种无可如何的答解，盖一窣堵波之"穴"，非可"营建"（turghur-）者也。现在 yignä 字既已明了，与汉文对照，势不能不承认 sutup čäkür 之训义为"窣堵波尖"。由是可解迦腻色迦的浮图以雀离为名之理，盖其为具有规模的尖顶窣堵波也。可是此"尖"之义得为转训之义，原义或为"台"也。从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转入突厥语之字，现已识有若干，将来其数必定增加。吐鲁番乃库车语与吐火罗语势力影响之地，突厥佛教信奉开始之时，用一库车语或吐火罗语名称，以称佛教具有典型的建筑，斯亦无足异已。

(四)

草此文毕,尚拟将列维君为供非汉学家之参考,鸠集不少资料之论文,略加改正而补充之。

十页:——"吕光僭帝位,383 年,焉耆王泥流(有若干载籍之文误名之曰熙)称臣。"年代应误。吕光围龟兹久,太元九年七月(384 年 8 月 3 日至 9 月 1 日)始下。嗣后光还凉州;纪元 385 年苻坚被害,而光在 386 年始称王,未称帝,然有年号。

十二页:——"焉耆国元旦 2 月 8 日有婆摩遮——"婆摩遮应是娑摩遮(*samača?)之误。此种庆会龟兹高昌两地亦举行,而名曰苏摩遮(*somača?);仪式方面,与波斯之 naurōz 相近。我拟有一日将所辑关于此事诸文刊布。

十六页:——据列维君说,车师前部王于纪元 387 年偕国师鸠摩罗佛提(Kumāraouddhi)朝秦。"次年攻破龟兹之吕光送鸠摩罗什入朝。光称帝于凉州(386 年)。"此处所著年代显然皆误,与十页所著之 383 年亦有未合。其实车师前部王与鸠摩罗佛提朝苻坚时在 382 年。

十九页:——我前此引证列维君对于哈喇沙尔、吐鲁番两地史事的结论,据说"若与库车史比较,颇黯淡无色"。对于哈喇沙尔,固是实情,可是吐鲁番曾执有一种重大任务,并曾有过很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在回纥统治之时。所能言者,其地早已华化,一切文物,几尽依赖祖国,而无一种可与库车比较之"土著"的发展而已。可是关于吐鲁番史事之载籍甚多,只须裒辑讨论之。列维君所辑之概略,就是 W. Fuchs 君前辑概略之概略,自然"黯淡无色";可是吐鲁番史本身不如是也。

二十页:——“释藏译人名录中,哈喇沙尔仅占一席:即鸠摩罗佛提是已……吐鲁番供给中国之译人有二……释法众与释法盛……”可是车师前部王的国师鸠摩罗佛提不是哈喇沙尔人,而是吐鲁番人,列维君在十六页已自言之矣。

二三页:——尚应补充者,“十二生肖制”在和阗一带已见有之;自用佉卢瑟吒(kharoṣṭhi)文之时已然。

二五页:——《三国志》注“《魏略》曰《西戎传》曰”上一曰字应衍,中国考据家早已言及,则所引者非《魏略》引《西戎传》文,乃《魏略》中之《西戎传》文。

二七页:——我在 1929 年 Izv. Ak. Nauk 中对此原籍缚刍(Vakṣu, Oxus)河畔咀密(Terméz)城的吐火罗人达摩密多罗(Dharmamitra)撰有专注;Lalov 女士在《丹珠尔目录》二二六页曾引之。

(五)

我的论文包含假说不少,我并不期待一一审查证明。异议固众,我暂时仅采其立说较长者录之。就中若考订贵霜为吐火罗人,而不视其为真正大月氏之后裔一说,引起伊兰关系问题,此亦世人时常假拟彼或此具有者也。设若我有理由,吐火罗人或贵霜应属一种语言单位,当远古时代业因连续的潮流,发展之地不特仅限吐火罗国,而且波及龟兹(库车)、焉耆(哈喇沙尔),甚至抵于高昌(吐鲁番)也。可是语言名称,甚至种族名称,常由此一团体推移于别一团体;吾人在拉丁语中所称罗马系语言中法兰西语之名称,使人信其为色尔特(Celtes)语,然自称此罗马系语之名称,则用日耳曼部族之名。总之,我以为有两点我是脚踏实地的:那些回纥题识中的吐火罗语,应是玄奘在吐火罗地方所识的晚代吐火罗语,而同一

题识中的苦先语，就是龟兹(库车)语。

然则可以说西域有两种“土著”语言：于阗语流行南路；龟兹语流行北路。另外有两种外来作媒介的语言：粟特语同吐火罗语；西域来的姓康同姓支的人，大概是操此两种语言的人。惟惜佉沙语无多证据，或亦土著语言也。

钧 跋

1941 年 4 月 12 日

注

〔1〕 柯努(Sten Konow)撰吐火罗语是否为吐火罗人之语言(见《大亚细亚》第九卷四五五至四六六页)；列维(Sylvain Lévi)撰《吐火罗语》(见《亚细亚报》1933 年刊第一册一至三〇页)。

〔2〕 这种结论曾经缪莱、谢额二君在 1916 年共同署名提出(《弥勒下生经与吐火罗语》，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16 年刊四一〇页)：“突厥语之 tokhrī 即是吾人现在认定之甲种吐火罗语。”两年后缪莱又将此语重录入《吐火罗语与贵霜》一文中(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18 年刊五七五页)，并据勒柯克(von Le Coq)面语，列举有若干“吐火罗语文字”(Tokbrī-Texte)发现的地方；诸地名中列有库车境内 Qīzil 同 Qum-turā 两地。此说疑有误解，因为谢额同谢额凌二君曾言库车境内未曾发现一件“甲种吐火罗语”文字也。好像当时缪莱以为只有“甲种吐火罗语”是 tokhrī，勒柯克仅指出“吐火罗语”写本发现的地方，而未分别甲乙；但是很希望有人明白表示。

〔3〕 列维君(五页)误以此种比附属诸谢额君，而又误以 Trogue Pompée 书有一 Tocharorum 写法。

〔4〕 我不想在此处重提月氏(或月支，此种写法最晚在纪元 3 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中已见著录，后别有说)二字之古读问题；佛兰克(Franke)(《突厥民族之认识》二一至二四页)君，钢和泰男爵(《Kopano 与月氏》，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14 年刊六四三至六五〇页)，同缪莱(《吐火罗语与贵霜》，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18 年刊五六六至五七〇页；并参看佛兰克之说，

见《东亚期刊》第六卷八三至八四页)对此讨论尚详。我仅申言月字在纪元500年左右读若*ngiwat,唐代吐蕃语之译写同元代八思巴(Phags-pa)字母之译写,皆用ṅ字母录此喉鼻音发声。缪莱在他所撰的《回纥考》(十五页)中以为在一回纥题志之Kitsi(或Ketsi或Getsi)同撒难薛禅(Sanang-Setsen)书之Gaču中重见月氏名称;然我曾说Getsi是译人义净名称之音译(义字亦是用古ng-发声),而Gaču应是Kaču乃Kači之讹写,就是西藏语之Kha-čhe,克失迷儿(Cachemire)之名称也;缪莱应已信从,盖在他的1918年之论文中,不复提及此二名称也。据劳费(Laufer)君说(《通报》1913年刊五九三页,同1916年刊五〇九页),在晚代西藏文中所见训为年月之月的yol字(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乃假之于汉语之"月"者,然而这种用近代发声同古代收声(纵然亦不合例,因为西藏人曾将汉语古-t收声听作并写作-r[疑从-t>-d>-dh])的写法,而成月字读音之理,诚不可解。又一方面,即因*ng-发声,此月字在译写中殆从未用之;其他具有古*ng-发声诸字亦然。玄奘记传译写Koṅgoda因作恭御陀(御字音*ngiwo),然在一名之中间。Eitel《字典》二版二〇一页有一"月摩尼"还原作vimuni,然是一种讹误,好像摩尼是maṇi而此月字指太阴也。缪莱亦引证同一《字典》一九七页之"月梦耶",认是vijaya之对音,其用月字译vi者,盖从儒连(St.Julien)《还原方法》二三页之指示;可是此二例之出处,从未有人见之,纵有出处,亦只能本于晚见载籍。迄于现在,古译用月字可能参证月氏译音之独一例证,只有月婆首那的名称,这是六世纪中叶优禅尼(Ujjayinī)国的一个僧人,而其原名好像是Urdhvaśūnya;但从此时上溯至月氏名称见于中国载籍时代已有七百多年。这个独见的而译法差违的例证几可以说毫无可以参证之处。唐代尚有一例,就是"阿月"或"阿月浑"的译名,应是伊兰语胡桃agoz名称之译音(参看劳费《中国伊兰》二四七至二四八页),然月字在此外国语名称中亦未用在名首也。又如突厥部落处月名称,月字亦不在名首,或者是Čigil的译音(参看《通报》1929年刊二二二页)。发声有古读之ng-者,尚可引证纪元520年左右业波罗(疑是Yavana;参看《通报》1933年刊九六页)之业;唐代之啜嚕(girēv grīv)(参看《亚细亚报》1911年刊第二册五三七至五三八页;1913年刊第一册一〇一页);唐代景教碑译写Gabriel名称之业利。总而言之,汉语古ng-发声译写中之g-,在唐代已有证明,可是Urdhvaśūnya同Yavana之例或独见,或可疑,不足提供如同对于6世纪之同一结论,对于更古时代,当然更无理由。月字在元代译写中常见适用,然已具近代发

音，所对者是 yü-，yö-，ü-，ö-.；佛兰克君在《东亚期刊》第六卷九四页所引 Ögödäi 名称之译写，自不能参加此处讨论之列。

〔5〕 参看 Salemann, Manichaica V（见 Izv. I. A. N.，1913 年刊一一二八页）；费琅（Ferrand）之研究，见《亚细亚报》1924 年刊第一册二四一页，我曾供给附注一条，业经 Benveniste 转录入《语言学会记录》第二十三卷（1927 年刊）一二八至一二九页中。有若干撰述将波斯与波斯匿（梵文雅语 Prasenajit 之俗语写法 *Pasenig 之对音）译名发生关系，当然出于臆揣，其说之发生在波斯国名译写以后，不能用以解说其理。《佩文韵府》（上平卷四下波斯条）引有旧《山海经》之文曰："波斯、西域国去中国万里"；此文显误，且不知其何所本；总之，《山海经》无此文。今日"波斯"，成为人名，有为蜡烛商主；有为神话的帝禹时代之樵夫，民众想象其人是一卷发的伊兰人（参看 Doré《迷信之寻究》第十二册，第三一三图，一〇七三页）；此亦是一种晚近的传说，而于波斯名称译写之原名不能于其中索解也。

〔6〕 我引此类例证者，不欲使人误解安西名称译音之用 n，乃为伊兰语之 r 在声母前读音微弱所致。否则应该假定鬱单越与般涅槃两译名之原来梵文俗语名称亦经伊兰人介绍而至中国，此事非不可能。

〔7〕 拼音末尾有-r（同-l）之译写问题，迨至北方汉语之古闭口收声变化以后，遂重再提起。自元代始，古 ńzi 向 eul 转变，在译写中用以代-r（在 17 世纪以前很少用以代替-l）；至若-l，元、明两代译写其音或增一韵（-lo-la-等.）或用有-n 收声之字，可以锁里檀（sultan）按檀（altan）两例证之；由是因古闭口收声之脱落而恢复千年前译写-r 之旧法以译-l。

〔8〕 钧案所引之文未详出处，此国名从《西域记》译名。

〔9〕 列维君当时未识此名，缪莱（《吐火罗语与贵霜》五七六页）还原作 Soghdïq，是也。古体突厥文写作 Soghdaq，亦可读作 Soghdïq，缪莱之还原，疑本于此；11 世纪时 Kāsgharī 写作 Soghdaq。汉语之"特"（*d'ak）常译具有 ä 韵之字，然有时亦译具有 ä，e 二韵之字，或者亦译具有 i 韵之字；又一方面译名未本突厥语，则在此处对此伊兰语名勿庸问突厥语音韵是否调和。又如尾声之-q 亦是突厥语写法；原名只能是-k 或-g；我采用-g 者，盖证以时代比较不甚晚的 Sūli 写法，似以采用 Soghdïg 为善；可是古体突厥文作 Soghdaq（或 Soghdïq）而不作 Soghdagh（或 Soghdïgh），尾声应读若-k 而非-g；至若中世伊兰语此种尾声音读无准，世人已知之也。又一方面，缪莱在 *Soghdïq 后又云"等如匈奴君主

统治下之阿兰”。此种注释是无益的，至少可以说有一部分是不确的。此仅关系窣利语，与阿兰人(Alains)暨未定的匈奴统治无关系也。

〔10〕 原本作法沙，缪莱改作佉沙，是也。

〔11〕 缪莱附以*Nirgrantha之对称，而加一惊叹符号，然考行将引证之对照名录，鸠摩罗什于舍婆罗(śavara)下注云裸国，则在此处亦应释作舍婆罗。《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五卷五六一页之裸，似亦应改其对称Nagna为舍婆罗。

〔12〕 缪莱并云“所谓通古斯种”。此名所据梵文原名，吾人不知。至若鲜卑名称，在中国上溯至纪元前300年左右，我以为此名代表之原名，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同，似为*Sārbi，*Sirbi，*Sirvi等对音，我们在此处又见一用-n译-r之例，惟在汉代同汉以前译法如是，后来则用具有齿音尾声之字。此外我不信鲜卑是通古斯，然我对于此族与突厥或蒙古之血统关系，现在未能断言。

〔13〕 应注意者，自纪元400年始，窣利(Sogdiens)名称已有修利(Sūli)写法。

〔14〕 列维君校对偶疏，误以中国为大秦之对称，应改“地中海东部”。

〔15〕 沙畹《民话五百篇》第三册二二一页之吐火罗，乃头迦罗城还原之误，其尤难主张者，本文后言有一月支国王，而此月支应是吐火罗之译名也。玄应(7世纪中叶人)《一切经音义》卷四云，月支亦名月氏，本国自名薄佉罗，疑指*Bakhla(Bactres)也。

〔16〕 不可想到鸠摩罗什对于兜呿罗的注释，由月氏误为小月氏。盖在他纪元412年翻译的马鸣(Aśvaghoṣa)传中著录有一小月氏国王，钢和泰(六四八页)考订此小月氏国王就是迦腻色迦(Kaniṣka)，确实不误；印度原本应是Tukhāra，足见鸠摩罗什译此名为小月氏是有系统的。

〔17〕 参看沙畹之研究，见《通报》1905年刊五二七至五二八页；佛兰克《突厥民族之认识》，二五至二七页；缪莱《吐火罗语与贵霜》，五七一至五七四页(同《东亚期刊》第六卷八三至八六页佛兰克的评文)。司马迁的原文云，月氏败于匈奴后“其余小种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沙畹译文微误，缪莱译文亦有未合。“保”犹言“据”(与佛兰克君在1916至1918年间所持之说适相反)。除缪莱所引证的《诗》、《书》诸例外，史文可引之例尚多(例如《宋书》卷九六之“保白兰”；《史记》卷一一〇《索隐》之“余类保乌桓山以为号”等例是已)；此外保字在二世纪时避汉顺帝讳改为“治”(参看黄本骥《避讳录》)；治字犹言驻，州郡驻所曰治所。所以我与沙畹、缪莱、佛兰克之意同，在羌字后点

断句读，而不采 Wylie 同 de Groot 之说，以羌字属下文。汉代小月氏之主要驻所在青海东、西宁河南之湟中城。关于此族之史文不少，鸠集可成专帙；其中有一要文（《后汉书》卷一一七《湟中月氏胡传》），业经佛兰克君移译，既有讹误，亦无注释，（首施两端四字未解其意，又不知令居是一地名）；其中有一重要记录，言"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乃考羌人在语言方面似与西藏人寓有关系。沙畹所引纪元 939 年之高居诲《行记》，据云仲云族是小月支之遗种，好像是史文假用，不能肯定是一种直接传说也。除开业已利用之史文外（并包括沙畹所引《前汉书》六九卷三页之文），关于小月氏者，尚可引证《前汉书》六九卷一页，《后汉书》五三卷四页，《三国志》九卷二页（关于小湟中者）；尤其是王先谦本《水经注》二卷二页同三六页诸文。

〔19〕 此说大异寻常之说，尤其是诸翎侯同以后建设贵霜国之翎侯，在我视之，不是大月氏，乃是代替大月氏的大夏国人，而汉人"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也。由是我赞成桑原、羽田二君之说，其说见《佛和协会会刊》第四卷（1933 年）羽田撰《大月氏与贵霜》一文中。此种结论之承认，必须将《后汉书》之文大加修改，然无论如何不能与《前汉书》之说调和。高本汉君曾以相类的指示供给柯努君，而柯努君业在《月氏年代考》（《印度史学报》第十二卷八至十六页）一文中采用。我在 1914 年时（《亚细亚报》1914 年刊第二册四〇一页），建议将丘就却改为丘就劫（Kuzuladadphises），最近又拟将阎膏珍改作阎膏弥（Vemakadphises）（《通报》1929 年刊二〇一至二〇三页），并举有证明此种改正之若干例证。羽田君（四页）曾明白承认。高本汉君固识作丘就却，然其供给柯努君之古读，则颇类丘就劫之读音（二七页），顾欲采用此种读音，必须先采我的改正之文；反之，他将阎膏珍名称默示保存（三三页），而我以此珍字讹误，柯努君当然因此疑而难决。我乘此机会对于柯努君论文（二一页），所用之别一汉名微贡一言；柯努君在此文中言有一应与 Kapiśa 比附之国，质言之，中国人名称之罽宾是已。然则必须重再声明 Kapiśa 与罽宾之比附并不自然欤？反之，根据 600 年前之佛经译文，罽宾名称每有一梵本对照，所比对的始终是迦湿弥罗（Kaśmīra）而非 Kapiśa（此名独见于《文殊师利本劫经》〔Mañjusrīmūlakalpa 钧案汉译经名未详，意译如上文〕；其他译名皆可还原作 Kapiśi）。晚至七世纪时，罽宾旧名始经中国人采用，移称迦毕试（Kapisī）国，然当时滥用汉魏六朝旧名之例，世人已知之矣。就理想言，罽宾在先比对 Kapisī，嗣后久用为克失迷儿之译名，最后唐代地志又适用于迦毕试，非不可能；然而需

要证明,无论如何,不得谓罽宾迦毕试之比对为已成事实也。

〔20〕《晋书》(卷九七)大宛(Ferghāna)传记此国境界,偶一言及大月氏,质言之吐火罗,然无专传。斯坦因君在尼雅(Niya)境内所得之二木简,志有一月支人名,此简较之同一地域发现之纪元269年一种文件,年代相距不远(参看斯坦因《古和阗》三七三页)。二简上有文曰"月支国胡支柱",沙畹(同书五四〇页)译其文作 Indoscythe 国之 Indoscythe 胡人柱,然我以为似应译作月支国之胡人支柱较为通顺;盖胡人以国为姓,如支谦之类,先已有其例也。月氏之氏流传的音注皆音支。有人以为此注无价值;但是月氏(质言之吐火罗)国人翻经中国者以支为姓,若月氏之氏不音支,又无一种"月支"别写,其理将不可解(《山海经》有一篇中有月支,似为汉人撰作);则在269年左右的二木简上见有此种别写,可以确证其音读矣;此种别写又於288年在竺法护传中见之(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五卷二八九页)。法显在400年左右闻有一月氏王欲取佛钵(参看 Legge《法显传》译文三四页,此处氏字译文音读讹误);言者应云 Kuṣaṇa 或 Tukhāra,而法显曾依当时旧例,译其名作月氏。381年西域同东北诸国凡六十二王皆遣使贡方物于前秦主苻坚;其中或有月氏,质言之吐火罗,然而无从考证。

〔21〕《魏书》西域传已佚,后人以《北史》西域传补之;检他书所引《魏书》佚传原文,与《北史》字句多同。

〔22〕寄多罗对音假拟作 *Kitara,其人当然是货币上之 Kidāra;东罗马史书著录有 Kidaritas Ounnous。参看马迦特《伊兰考》五八页。

〔23〕马迦特以为是 Priscus 史书中之 Balaám,并谓不能考作 Balkh,曾求此薄罗城或 Balaám 于 Krasnovodsk 湾东之 Ba-lkhān,则在里海附近矣(《伊兰考》五页,五八页)。沙畹反其说而考订为 Balkh(《通报》1907年刊一八七至一八九页)。此问题过于复杂,未能在此处详言,可是马迦特之 Balkhān 在原则上不甚近类真相。考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âstivâdin)《律》,义净译本有一吐火罗国主,而西藏本译文相对之名称作 Bag-la,致使 Przyluski 君难于取舍(《亚细亚报》1919年刊第一册三八〇页)。可是与吐火罗相对之 Bag-la,只能为 *Bakhla,Bakhl,质言之,Balkh 也。又一方面,西藏文之 Bag-la 正对汉文薄罗二字之 *B'âh-lâ 音读。复次前此业已引证玄应《音义》,言月支自名薄佉罗,似应为"Bakhla(Bactres)国"也。

〔24〕《北史》于富楼沙之"小月氏"传夹杂有关于其种原来居地与被服

颇与羌同之文，乃采之于《后汉书》敦煌南之小月氏传者。

〔25〕 若谓其国人既非月氏而自称曰小月氏，似乎不类真相。

〔26〕 "车"字有两读，译写中并用之；然《魏书》既有车师，而此车字确音居；所以我读车多罗若*Ki̯ᵘo-tâ-lâ，又一方面，尾韵之-i̯ᵘo唐代突厥、吐蕃皆听作-i，参看《通报》1929年刊二二一至二二五页。

〔27〕 似应作迦，疑为传写之误；惟当时早已将原名假拟作迦者，而概写作伽，其例在《魏书》《北史》中常见有之。

〔28〕 3世纪末年以后所知月氏之消息甚少，致使记录6世纪下半叶史事之《陈书》（钧案原文未言本于何传）谓呔哒（Hephthalites）是大月氏之一种（惟误氏作氏），而波斯为大月氏之别部。呔哒之"大月氏"并见《魏书》（质言之《北史》）《隋书》。Watters（玄奘《行传》第一册一〇三页）谓《魏书》、《隋书》以吐火罗人属"小月氏"，可是此二史书中皆无此文。

〔29〕 钢和泰君见解完全不同。他以为鸠摩罗什名此确为迦腻色迦王曰"小月氏"者，必有所据。则迦腻色迦必为来自新疆之一小月氏；顾此王既据富楼沙，5世纪前富楼沙应有"小月氏"君主；谓寄多罗子所治之国曰"小月氏国"，应作如是解释。可是中国史文甚明。前有寄多罗的"大月氏"国传。后有寄多罗子的"小月氏"国传，并谓因此号"小月氏"焉。修史者同读史者决对不知有一迦腻色迦王，或其人是一"大月氏"，抑一"小月氏"也。史文显然以子治之"小月氏国"与父治之"大月氏国"相对言，别无他意；此类名称乃纯粹中国名称，并不牵涉到此种名称选择有无理由。我在我的论证中，未引证《西域记》所记和阗（于阗）罗布（纳缚波）中间城皆荒芜的"睹货逻故国"者；盖我以为此城从未存在。玄奘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可也是一个有闻必录的人。属于新疆那些荒城的故事不少，应有人将中国人的"小月氏"，或中亚人的吐火罗，加入外国输入而流传甚众的不少故事之列，并以吐火罗、迦腻色迦王为其主角。我以为应将"吐火罗故国"的故事与曷劳落迦（Rauruka）城荒芜的故事等量齐观。王国维（《观堂集林》十三卷十三页）拟将吐火罗名称与《唐书》中之图伦碛暨现在的Takla〔-makan〕共同比附，亦一穿凿之说也。

〔30〕 华人以南面为尊，而报告此国四至者，疑是以东面为尊之人，《北史》误会，似本于此；然此亦未能作全文之解释也。

〔31〕 （玄奘在纪元656至659年间之一译本中写作都货罗，可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五卷二八七页）。玄奘注云："旧曰吐火罗国，讹也"；案吐

火罗乃隋代译名，见《隋书》卷八三；旧译虽经玄奘指摘，后义净亦曾用之，而新旧《唐书》所采用者亦是旧译；惟义净在《佛说大孔雀咒王经》(Mahāmāyūrī)译本中译 Tukhāra 作睹火罗，不空(Amoghavajra)从之(参看《亚细亚报》1915 年刊第一册五三页)。北魏写作吐呼罗，前已引之。《新唐书》又作吐豁罗(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五五页)，未详何所本。摩尼教一小画图中有〔ča〕hār Toghristā〔n〕，犹言"四吐火罗"，西安景教碑作 Tkhwrstn，西藏文作 Tho-gar，又附带作 Tho-dgar。柯努君曾指出 Toghrī 或 Toghristān 中之 o 意义毫无，盖此韵母亦可读若 u 也，又一方面，旧写名称 Tochari，Thocari 等中之 o(关于一切写法，可参看缪莱《吐火罗语与贵霜》五七七页)，得为 o，亦得为 u，复次梵文之 Tukhāra 与汉文之吐火罗第一韵母确是 u；由是他以为原始名称作 Tukhara 或 Tughara；有送音的写法盖本于伊兰语某字发声之摩擦音有以致之。我以为皆有可能，然未免可疑，无论如何，汉语那些译名不能在此处作定谳。玄奘以吐火罗译名为伪者，显因其有送音发声，盖他本人的译名发声无送音也。反之，此种送音发声并见于魏、隋史籍(唐代因之)，在西藏文同若干古译名中亦然。世人可以思及玄奘之不承认有送音发声者，盖因其在此处根据梵文的写法，质言之，译的是 Tukhāra 之对音；此说亦不确，诚若是，他译写此名第二字应该用"佉"字；他的译名假拟的对音是 *Tukhwāra 或 *Tokhwāra 而非 Tukhāra。难道说他有理由么？世人可以疑惑到并量度到他所译的是一种混合写法，一种处于 Tukhāra 同 *Thukhwāra 间之折中写法。第一字的韵母，汉译名不能供给答解。盖《佛经》诸译名头一字用兜，第一韵母必定是 u，可是此字仅用以与 Tuḳhāra同 Tusāra 的对音相合。至若睹字或吐字，不但可以比对 tu-同 thu-，而且可以比对 to-同 tho-。复次可以确定者一切汉译名连同西安景教碑西利亚语的译名，皆假拟第二韵母是 u 或是一唇音半韵母 w。则 Tkhwrstn 可以为 Tokhuristan 或 Tokhwaristan，然吐呼罗确为 *Thukhura 或 *Thokhura，睹货逻为 *Tukhwāra 或 *Tokhwāra，吐火罗为 *Thukhwāra 或 *Thokhwāra。若谓第二字之唇音是一种后来表现的音素，亦颇有其可能，然证以《魏书》之译名，其在 5 世纪中叶确已存在。

〔32〕 11 世纪时 Kāšgharī 书未著录有吐火罗名称者，或出偶然，或因遗漏。

〔33〕 案 Yaratmiṣ 不得训为"译"；所以我解作圣月从一印度原本"编"为吐火罗语本；惟 Yaratmiṣ 一字仍不失为可异。

〔34〕 第一种语言本谓其本曾由圣月 raritwu,谢额君译此字为"辑";谢额、谢额凌二君在 1918 年一论文中(《吐火罗语之一土名》,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1918 年刊五六一至五六五页)曾说回纥文明言圣月曾纂辑(yaratmïš)印度文本,从印度文(梵文)译成吐火罗文字。由是有翻 raritwu 字为"译"之"绝对必要",二君以为曾在第一种语言数种文件中获见此"胚孕的意义"之证明,可是此 yaratmïš字恰不训为"译",设若回纥译人确从第一种语言翻译而运用此字,即因其未见此 raritwu 字之"胚孕的意义也"。就事实说,谢额、谢额凌二君在第一种语言中所引之一切例证,我以为"编"字意义之适宜,与"译"字意义同也。关系之本盖为一种转为 ārśi 语之 kāvya;谓"编"亦可,谓"译"亦可。

〔35〕 亦可读如 idiiut。若缪莱说,附注谓 wohl = vidyut;然训为"闪电"之 didyut 在此处无意义也。无论译写为 idiiut 或 idvut,或者就是从梵文俗语一种写法 itivṛtta 所转出,亦即巴利(pâli)语之 itivattaka,与《翻译名义大集》(Mahāvgutpatti 日本刊本第一二七四号)之 itivṛttaka;汉语译名作伊帝目多伽,亦有还原作 itiyukta 同 ityuktaka 者(参者 Eitel 同织田得能二氏之字典),盖沿汉译名误"目"作"曰"之误(织田字典曾改正其误,然《翻译名义大集》日本刊本仍作伊帝曰多伽)。伊帝目多伽者,乃为性质颇难确定之"本事"。纪元 584 年译本《莲华面经》有一正确译写,作伊帝鼻利多剑(itivṛttakam),参看《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第五卷二九八页。

〔36〕 此突厥语之 Küsän 名称在 11 世纪既见著录,可以免我反驳 Fr. Weller 君在 1930 年《大亚细亚》第五卷三至四页所持之说;但我不免于言者,Rašidu-'d-Din 之写法,不能指出 k-或 g-两个发音分别之处,因为他的那些写本,对于此二字母不为分别。

〔37〕 对此后别有说。羽田君之回纥文残片,似为生经(jātaka)之类。回纥文有《玄奘传》的译本,von Gabain 女士已将散藏各处的残卷考订明白。案玄奘曾记录有关于国王金花(Suvarṇapuṣpa)同龙驹的一种灵异故事;可以令人想到羽田君之残片所译者是此故事之文。惟玄奘记此事于《西域记》中,《慈恩寺传》中无其文也。难道说译此传的回纥译人将《西域记》中若干段落加入传中欤?

〔38〕 Barčuq 得训为"有虎地"(*Barsčuq),盖在玛喇尔巴什境内确有虎也(参看 Bars-köl 同 Bar-köl 的写法)。Kāšgharī 书著录有Barčuq,视为 Afrāsiyāh

在Čaruq(突厥部落)境内营建之一地,用以拘禁所俘 Bokhtnassar 之子 Bezän 者也(Brockelmann《突厥字书》二四一页)。

〔39〕 或者就是吐火罗语中库车名称附带的形容词,而经译吐火罗语为突厥语的译人所保存者。

〔40〕 列维君曾语我或者可以将礼言《梵语杂名》中龟兹(库车)名称之俱支曩(Kučinań)的写法(Bagchi 本七七页,二九五页)与 Küsän 比对,此种写法好像在字根之尾含有一种鼻音。

〔41〕 信奉弥勒一事,在中亚同东亚颇见流行,而在"第二种语言"名曰"塞语",或"和阗语",或"东伊兰语"的语言中,有一大部偈言,亦题《弥勒下生经》。Leumann 在 1919 年曾为此本撰有专书,很博赡,可是也很混杂,而对于圣月的《弥勒下生经》竟无一语隐喻及之。至若缪莱、谢额、谢额凌诸君等,亦未见说到第二种语言中的《弥勒下生经》,虽然这些经本在第一种语言同第二种语言中好像并不一致,似乎应将第二种语言的《弥勒下生经》刊布翻译,使人可以鉴别圣月本之异同的程度。

〔42〕 我们所得的吐鲁番地方回纥题志甚少。但是既有两种题志说到从吐火罗语转为突厥语的译本,好像从吐火罗语转为突厥语的译本,构成回纥人《释藏》之一大部分。

〔43〕 车师读若 *Kiʷo-ṣi,殆由一种宿命,吾人在此处复陷于一种颇类 Kuči(Kuči)的名称,而其单数又为 Kuṣānu > Kuṣaṇa 属格多数所自出的情况之中。

〔44〕 前此已言羽田君所藏回纥文故事残片,其中即有一苦先(库车)国王 Suvarṇapuṣ[pa],其文得为此同一记文之译本也。

〔45〕 玄奘记中常名婆罗门祠曰天祠;然在此处毫无证其为婆罗门祠之意;要非佛寺也。我译此句,同儒连、哇特斯一样,然颇费踌躇,因为余文皆是四言一句,若从其例,将可译作"国东境之一城中,北天祠前",由是池在城内,与后文城中无井取彼池水等语相合。但是如此句断,北字应属下文。谓曰北天,未详所本;谓曰北祠,又无南祠相对。校勘最精的京都大学本以下皆作四字句读,而此八字中未加标点;如应点断,何致遗漏,所以我译作城北之天祠。

〔46〕 闻诸先志四字,有一未详年代刊本与一日本写本皆作闻之耆旧(在其他诸例中歧异并同),列维君(《亚细亚报》1913 年刊第二册三五四页)曾著此异文。其实不成问题。那本刊本同那本写本必定出于同本,而其文皆经

一切古本证其非是。其后述王弟割势明心故事时，玄奘亦云闻诸先志，上引刊本同写本异文亦同。关于龙池故事那一段的原文，不难考见；玄奘殁后数年，《西域记》此段曾被录入《法苑珠林》第六卷中，今本虽多讹误，然闻诸先志四字，尚见保存。此外在玄奘记中尚有闻诸耆旧，闻之耆旧，闻诸土俗，闻之土俗等例，盖判别其得之耳闻或得之书篇者也。——近代二字，儒连译作"此最后时中"；列维君（《亚细亚报》1913 年刊第二册三一九页）译作"最后国王"，并引《释迦方志》之近王二字为证。可是吕岱司君（二七页）以为《释迦方志》应录玄奘本文，不应有所附益；此甚显然，《释迦方志》盖节录记文；纵为近王，亦不得译作最后之王。列维君谓为最后之王者，盖以此金花王即是前王 Suvarṇapuṣpa，而玄奘经行时在位国王 Suvarṇadeva 之父也。吕岱司君虽明原文所言近代之王非最后之王，然对于儒连译文之"此最后时中"不无踌躇，盖其以金花王乃一很古的 Suvarṇapuṣpa 也。他于是采用 Waldschmidt 君提出的译文："末一朝代有一国王名曰金花。"别言之，玄奘时代在位王朝之前朝一国王，而此朝之灭亡得有数世纪也。不幸此种译法颇难采用。近字犹言不远，不能训为最后。至若近代乃近世之别称，盖因避太宗讳而改。

〔47〕 以至于今四字，《法苑珠林》讹作以至千金。此语足证潜隐者仅龙而已，非龙与国王也。

〔48〕 略无噍类，乃一成语，早见《前汉书》（卷一上）。《法苑珠林》引文同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八皆不误，惟可洪《音义》卷二六（东京缩印《大藏》本为字套第五册十九页）误噍作唯。

〔49〕 参看余说，见《通报》1926 年刊一九一至一九二页。

〔50〕 参看余说，见《亚洲艺术杂志》第五卷（1928 年）一五五至一五六页。

〔51〕 玄奘在归途中记曷劳落迦（Rauruka）城之埋没事，则言闻之土俗，后释释迦法尽，像入龙宫，则谓闻诸先记。

〔52〕 《津逮祕书》本十四卷四页；列维君（《亚细亚报》1913 年刊第二册三五五至三五六页）所本之文，盖出《图书集成·边裔典》，译文微误。

〔53〕 列维君在 1913 年曾将此名还原作 Atchour，而假定其得为一种突厥官号；可是"兒"字在宋以前不译 r－。阿主兒古读假拟对音是 *Ačuži，迁就亦可作 *Ačuñi。列维君在 1933 年论文中又还原作 *Acuni = Arjuna（乙种方言写作 Arcune）；似近真相，然在音声方面不甚完满。

〔54〕 徐松(1781至1848年)《新疆赋》(原刻本二十页)有句云"整隽乘于屈产",下引《释藏》音义,谓龟兹多产龙马并及《左传》"屈产之乘"。徐松所本者,是7世纪中间玄应之《一切经音义》,玄应曾将《左传》之文适用于龟兹,顾此文言纪元前数百年事,所指者应是别一地域。并且未经证明屈产必为一地名(钧案《康熙字典》云,屈,地名,晋公子夷吾所居,出良马,在今河东县。下引《左传》僖二年"屈产之乘"。顾赛芬(Couvreur)神甫《春秋》译本第一册二〇五页之译文,疑本此)。

〔55〕 苏伐勃驶即位时代未详,除非假拟其在位不久外,我们应考订其人是《隋书》同《北史》之苏尼咥或苏尼咂(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一五页;列维论文,《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四八页;字书著录咂字之音只有 ï'ǐět 音,《文献通考》卷三三六亦作苏尼咂;咥字有数音,一音与咂字音同;用咥字译写之例不少,如能将其一例还原,考证此名自易)。据上引史书之文,苏尼咥在大业(605至616年)中遣使贡方物;检《隋书》(卷四)同《册府元龟》(卷九七〇),龟兹仅在纪元615年遣使一次;由是观之,苏尼咥君临应在此年。我以为苏尼二字是 swarna = suvarṇa 大致的译写;可是咥字不能对 puṣpa 也。

〔56〕 可参考《比丘尼传》卷四(东京本致字套第十一册七六页)冯氏《比丘尼传》。高昌、龟兹之交际日见其繁,纪元630年玄奘经过龟兹(屈支,库车)时,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城东南一寺。此种交际之维持,盖因"库车语"流行所致,不待言也。

〔57〕 此阿奢理贰在1世纪半后,经悟空名曰阿遮哩贰,《西域记》注此名云,唐言奇特,可以令人想到梵文之 āścarya,列维君虽承认此还原名称,然以尾音不对为异,盖其误读"贰"字作 ni;他于是以其为库车语之一种适合的用法(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五八页,三六一页,三七二页)。案此二译名之古读可以还原作 *āsariži 或 *ačariži,疑由库车语一种含有 ñe 尾音的读法转变所致。

〔58〕 参看沙畹《宋云行纪笺注》,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三卷四二二页。

〔59〕 参看杨守敬《水经注》《要删补遗》一卷二至三页之辨证。杨说如不误,沙畹(《校刊》第三卷四三〇页)殆将道安《西域志》估价太轻矣。可是杨守敬认为不误之说,尚有重大难题未决。列维君(《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

册三四〇页)曾采录《酉阳杂俎》(《津逮祕书》本十卷九页)拘夷城北山中石驼故事,而谓不知《酉阳杂俎》何所本。其实故事之文后数语有脱误(列维君未译),而《酉阳杂俎》在其后曾云采此文于《论衡》。此《论衡》未详为何本。当然不是1世纪时之《论衡》,纪元661至664年之《集古今佛道论衡》,有时省称《论衡》(南条《目录》第一四七一号),然不能期待此书采录此文,且在事实上并无此文。虽然,吾人已知此未详何本的《论衡》所本之源。盖《太平御览》(卷七九七)引文中引有此文,乃采之于释道安《西域志》者,特微有无关系之异文而已(其文似由《御览》径录之于6世纪之某类书者;唐代《艺文类聚》卷七六之引文亦然;其文传钞,不无舛误,例如《太平御览》卷七九七所引"鼠王"故事,谓出释道安《西域志》,然在卷九一一转录同一故事,则谓出《西域诸国志》)。然检《水经注》之两条引文(二卷十页;参看沙畹研究,见《通报》1905年刊五六四页注二;又《水经注》同卷十三页;参看列维论文,见《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四七页),《释氏西域记》所录库车名称作屈茨,而非拘夷。似不能谓《水经注》完全变更《释氏西域记》之写法,而易以别一不大流行之名称。又一方面不能假拟道安有时写作屈茨,有时写作拘夷。若认道安原文,拘夷所指者非库车,而为印度之拘尸那揭罗(Kusinagara)城,是亦《释藏》常见之译例;惟是此石驼便水与库车北山中所产之矾性质相合,不能位置拘夷于他处也。由是观之,虽有杨守敬之重要的辨证,其对于《释氏西域记》原撰人所持之说不能视为成立。可是《太平御览》所录关于石驼之文,误以属道安《西域志》亦有可能。盖其文并见5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刘敬叔所撰十卷本《异苑》(《津逮祕书本》二卷四页;国名苟夷,附有拘夷异文),而其文实际相同也。假如原被采录之本是《异苑》,而非道安《西域志》,我对于道安《西域志》即《释氏西域志》之考订,不致有相类之踌躇矣。

〔60〕 参看余说,见《通报》1912年刊三九二页同四二二页,此说业经列维君赞同,参看《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三五页。老实说,现在我以为鸠摩罗什那些传记,有一部分出于虚构,拟在一专文中说明之,可是其中亦有实在事迹,惟须鉴别而已。总之,雀梨寺名,在5世纪上半叶颇见流行,于是有人将其加入此类传记之中。

〔61〕 此《西域志》不得为道安本,疑出彦悰(殁于610年)本,而其所采者得为《宋云行纪》或宋云同时人之行纪。

〔62〕 沙畹《民话五百篇》第二册一至二页。沙畹所记纪元410年的译

年乃是405年之误;可参考 Bagchi《中国释藏考》一九三页。

〔63〕 列维君(《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三六页)谓富楼沙有一雀离"寺",纯出臆揣,非原文也。

〔64〕 《北齐书》卷十三;《北史》卷五一。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业已引证及此;并参考罗振玉《面城精舍杂文乙编》二六叶。

〔65〕 参看斯坦因《古和阗》五四四页沙畹注。"城有三重",如何布置,吾人不知;或者外有大城包有附郭,大城内有内城,内城内又有小城,此小城得为王宫。穆杂尔持河西有未详何代之三重城一所,可参考斯坦因《亚洲腹地》八一一页。

〔66〕 然尚有一说可以位置此龙驹城于距离都城更远之地。《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附载贾耽通四夷道(8世纪末年,焉耆(哈喇沙尔)安西都护府(库车)之间有龙泉守捉,东距安西都护府三百一十里。龙泉之名在中国固常适用,然亦可假拟为玄奘所记龙驹城中之大龙池。如采此说,只须将《西域记》文删改,谓二照怙釐在都城北四十余里,而不在荒城北四十余里。

〔67〕 这些古读足以屏除毕尔之 sūla,哇特斯之 chūri 与侏离;后一名称在《后汉书》中作为南蛮语,而在此处不成问题。哇特斯后(第一册二〇七页)忘其六二页之 chūri,谓侏离确为外国语名,犹言"杂",然未言出处;其实其说不适用于雀离,而适用于《后汉书》之侏离。

〔68〕 徐松《西域水道记》二卷十四页著录之昭怙釐,而经哇特斯(第一册六二页)尚认为此名之别写者,只能为《元藏》本与《明藏》本之一种讹写;《释迦方志》的一切版本引《西域记》文虽皆作"昭",京都校勘本竟不屑于引证;此字古读实与"照"同。

〔69〕 参看余说,《通报》1923年刊一二六至一二七页。Fr. Weller 君在一篇题作 Kuči-Kuci-Kūsān 之论文中(《大亚细亚》第五卷五一九至五二三页),曾讨论我对于库车汉文古译名还原诸说。其见解可驳之处甚多,而且他将我说加以曲解。关于库车古名之土语写法,我曾提出两种假说:(一)唐以前汉文译名"暗示"一种用 c(=ts)的土语发音,而不用梵语 Kuci(c=č)中之č发音。(二)对于此名之唇音韵母,我曾说所关系者"或者"是 ü。此君以为我的还原不能视为确定,而亦不能必有-ü-音。我的假说当然需要确证;否则我必不加"或者"之辞,认定"库车语"中有 ü 存在之前,必须详加审查;我仅指示可以令人思及之理由,然此理由非确断的理由也。关于-c-(=-ts-)之与梵文-c-

(=-č-)之对峙,Weller君以为我们习惯解说梵语之颚音如同实在颚音,是错误的,至少千年以来,尤其是在北印度,读作舌面破裂摩擦音,别言之,我们用罗马字译写梵文的c,ch,j,在印度不读若č,$č^c$,ǰ,而读若c(=ts),c^c(=ts^c),j(=dz);并引证西藏语一切梵文习见之例。由是他的结论以为汉文译名中之c(=ts)还原为*Kuci或*Küci者,与梵文Kuci(表面等若Kuči,然实在用c=ts读若Kuci)可以相合。我不相信。纪元千年左右北印度之发音,不能必其为更古五百年前的发音。西藏译名用舌面破裂摩擦音时代,在中国译名中亦有反映:例如10世纪末年继业《行纪》译Jālandhara作左烂陀罗是已(《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二卷二五七页)。然在以前,迄于唐代,中国人所闻之梵语颚音实是颚音,所以写作颚音。当其译写库车梵名之时,所以用假拟有一种颚音或舌叶破裂摩擦音的译字,而不用译写土名具有舌面破裂摩擦音的译字。即因此种区别暗示一种土语读法之*Kuci或*Küci(c=ts)。假说容或有误,可是纪元千年左右梵语颚音用舌面破裂摩擦音之例,不足打消此说也。尚应言者,一种*Küci(c=ts)的读法,足以便利梵文Kuci突厥文Küsän之互用,尤使人易解慈恩寺传之笃进(=*Toqcin)抵于近代突厥语名托克逊(Toqsun,地在吐鲁番西南)之理。

〔70〕 参看《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同沙畹译文,见《通报》1906年刊二五四页,二六八页;并参看《通报》1907年刊二〇九页,同《后汉书》卷六。

〔71〕 草此文毕,始知俞浩《西域考古录》(十二卷六页)在1847年已将龟兹城北雀离寺与127年的罽离关两名比附。俞浩以为关名出于寺名,由是证明127年时焉耆信奉佛教;我以为此种推论并不坚实。俞浩据《释氏西域记》,谓龟兹南山有寺名雀离;其实《释氏西域记》之文不能作是解也。

〔72〕 817年撰《一切经音义》的慧琳,是疏勒(喀什噶尔)人,曾两言(卷十同卷八二;东京缩藏本为字套第八册四二页;第九册四六页)屈支或名月氏,或名乌孙。这些名称当然不是库车的真名。然而我们要知道乌孙在纪元前统治之地,西抵龟兹境内,或有一时以此地为中心。至若月氏而未经慧琳引证及于于阗(和阗)者,核以中国旧例,在此处所指者,应是曾与古大月氏混而为一之吐火罗或贵霜,慧琳在当时即为尚操一种与吐火罗语关系密切的语言之国提及斯名,此诚堪注意者也。

〔73〕 东京《缩藏本》闰字套第十五册六八页;参看沙畹、列维之研究,见《亚细亚报》1895年刊第二册三六三至三六四页;列维之研究,见《亚细亚报》

1913年刊第二册三七一至三七二页。

〔74〕 沙畹、列维曾为东京《缩藏本》标点所误，而以“城”字属上文。此莲华寺位置应在玄奘时建五年大会处(《西域记》卷一屈支条)。

〔75〕 前践寺名，迁就说也可说是汉语名称，然不如谓为一土名之译名，但其义不明耳。Herrmann君(Sven Hedin《南西藏》第八册四二六同四三九页)曾谓悟空记录之前践“洞”，“显然”就是赫色勒(Qïzïl)诸洞；可是悟空所言者为“寺”而非“洞”。此山寺或者可能适应赫色勒诸遗迹，然而我们迄今毫无所知，况且尚有其他考订可以提出。

〔76〕 耶婆瑟鸡通常对音假拟是*Yavaṣkē；但列维君(《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二〇页，三七二页)在库车出土之一“库车语”木简中，见有Yurpāṣke寺名，识其即是耶婆瑟鸡寺，可以说所见甚是。列维君解说汉译名用ya-，而不用yu-之理，盖因库车语之u有变化之趋势。如此看来，此时代汉译名中，有时可见的辱音声母后-a-与-u-两用之例，与此又有别也。又一方面，-r-发音可以甚微，而在库车语之译写中容或有清浊不正的译法，此在同一时代译写其他语言之汉译名中所仅见者也；则其所本者得为库车语声母本声之发音。此汉译名有其他著录作保障。列维君曾引《宋高僧传》谓纪元713至741年间耶婆瑟鸡山名曾被用作本于外国之一羯鼓曲名，考《羯鼓录》(《守山阁丛书》本十一页)所列诸宫曲名，确有耶婆色鸡曲。列维君在三五〇至三五一页所言龟兹乐曲，我欲言之事不少，现在无暇言之，惟乘此机会声明：(一)我现在赞成善善与鄯善(罗布地方)之比附，前此与沙畹所为之意译，误也(《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一册一五〇页)；善善写法并见慧琳《音义》(为字套第十册四六页)；(二)既在《通志》所列举的龟兹乐曲名中见有疏勒(喀什噶尔)善善国名，好像同一名录中来历不明的婆伽儿(对音应作*Bagaži，而非列维君假拟之*Bagar)舞，就是本于玄奘《西域记》位在和阗以西的勃伽夷(*Burgayi据斯坦因《古和阗》一一七页考订是今之Piālma)，也是-a-与-u-互用，而-r-之变化，与耶婆瑟鸡译名同(虽然在库车语范围外)。

〔77〕 我们已知caturdisa译作拓斗提舍，cakra译作拓迦罹。在伊兰范围中，窣利语战士名称čakar，有时译作柘羯，有时译作拓羯；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三六六页，以及《佩文韵府》与《补编》(我曾辑有关于降附中国的若干拓羯之文，我以为其名尚延存于蒙古语名Čakar〔Caqar〕中)。384年时，此柘字曾用于《南条目录》第一三五二号经之译本(东京《缩藏本》第七册一一〇页)，译写

柘梨山名，而此译名业经《翻梵语》证明不误（大正《大藏》本第五四册一〇四三页）。顾此柘梨就是印度原文中之 Cāliyā 或 Cālikā（参看 Kern《佛教史》第一册一七〇页，一七八页；惟关于佛留居之时代，南条本第一三五二号经与 Kern 所本之源未能一致），而《翻梵语》释其义曰动，是为 cala 之习见的译义。由是观之，384 年的译人同《翻梵语》的撰者从柘而不从拓。

〔78〕 Herrmann 君（Sven Hedin《南西藏》第八册四四九页）曾写作拓厥，而读拓为托，并谓悟空位此寺于龟兹东北。可是音读既误，而悟空原文同沙畹、列维译文中并未指明此种方位也。

〔79〕 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尚以拨换或姑墨当他地，其后不久改从今说。

〔80〕 沙畹译文使人想象自安西至白马渡之距离未曾著录，而此一百八十里之计算始于白马渡；其实原文不能作如是解释，一百八十里盖为自安西至俱毗罗碛之距离。碛有沙碛，有石碛，沙畹译作石碛，未免过于确定。

〔81〕 关于此名，可参看 Sven Hedin《南西藏》第八册四三〇页 Herrmann 说。

〔82〕 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一七页引阿史那社尔传。贾耽通道里数之不足，所以中国考据家在阿克苏之东寻求姑墨或拨换。

〔83〕 《新唐书》有一段亦作"六百余里"（参看《西突厥史料》一二〇页），然为转录《西域记》之文，未能作为旁证也。俞浩《西域考古录》（十二卷一页，又十三卷五页）引通典同《太平寰宇记》，谓安西（库车）、拨换（阿克苏）两城相距有五百六十里；可是我在此二书中不见此文。

〔84〕 据 1870 年木刻本最近重刻本其文并同。

〔85〕 此书卷帙甚巨，凡一百十六卷，始在 1911 年刻于迪化，原刻本颇罕觏；1923 年东方学会重印本略有增订（印刷错误甚多）。其中考古部分，乃出著名考据家王树枏手。所谓本于《舆地广记》之文，在三卷一页同十页凡两见。

〔86〕 我用的是《士礼居丛书》覆宋本；并有 1880 年刊行的金陵书局本，惟此本所本者是《士礼居丛书》本。此外我并检查过微有异同的武英殿本，皆无此文。

〔87〕 《西域考古录》、《汉西域图考》、《新疆图志》并作拓厥（似读拓作托），在所引贾耽之文中亦然。俞浩且谓其为拓开突厥之省称，此说当然妄谬。

〔88〕 《汉西域图考》同《新疆图志》"聚"作"处"。

〔89〕《汉西域图考》同《新疆图志》下多一"数"字。

〔90〕《汉西域图考》同《新疆图志》"颠"作"巅",其下仅余魂摇二字。

〔91〕同一记录并见《通典》卷一七四安西府条,其名正作鹰娑川。然俞浩(十二卷一页)引此文谓出《通典》(并杂有《通典》所无之文),又改鹰娑川为沙雁州。

〔92〕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一八九页。李光廷即在此纪元 708 年战役下引所谓《舆地广记》之文,于引文前曰,所以唐常以重兵戍拓厥关也。此语盖从所引伪文铁骑五千戍之一语推测而来,不可在此处寻求关于拓厥关之新文也。此文全经《新疆图志》转录,一字不易,然则何以知之,缘其留有出于无心之证据也。《汉西域图考》述 708 年之役,名字脱误,不一而足,如误牛师奖为牛元奖之类,《新疆图志》沿误亦同。

〔93〕《新疆图志》传记门颇简略,俞浩传(九十卷十二页)仅两行,批评严苛;然李光廷传,仅微拾其误,而对于其书颇推重(九十卷十至十一页),殊为不值。

〔94〕缪莱《吐鲁番发现之二石柱刻文》(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语言历史门,1915 年刊第三号)七至八页。

〔95〕此回纥文件全文皆受汉文之影响,其中之 $bughdai_1$ 回纥语犹言小麦,盖为汉文麦字译文,而汉文麦字可作小麦解,亦可作大麦解也。然可确定者,回纥译人必有误解,因为原本所指者是大麦谷粒(yava)。参看我的论文《玄奘西域记之三言词》,见纪念 R. Linossier 女士刊行之《东方学杂纂》(1932 年),尤应参看四二五页。

〔96〕缪莱将 qaz üyüri 按字译作"鹅粒",而释为"荏"(Perilla ocimoides)(参看十四页附注)。惟(十四至十五页)其所引汉本之文作如芥子大,而突厥文译本《金光明经》(Suvarṇaprabhāsa, Radlov & Malov 刊本四七六页十二行)中确有此 qaz-üyüri 字,乃从汉译本芥子名称译出。此处应采同一译名。案芥子梵名 sarṣapa,在度量中合七芥子为一宿麦(参看《西域记》译本第一册六〇页)。

〔97〕缪莱(八页同三七页)读作 yikän 而不解其义,可是回纥文不辨别 yikän 与 yignä。顾考十四至十五页所引汉本之文,言有窣堵波大如菴罗果(āmraka, mangue 或 āmalaka, myrobolan?),而其尖顶大如针。固未见有含有针义之 yignä 写法;然现识之诸写法,有自 ignä 转 yingnä 者,其为针之对称,似无可疑。

说吐火罗语

见《通报》1936年刊二五九至二八四页

伯希和撰

吐火罗语(tokharien)问题是一种必须深知中亚历史始能答解的问题,可也是一种最难答解的问题,因为就现在我们的知识程度说,有些答解互相抵触,好像任何答解皆可包括在内。要使问题明了,只能作陆续接近的研究,各人利用前人研究的成绩,整理自己的主张,而为一种暂时学说,然而仍旧未能掩盖其弱点。

我在《亚细亚报》1934年1月至3月刊二三至一〇六页一篇题作《吐火罗语与库车语》的论文中,就是作的这种尝试。我在此文末尾曾说:"总之,我以为有两点我是脚踏实地的:那些回纥题识中的吐火罗(tokhrï)语,应是玄奘在吐火罗地方(Tokharestan)所识的晚代吐火罗语,而同一题识中的苦先(Küsän)语,就是龟兹(Kučā即库车)语。"现在贝烈(H.W.Bailey)君对于同一问题曾在《东方研究学校校刊》第八卷八八三至九一七页中,发表一篇题为Ttaugara的论文,与我上述的两种结论相合;他也主张必须就7世纪至9世纪时代间研究此项问题,不可引证纪元初年的希腊语或拉丁语文件。他的研究颇多新颖而重要的见解;可是有若干例,我似乎不能不提出异议。

我固然明说回纥题识中的吐火罗语,即是7世纪吐火罗地方的语言文字,然而我乃是继F.W.K.Müller、Sieg和Siegling等之后,

假定此吐火罗语即是 Leumann 氏之“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langue I, dialecte A)”。我曾自问玄奘所记睹货逻(吐火罗)的文字,是否能与此种考订相符,我曾说过或者无有不能排除的困难。我们不应忘者,二十几年来诸语言学家所言的吐火罗语,就是第一种语言中之甲种方言(有时包括乙种方言 dialecte B)。贝烈君以为我的退让颇可惋惜。他的意见以为吐火罗文字就是大夏(Bactriane)所用的古希腊文字;而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乃是哈喇沙尔(Qarašahr)的土语,与吐火罗语毫无关系。或者他有理由。但是他未将此理阐明。他的考证有一种强有力的根据:玄奘曾说吐火罗字源二十五言;顾考希腊文有二十四字母,而在大夏又加了一个代表 š 的符号。相传呔哒(Hephthalites)人的货币,尚用此种文字。最后 von Le Coq 从吐鲁番携回的一篇残卷,据说其中文字是一种现在无人认识的古代闪种(sémitique)文字,但是 Junker 君说是希腊文字。如此看来,大夏的希腊字母曾为一种语言的媒介,而此语言似乎就是回纥题识中的吐火罗语。所可异者,我们在吐鲁番发现不少第一种语言之甲乙两种方言的写本,仅此残卷用希腊字母,而此希腊字母就是题识所云吐鲁番最初回纥译人所用的字母。难道说此字母就是当时所用的唯一印度欧罗巴语言的字母么?尤可异者,吐鲁番的回纥人用辽远的吐火罗地方语言来翻译《弥勒下生经》(Maitreyasamiti),而将他们四围所用的第一种语言甲种方言废置不用。贝烈君别的论证无大价值,例如他以为龟兹同阿耆尼(Agni 即哈喇沙尔)既然久为两个独立国家,不能共有一种语言;要知道日耳曼人的瑞士,同日耳曼分离了有好几百年,并未因此不用日耳曼语。则未经审查所谓“希腊文字”吐鲁番残卷以前,不应遽作定谳;审查以后,始能说所写者为何种语言,而此种语言是否在

回纥人所译吐火罗语中留有痕迹。

贝烈君研究吐火罗人同吐火罗语名称的沿革，曾引证 Ttaugara 一字，并以此字为论文标题，诚有理由，盖此字曾见 F. W. Thomas 和 Sten Konow 二君所刊布的一种敦煌塞语(saka)文件著录。将此文件与斯坦因(Stein)的一种写本比对，好像此 Ttaugara 不在吐火罗本地，如 Clauson 君前考之说，而在甘肃，由是与希腊文的 Thaghouroi 同 Thaghouronōros，以及 Maes Titianus 行程中的 Thoghara 城等名称有相连之关系。案 Thoghara 城有时被考订是甘州，可是 Ttaugara 同甘州(Kaṃmicū，等)在塞语文件中并见著录，未曾相混。对于吐火罗名称沿革之一切研究，必须注意此种成分，设若贝烈君之考证可以证实，其事诚然重要，因为可以证明等若吐火罗的 Ttaugara 名称晚在 9 世纪时，尚存在于甘肃也[1]。

贝烈君在八八七至八九〇页研究吐火罗名称流传至今的种种写法。讨论此名称以前，我应对于贝烈君偶然引证的别一名称作一种简单的讨论，这个名称就是 Dhrw"n 名称，而经他还原为 Thruwan 或 Dhruwon 者，以此名与希腊语之 Throana 共比附，并注释云："伯希和在《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三一页译写的 darwan 当然不能承认。"其实我从来未作此种还原。在他所指那一段中，我仅将列维(S. Lévi)之论证转录。列维以敦煌等如 Drw"n，又等如 Throana；我引证其说者，盖别有目的，我并在当时特别声明暂不讨论此敦煌问题。然而我现在甚愿在此处讨论。贝烈君在八九三页说。"此 Throana 城名，窣利语(Sogdien)写作 Dhrw'n Dhrw"n，表面皆有一种摩擦音(Throana 之 th 同窣利语之 dh 皆不能有 t 或 t^c 的读法：中国语名作敦煌与屯皇)。"

我们读敦煌之敦为墩者，因为现在本地同北京官话皆作如是

读;可是古音读敦作屯;如此看来,华语读法并不将 t 与 d^c 互用,而我们在原则上应该期待其他译名有一浊音发声。虽然有希腊语的 Throana,乃贝烈君仍主张窣利语之 dhrw"n 有还原作 thruwān 或 dhruwān 之可能。然而此种发声诚必须要摩擦音么?我不相信。这件问题不是窣利语或希腊语所能解决的。窣利语曾用 dh - 发声译写土语之 d-。至若希腊语,好像 Maes Titianus 的人员不能用本地语言同土人直接讲话,必须用译人居间。斯坦因发现的窣利语文字既然证明当时作中亚大媒介的是窣利人,好像中国西部之希腊语名称,在当时已夹杂有窣利语读音在内。Throana 之情形得如此,Thaghouroi 同 Thoghara 之情形也是一样,塞语既作 Ttaugara,而吐火罗本名在任何译写中,就是希腊语的译写,皆未表示有一摩擦音在内。至若窣利语的译名,假拟有一类流音发声如 dhruwān (? = Druvān)者是;汉名勿宁还原作 Durvān。总之,我们未能确知甘肃西部在当时究用何种语言以前,任作何种选择皆是劳而无功的。

关于吐火罗名称的材料较夥,然贝烈君在此处所注音读有误。我曾将各种写法正确胪列;可是他将吐呼罗同吐豁罗之读音皆写作 t^cuokhuâlâ。其实应将前一名写作 T^cuo-khuo-lâ,后一名写作 T^cuo-khuât-lâ。当贝烈君讨论第二字的音读时,就可见其错误之重要了。所有汉文译名对于此第二字所用的字(除开梵文的 Tukhāra 外)皆假拟有一清音声母[2],接着有一唇音韵母或半韵母。据贝烈君说:"汉语写法用 khuâ 而有唇音u者,未见他书著录;西利亚语作 tḥwrstn,见后。"后页果然说,西利亚文 tḥwrstn 名称中 w 之地位,或者"本于窣利语晚代文件中用 w 字母之倾向。窣利语之 dh-wkht-,dhghwt-乃 dhukht 或 dhughd 之转变,中世纪波斯语作 dukht,此言女";并附注云,我在论文四八页注一对于西利亚语的写法是

“不能承认的”。我在此处也是维持前说。贝烈君所引证字母易位诸例很有关系，我并承认他（八九四页）用 induk-t 解说窣利语之 yntkwt 等字母易位之例，发前人所未发。可是他说的西利亚语之“倾向”究竟作何解释？他是说西利亚语纯粹模仿窣利语的写法吗？就西利亚语言，其事有可能，然与汉文译名毫无关系，因为汉文译名是译音，而不是写字。我们既在纪元 500 年左右见有汉文译名吐火罗，其第二译字中应含有一个唇音韵母；窣利语与西利亚语同汉语译名皆录有此音，我不知“不能承认”之理何在。

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既不成为“吐火罗语”，应该给他再定一个名称。Sieg 君假定的 ārśi 语不能成立；贝烈君以为此字从梵文雅语之 ārya，转为梵文俗语之 ārsa，终在第一种语言中变成此种写法，此说甚是。贝烈君以为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特为流行哈喇沙尔一带之语言，于是主张即以此地的地名为语言名。而他不承认列维已经建议的“哈喇沙尔语”，因为此突厥波斯名称太近代了，乃采用阿耆尼（Agni）名称，所以在他全篇论文之中，概称第一种语言之甲种方言曰阿耆尼语（Agnean）。

此种语言纵然是哈喇沙尔的古语，这个“阿耆尼语”的名称并不能使我满意。我们不知道哈喇沙尔古名之真正本地语言写法。Kāšgharī 在 1076 年编的《突厥辞典》胪列的名称尚富，当时库车、吐鲁番两城之间仅著录有一不重要的地方不古尔（Bugur），并无指示哈喇沙尔的名称；或者其地（同古国）在当时已经很荒废了。中世纪末年，此地突厥语的名称是Čalīš，降至近代始以哈喇沙尔代之。但有一事是确定无疑的：阿耆尼不是一种土名，而是一种梵化名称，业经若干梵文文件、一种塞语文件同玄奘记传所证明。阿克苏（Aqsu）梵名是跋禄迦（Bharuka），罗布（Lop）梵名是纳缚波（Nava-

pa),难道说此两地的语言应该名曰跋禄迦语同纳缚波语么?

至若土名,贝烈君根据吕岱司(Lüders)君之说,在八九八页胪举各种汉译名称,首列乌耆一名,谓其原文是 Okñi,而此字为 ok 转出之形容词[3]龟兹语相对之字为 auk,此言蛇,与哈喇沙尔国王的"龙"姓不无关系(八九九页,九一六页)。这些推想全要放弃,因为乌耆名称从未存在。可是负担此种错误的是若干中国版本,而不是贝烈君。现在问题应该这样提出。

中国史籍著录之国大致可当现在哈喇沙尔一带者,汉以来即名焉耆。可是玄奘在七世纪时,写此国名作阿耆尼,Stanislas Julien 早已想到此是 Agni 之对音;吕岱司君首先在若干文件中发现的,就是这个梵化名称 Agni[4]。从前哇特斯(Watters)曾谓焉耆是突厥语 yanghi(应作 yanghïn)之对音,谓此字犹言"火",与梵文 Agni 之训义恰合;可是 yanghïn 乃是近代斡思满语(Osmanli)的写法,犹言"火灾",而哇特斯的"突厥"说,自从我们认识纪元初数百年塔里木河北语言具有印度欧罗巴语言性质以来,主要论点已被推翻了,况且他已将从前所主张的阿克苏古名,用 Qum = Bālukā 来比附一说,自行放弃欤(参看《通报》1923 年刊一二八页)。吕岱司君当然不采其说,而承认焉耆应与阿耆尼有相连之关系;审查其他译名以后,他的结论(三二页)说:"阿耆尼国似在任何时代有一印度名称。"说到这里,我的见解与他不同。

吕岱司君所列举哈喇沙尔古名之其他译名有亿尼,有乌耆,有鸟夷。

亿尼名称在 566 年翻译之《月藏经》列举诸国名录中凡三见[5]。列维在 1905 年曾研究过此类名录,对于此名未加考订,可是吕岱司君根据列举的次序,以为此名就是焉耆或阿耆尼之同名

异译，此说我完全赞同；在此佛经中用一个梵化的译名亦无足异。

中国史书从《汉书》起，皆写此国名作焉耆，独有《释藏》经文常作乌耆。除开哇特斯（《玄奘行传》第一册四六页）同沙畹（《通报》1905年刊五六五页）所引之乌耆外，《玄奘法师传》附注说阿耆尼旧曰乌耆（乌亦作邬），而同一注释并见《西域记》阿耆尼国名下（参看日本京都大学校勘本附注之异文）。如此看来，好像有两种不同的译名，一曰焉耆，一曰乌耆。我从前经过犹豫之后，亦采哇特斯之说（《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五卷四三七页）[6]。现在我的见解有异，然在说明以前，我想讨论《法显传》所著录与乌耆名称寓有关系之乌夷或伲夷[7]。

首先考订法显之乌夷为焉耆（哈喇沙尔）者是哇特斯；Legge（《法显行传》十四页）从哇特斯说，而沙畹（上引《通报》五六四页）亦主张是哈喇沙尔。列维在《亚细亚报》1913年刊第二册三四一页以为若将乌夷考订在龟兹（库车），法显行程似易了解，职是之故，吕岱司君（三一页）犹豫不决。盖在当时列维未见《释氏西域记》有一段说塔里木河流经屈茨（库车）、伲夷、禅善等国注入牢兰海（罗布淖尔）；可并参看《水经注》所引此记之文，与沙畹在《通报》1905年刊五六四页转录之文。伲夷、屈茨既然并列，则不能说伲夷即是库车，而焉耆国即在库车、禅善二国之间也。如此看来，我以为伲夷应对焉耆，毫无疑义。

哇特斯（《中国杂志》第八卷一一五页）曾说伲字不见于任何字书。在表面看来，此说不一定全对。此字首见《水经注》引《法显传》著录（参看《通报》1905年刊五六四页），而前引《释氏西域记》之文，在《水经注》引文中似亦作伲；可是以后此将说明此两段中之伲字盖为校勘的结果。最可注意者，历来注释音义的人，从来未将

此世人未识之字注释出来。列维曾说慧琳所注《法显传》的音义(为字套第十册一〇三页)只有焉夷,并无乌夷或伪夷;可以音义证之,上一字"谒乾反,前《西域记》已说"。如此看来,慧琳在纪元817年所见之《法显传》实作焉夷;在940年可洪所注《法显传》音义亦同(为字套第五册三一页):"偈夷[8]。上于建反。正作僞。亦作鄢。"又云:"僞夷。上于建反,亦作僞[9]。鄢,又于憓反。偈[10]疑为偃之误。川音[11]作鸱,音坞;应误,或作鴟。"

如前所引,可洪著录之名虽异,然亦承认《法显传》中只有僞夷;虽见有作鸱夷者,然指正其误。

慧琳注《法显传》音义时,曾说"前《西域记》已说"。今检所注《西域记》文(为字套第十册四六页),果有下说:

"阿耆尼国,两碛之西第一国也。耆音只。古曰婴夷[12],或曰乌夷,或曰乌耆……"[13]

此注之特点即时可见。不但不见焉耆之正式的同习用的名称,而且不见慧琳在《法显传》音注中所言别见于《西域记》音注中之焉夷。总之,任何载籍皆未将乌耆同焉耆两名并列。这种遗漏似乎太奇。我以为只有一种答解,就是说乌耆名称从未存在,乌夷亦然,而一切释藏经文著录此类名称者,好像是有人故意改窜;而一切古籍或作焉耆,或作焉夷也。

《法显传》乌夷之例比较明了。除开可洪指摘前人鸱夷之误外,慧琳在纪元817年,可洪在940年,只知有一焉夷。况且在此二《音义》所录之异文中,尚不知有《宋藏》、《明藏》诸本之伪夷,亦不知有《高丽藏》之乌夷。其实伪夷仅两见于《水经注》,一见所引之《法显传》,一见所引之《释氏西域记》。沙畹所见《水经注》本,是1754年赵一清校释本,盖为曾经校勘之文。《水经注》所引《法显

传》,写其名作乌帝,与《明藏》同;明末有一校勘家曾言法显原文作伪夷,于是赵一清据以校改(参看王先谦本二卷七页)。这种校改,对于《水经注》原文当然没有价值,而对于《法显传》原文亦然,因为他所采的《法显传》,是寻常流通的《明藏》本;我们承认乌帝是乌夷之误,然而不能说6世纪初年郦道元撰的《水经注》,就是这样的写法。至若《释氏西域记》引文中之伪夷,盖为赵一清根据《明藏》本校改之结果;可是一切旧本《水经注》皆作乌夷(参看王先谦本二卷十页)。但是唐人所见的《法显传》既写作焉夷,我们并应承认《水经注》引的《法显传》同《释氏西域记》原文是焉夷,唐以后的校勘家受了唐末乌夷讹写的影响,遂将原文改成乌夷。

《法显传》原文必是焉夷,而非乌夷,可以《宋藏》、《明藏》诸本中之伪夷作间接之证明。伪字不见字书,任何音义皆未注释其音,玄应、慧琳、可洪诸编皆然[14]。纪元997年行均之《龙龛手镜》亦未收有此字。若说是法显特创此字,或者古写本采用此字,似乎不类真相。然有僞字存焉,这就是可洪所见之字;则伪夷为僞夷之误,乌夷为焉夷之误,乌耆为焉耆之误,似无可疑。

难者曰,乌夷、乌耆并皆存在,因为慧琳已在所注《西域记》音义中著录。我的见解却与此说相反,慧琳所注音义并且供给乌夷、乌耆并未存在之最坚强的论证。慧琳注《法显传》音义,只知有焉夷,并且有"反切"作保证;且言已详前注《西域记》音义,则在所注《西域记》音义中应该重见焉夷之名。孰知只见乌夷,不见焉夷,而且慧琳同任何注音义者皆未注此乌字之音。此事很简单:盖在若干著录焉夷或焉耆之写本中,有人误焉作乌。我们前已说过此种讹误在10世纪初年发生,无论如何,要在纪元940年以前发生。北宋时代有些"博识的"校勘家,认此讹写是正写,于是乎在慧琳音

义同其他各本中一概校改了。幸而慧琳同可洪的音义受反切之保障;即因此种偶然,遂使此焉夷古名不至于埋没。

焉、乌两字容易相混,纵在寻常文字中亦然,其例不难引举。兹就《释藏》中举其一例以证之。3世纪之译经有名《义足经》(南条目录第六七四号)者,《高丽藏》本正写作"尼焉",此乃Nirgrantha名称之一种梵文俗语写法,而宋、元、明、藏诸本皆误作"尼乌"(东京缩印本宿字套第五册六一页)。其实六朝、唐、宋时代的书法皆易使此二字相混[15]。所以寻常流通的《释藏》本在《西域记》阿耆尼条下注云:"旧曰乌耆",其字确作乌;可是刊行京都大学校勘本的考据家,遵从善本而在此处采用的字,模糊不明,可以读作焉,也可以读作乌。

焉耆名称焉乌之混用,尚可用最近一例证之。我在敦煌携归有一部慧超行记钞本。慧超在纪元725年经行西域;此钞本疑为9世纪本,而哈喇沙尔之古名两见卷末数行。我在敦煌钞写时,曾写其名为焉耆,后来罗振玉君、藤田丰八君校注之本,以及高楠顺次郎君在1915年《大日本佛教全书》中之《游方传丛书》第一册(六十页)刊布之本,并写其名作焉耆。可是高楠君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一册九七九页重印的慧超行记中两名皆作乌耆,而无说明。此名在《燉煌遗书》(羽田亨、伯希和合编本)中第一字实写作乌。若据邢澍《金石文字辨异》(《聚学轩丛书》本二卷十七页,又四卷十一页),或《碑别字》(一卷十六页又二卷五页)或《碑别字补》(二卷三页)考之,足见焉字易误作乌,我以为慧超行记中之国名应作焉耆。如前所述,《释藏》不少经文自10世纪以来将焉耆原名讹为乌耆之理,不难索其解也[16]。

新疆尚有别一古国名,似亦有相类讹写情形,讹误发生甚古,

然其力量不及前误[17]。《前汉书》(卷九六上)著录新疆西南有一国,名称乌秅。颜师古在7世纪上半叶注云:"郑氏曰:乌秅音颙拏[18]。师古曰:乌音一加反[19];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声如鹗拏耳,非正音也。"师古所引郑氏是原注汉书之人,其本已佚;其人乃4世纪时人[20]。我们所考古音读,只能上溯至6世纪,固不能严格适用于此时代,可是乌鹗二字从来未作同一音读;反之,颙字之音与焉字之音却很相近。如此看来,我以为郑注原本似作焉秅,而非乌秅。此名讹误恐不止此一字。《前汉书》写此国名作乌秅,而《后汉书》(卷一一八)写同一国名作乌耗。纪元676年注仅转录颜师古注,惟改秅为耗,而谓"耗音直加反"。宋代考据家之改窜不仅限于此也,刘敞(1019至1067年)于《前汉书·乌秅传》注有云,"秅当作耗",此说显难主张。郑、颜音注只能适用于秅字,不能适用于耗字。我敢说676年注《后汉书》者所见本,应是秅字正写;否则所引颜师古音注,将无从索解。然在676年以后,始有人在《后汉书》中误秅作耗。自是以后,《后汉书》之文与所引师古秅字音注始难调和。似有一"聪明"校勘家信任本文较切于注,于是乎改注中之秅为耗;其意固在免去抵牾,可是变成一种谬误了[21]。

归结一句话,我以为乌夷、乌耆同焉夷、焉耆确未共同存在,而根据《释藏》经文与其音义,皆无证明乌夷或乌耆名称之不误者(仅可洪在纪元940年驳鸥夷之误一说),则几乎可以断言释藏中之乌耆皆为焉耆之误,并不是从乌耆误作焉耆。我们幸而有上溯至汉代的记录,证明其名是焉耆而非乌耆,这就是斯坦因君所得的两片汉简(参看沙畹《斯坦因发现之汉文简册》第九三〇同九三四号)。此外或者可将哇特斯(《玄奘行传》第一册四八页)从前所拟的一种比附提出作为假说。《后汉书》(卷一一九)说焉耆国都在南河城,

而《前汉书》(卷九六下)说在员渠,《北史》(卷九七)引其文(又从《北史》转录入《魏书》卷一〇二)。颜师古注员字之音为于权反,足证此字不误;至若渠字,在《前汉书》(卷九六下)著录的其他国名如渠犁、番渠之类,亦见用之。则谓员渠也是焉耆之同名异译,似无不可能也,盖以国名为都城名之例常见有之[22]。

如前所述,哈喇沙尔国之古名,纪元前有焉耆,流传一直到唐代;或者应以员渠附焉;纪元400年左右有一焉夷名称[23];还有时代不明的婴夷,不甚确实,不能加入考订之列。566年译的梵本《月藏经》写作亿尼,此时以后的载籍供给梵文 Agni 的名称,业经玄奘忠实译写为阿耆尼。然则应从吕岱司之说,好像此国"在任何时代有一印度名称"么?我以为不然。若说焉耆同焉夷是土名的对音,似乎较为自然;Agni 即因与此土名音读相类,所以梵语化了,而此 Agni 梵名复又在566年转为亿尼,又在玄奘记传中转为阿耆尼。库车的土名曾由梵语转为屈支(Kuci),和阗的土名曾由梵语转为瞿萨旦那(Gostana),罗布土名曾由梵语转为纳缚波(Navapa),其理皆同。我反复申言者,因为恐怕有人以为梵语名称是原有的,而推想新疆那些古国乃是印度的移民建设之国。诸国连同他们的土名早已存在;可是后来皈依佛教以后,新疆一带受了印度社会的感化,这些国名因而梵语化了。

此种解说虽然冗长,第欲将中国古籍中根深蒂固的讹误屏除,亦自有其必要[24];附带可以屏除贝烈君的 Okñi 同由此字发挥之说。

我还有一末后之声明。我们用以考订中国古代译名的音韵,就是6世纪左右流行的音韵;这种临时性质是未能隐讳的;例如古韵之-uo,可对外国语之-u,亦可对外国语之-o,然而切勿假拟其有

二韵母相合之音。就是译名也应该将现在读音列于古音之前，因为只有现在读音确实可靠。若是仅用理论的古音来写纯粹的中国历史名称，好像不对。贝烈君用古音写宋云、慧生等类的名称，不可为法。是无异于寻求一种毫无功用的纠葛，其使 de Groot 的《匈奴考》不切于用的，就是误本同一原则。

我在本文中并未言到问题的本身，只想将若干不能与贝烈君同意之点说明。可是我要反覆声言的，贝烈君此编佳作材料丰富，只有一伊兰学师始能裒辑有此种成绩。

我在 1934 年之论文中研究纪元初哈喇沙尔语与库车语共有的一个名称，质言之，Cäkri 或Čägüri，训义或为“候望台”，我曾说明其曾转入回纥语而写作Čäkür，训为“塔尖”。我现欲在两点上补充前说：

（一）我曾说（九二至九三页）此字或此名之中国译名，似应读若柘，纵其文作拓亦然，我曾将译名中有拓字之例引举若干。自是以后，我又发现若干用柘字之译名，例如《法显传》之旃柘摩那（Cincamanā），同为字套第六册一页之嘘柘那（Locana）；则 8 世纪末年悟空《行记》中著录之库车拓厥（Čäkür）寺，拓字应改作柘。

（二）我前引诸文，证明Čägüri 同较晚的Čäkür 流行于哈喇沙尔、库车两地，嗣后转训为“塔尖”的Čäkür 流行于吐鲁番。斯坦因君有一唐人写本，曾经羽田亨君研究过，列举纳职（Lapčuq）境内有一烽，名东柘厥。此烽必定是一Čäkür，我现在尚难说此名之所本，是出含有“候望台”古义而在后来转入回纥语之候望台，抑是隐喻有一窣堵波（stupa），皆未可知也。

注

〔1〕 然我对于贝烈君（八八五至八八六页）所主张大月氏音读之说，未

能信其不误,其说以为大月氏之氏应读若"是",大月乃吐火罗之译名,氏犹言氏族;至若大月支之支,犹言支派。然我以为支氏二字互用,纯属音读的关系(尚有氏字的写法;又一方面匈奴可敦名称阏氏,还有焉提的写法);氏(音支)字应在译写外国名称诸字之列。贝烈君以为大月氏之所以省称为月氏者,犹之大宛(Ferghāna)之省称为宛;大月氏之外有小月氏,亦犹之大宛之外有小宛。此类例子,我们亦知有之。阿剌壁人之称大食,应是Ṭayyī, Tāžīgh 之对音,但是晚见的载籍曾发明有一小食。然而大宛终不失为大宛,尤其是大月氏终不失为大月氏。华人始终解说大秦之大为大小之大。大夏之大原亦解作大小之大,后来因与吐火罗读音仿佛相近,遂一变而为译名。

〔2〕 贝烈君引《摩尼教经考》,说货(khuâ)字音韵两用,因为此字在Farghāna 译名中译写 ghā 音。其实在此考中,误贺(ghā)作货(khuâ);盖此字在跋贺那(Farghāna)同莫贺(bagha)等译名中皆作贺也。这条二十多年前的旧注致使贝烈君发生误会,我很婉惜;可是汉文吐火罗的译名中假拟的对音皆是-kh-,而非-gh-。

〔3〕 但是任何土名的译名皆未表示有一-ñi 或-ni 的结尾词;Agni 乃是一种梵化名称。

〔4〕 吕岱司撰 Weitere Beiträge,见普鲁士科学研究院《记录》,语言历史门,五至六四页。

〔5〕 参看《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五卷,二六一页,二六三页,二七七页,二八四页。列维曾说此经是天统四年所出,而合此年为西历 566 年;案天统四年应合 568 年,可是详细审查一遍,原文实作天统二年则"四"字应是排印之误(Bagchi《释藏考》二七〇页排印之年号亦误)。第二见之译名写作忆尼,疑是东京缩藏本排印之误;好在忆忆二字读音绝对相同,无甚关系。

〔6〕 我曾据哇特斯说,引有鸥夷一名,可是未见释藏经文著录有之;仅在后引可洪《音义》中有此写法。

〔7〕 "鸟"字不见于字书,我暂取乌字音读。

〔8〕 证以下注音义,偈字应误;案可洪音义仅见东京《缩藏》本转录高丽《大藏》本,高丽本刻年似不如世人所拟之古。

〔9〕 东京《缩藏》本此字亦作偈;好像可洪只有一字作偈。

〔10〕 此处偈字同注八之偈字,疑皆非可洪原文。

〔11〕 "川音"未详。《康熙字典》补遗常引有《川篇》,虽未详为何书,好

像成书晚在可洪以后。

〔12〕 此名未详出处(钧案疑为焉夷之误)。

〔13〕 下文与焉耆名称无关。

〔14〕 不可将鸟字同鸟字相混,诸字书皆以鸟字是袁字俗写,我曾在《翻梵语》中见有一例(大正《大藏本》第五四册一〇一一页)。此外同书尚有一例,《佛所行讚》卷二有伽阇(Gaja)山,注云"译曰鸟也"(大正本第五四册一〇四三页),此鸟疑为像之讹,而像又为象之讹(关于鸟象二字互讹之例,可参看Aurousseau说,见《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十二卷第九分六一至六二页)。世人已知《翻梵语》的解释常为谬误的,尤其是版本不佳,最近大正《大藏经》本并未将无数必须改正之文指出,错误开卷即见有之。我疑心同册一〇一一页之鸟字亦为象字之误。

〔15〕 此种讹误在近代载籍中尚见有之。马欢《瀛涯胜览》(15世纪)中有一名duriyan(马来语名;参看《通报》1933年刊四〇一页)之果实,诸旧本皆作赌尔乌;只有最近发现之一钞本正写作赌儿焉。

〔16〕 焉耆、乌耆混写,可引之例尚有若干:(一)大正《大藏经》之悟空《行记》(五一册九八〇页)本文作乌耆,下注异文作焉耆;(二)玄奘《西域记》阿耆尼条今本附注作乌耆,《释迦方志》相对之文亦同,然《图书集成》所录《西域记》文,附注作焉耆;又《佛祖统纪》(卷三二)相对之文于阿耆尼条改《西域记》原注,而引《前汉书》;然在明治《大藏》本(致字套第九册三四页)《佛祖统纪》阿耆尼下注云汉书名乌耆,未著异文,而大正《大藏》本(第四九册三一四页)作汉书名焉耆。

〔17〕 新疆古地名写法不明之例尚多;有一例颇著名,我将在别一文中讨论之,即金满国名是已(参看沙畹《西突厥史料》三三八页)。此名在《后汉书》中有时写作金蒲(参看沙畹之研究,见《通报》1907年刊一六九同二二五页)。

〔18〕 顯字不见于字书,我暂读若晏;纪元676年注《后汉书》的人引颜师古注,改写作鷃,《康熙字典》(乌字下)引颜师古注亦作鷃。今本《前汉书》两见之字,是近代校勘之误,有其可能。意者顯字既不见于字书,校勘者改作鷃,而原顯字疑为传写之误(原文可以令人想到頞字)。然则应该假定原文讹误发生,应在颜注脱稿半世纪后,因为676年引颜注文时,其字已作鷃也;此事或有其可能(参看后注),然不甚近类真相。

〔19〕 颜师古所注乌秅音读，似应读若鸦荼，然未免可异。乌字之有鸦音，始见于宋代之《集韵类篇》，一直到《康熙字典》同《辞源》，皆引其说；然而皆是对于乌秅国名之音读而引证的，则其起点皆是颜师古注。我疑其为颜师古注旧本传抄之误，而一加反之加，恐为直加反之加所牵连。至若乌字音注中之加字，究为何字，颇难确定：或者是"如"，或者是"奴"，或者是"胡"，总之，必与反切中之"一"合读，而得音与"乌"字寻常读法相同之字，或几近乌字寻常读法之字。既主此说，顾《后汉书》(卷一一八)所引颜注亦作一加反，则应承认此注亦是经过一番校改之文；此类"博识的"校改并不少见。

〔20〕 可参看《前汉书》卷末颜师古叙例。

〔21〕 汉代乌秅国名理想上的对音好像是 Uḍa，若从沙畹之说(《远东法国学校校刊》第三卷三九八页，同《通报》1907 年刊一七五页)，认定就是玄奘《西域记》中之乌鐩，岂不更加有力；可是 Herrmann 君反对这种考定(见 Sven Hedin《南西藏》卷八，一九页，三六页，四五一页)，而其立论似甚充足；况且乌鐩(Uoṣat)对音距乌秅(Uḍa)尚远欤。我还原作 Uoṣat 者，盖从慧琳音注(为字套第十册四九页)；可是鐩字或铩字寻常音读作Ṣai。惟应注意者，慧琳注《西域记》乌铩之音，下字音杀不误，可是在所注《玄奘传》中(为字套第十册五二页)写其名作乌馁。案《玄奘传》之一切版本，此名皆作乌铩，与《西域记》著录之名同；慧琳在乌馁下注音云川劣反，足证所注者是馁字音而非铩字音，好像慧琳在九世纪初年所见本此处有误。复次慧琳注乌铩云为胡语，注乌馁云为梵语。当慧琳时代照例称伊兰曰胡，谓印度曰梵，分别甚严；慧琳虽是疏勒人，对于新疆那些时常梵语化的名称，也有难于辨别之处，足见其见解不能始终坚强也。

〔22〕 沙畹受《法显传》乌夷名称的影响，曾将罽宾(Kachemire)人卑摩罗叉(Vimalâkṣa)于纪元 384 年龟兹陷没后避居之乌缠，考作焉耆，质言之，哈喇沙尔(《通报》1905 年刊五六五页；沙畹所本者是《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三五之文，其实早见《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本传〔宋、元、明藏皆作乌，高丽藏独作焉，可参看致字套第二册九页〕，同《开元释教录》卷三)。可是同一乌缠名称并见 8 世纪末年悟空《行记》著录，视为 Uḍḍiyana 之对音(《亚细亚报》1895 年刊第二册三四八页)，卑摩罗叉既避东方之乱，当然西走印度；Bagchi 君(《中国释藏考》三三九页)说他"行向东境"，毫无根据，或者是因袭沙畹考证之误。我在卑摩罗叉时代之后不久，见有著录同一乌缠名称之文。《陈书》卷二云：

永定元年十月庚辰(557年11月21日),“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无遮非译音,可参看《通报》1929年刊一八四至一八五页)。高祖亲自出阙前礼拜。初,齐(479至501)故僧统法献于乌缠国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监(502至519)末为摄山庆云寺沙门慧兴保藏。慧兴将终,以属弟慧志。承圣(552至554)末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我不欲在此处作一种佛牙研究,裒辑其文可成专书;有一佛牙曾由波斯使臣在530年贡献中国(参看Yule & Cordier《马可波罗行记》三版二册三三〇页;De Groot, Der Thūpa, 27);别有一佛牙曾为那揭罗曷(Nagarahāra)国收藏(《西域记》卷二);法献若在焉耆求取佛牙,必不可能,乌仗那(Uḍḍiyana)应是觅取佛牙之当然地点,而且为三百年后悟空《行记》所证实。最后我检得一条关于乌缠之记录;是即519年撰之《高僧传》卷十四法献传。法献在439年止于定林上寺。有志仿效智猛西游,于475年发足金陵,西游巴蜀,道经芮芮(Avar)而达于阗(和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获遗物多种,内有佛牙一枚。《高僧传》说:其经途危阻,见其“别记”,此记似佚。传继云:佛牙在乌缠国,自乌缠来芮芮,自来梁土。献赍牙还京师,十有五载,密自礼事,余无知者;490年皇帝感梦,方传道俗。献殁于497年,或此年之前不久。与其同僚玄畅同葬钟山之阳,献弟子僧祐,为造碑墓侧,沈约制文。献于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522年被人执仗劫去,后不测所在。案《高僧传》成于519年,而此传言及522年事,盖为后人增入之文。乌缠既是乌仗那,何以法献未逾葱岭而得佛牙?传文既云佛牙在乌缠国,疑非法献本人亲得,可并参看《开元释教录》卷六达摩摩提(Dharmamati)、僧伽跋陀罗(Saṅghabhadra)两传。

〔23〕 焉耆、焉夷两名中耆夷两字互用之例,在其他译名中亦见有之,例如外道师Agita的名称,除通用的译名阿耆多以外,尚有阿夷头的译名;可参看织田得能《佛教大辞典》六版十一页;《翻梵语》(大正本第五四册一〇一四页)别著录有阿夷哆。这些不同的写法要因“非汉名”读法方音殊异所致。《法显传》保存有不少根据业经变化的方言之译名,所以他译仙人Asita的名称作阿夷。

〔24〕 好像中国、日本的考据家尚未有人讨论此焉夷,焉耆讹为乌夷、乌耆的问题。《东方学报》第一卷(1931年)二〇八页一篇专门论文中尚以乌耆为正写,而在燕京大学刊行的《水经注引得》尚见有此乌耆。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

责任编辑：王守青

ISBN 7-101-04083-7

9 787101 040838 >

定价：15.00元